

# 主持人的話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主持人

本計劃的《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一期出刊後，得到不少來自院內外學界的好評和鼓勵，看來原設定的增加交流和溝通的目標是可以達成的。

過去半年來本計劃的十六個分支計劃均依進度積極地在執行。在這期裡，陸續有幾篇關於新分支計劃的報導，讀者可以藉此多了解本計劃的研究旨趣和動向。與國外相關學術機構的交流也是本計劃成立以來相當重視的工作，截至目前為止，本計劃已與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東南亞計劃(Southeast Asia Program, SEAP)，荷蘭萊頓的國際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IIAS)，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RSPAS)，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和普羅旺斯大學合辦的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outheast-East Asia, IRSEA)簽訂合作交流協議書，在未來幾個月將陸續簽約的還有澳大利亞的墨鐸大學(Murdoch Univ.)的亞洲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Center)，日本的立命館大學和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泰國的「東南亞區域考古與藝術中心」(SEAMEO Regional Center for Archaeology and Fine Arts, SEAMEO-SPAFA)。透過這些國際學術交流組織，本計劃分別與不同機構擬定合作研究計劃(如與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合作進行東南亞勞動市場的性別薪資差異比較研究)，進行實質的學者互訪計劃(如與荷蘭萊頓的 IIAS 之間，每年有 2-3 個為期不超過六個月互訪)，或規劃重要基礎研究資料檔案的共享方案(如與泰國的東南亞區域考古與藝術中心)等。

在下個會計年度裡本計劃已編列若干個東南亞區域研究博士後研究和博士(或碩士)論文研究獎助的經費，目的就是希望能多鼓勵一些年輕的一代投入東南亞的區域研究。區域研究也一直是台灣社會及人文學界比較「低度發展」的領

域，本計劃有鑑於此，乃自許兩個責任，一是鼓勵較資深的院內研究同仁擴大他們已有的研究興趣，注意到東南亞這個區域的整合研究課題，另一則是獎勵較資淺和後進的院內同仁和院外學生及早將研究重心轉移到對東南亞的鑽研，而成為未來的東南亞研究專家。這期特別摘譯了 Schwartz 教授一篇有關區域研究的文章，或許可以引發更多學者對區域研究做為一門「正當學科」的正視。

本計劃在院方的長期構想裡是走上成立中心的建制化，目前本院組織法修法方向也已確立這樣的共識。本計劃所有同仁將以嚴肅和興奮的態度來經營東南亞區域研究的這個學術園地，以為下一階段的制度轉型做較必要和紮根的準備，除了研究領域的擴大和研究專長的深入之外，圖書設備的完善化也是重要的一個基礎工作，到目前為止，本計劃圖書室已購置 600 冊西文圖書，110 冊中文圖書，10 種期刊，希望到這個年底能達到至少 1000 冊的短期目標。這些圖書正在編目當中。歡迎本計劃所有同仁和助理們多多使用。

最後要提的是本計劃的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 (PROSE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已經落實出版，目前有五篇相關論文出版，這也是本計劃的另一成果。

## 關於發展東南亞歷史研究之淺見

陳國棟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 導言

從時局來說：臺灣的前途不外是維持現狀、獨立或成為中國的一省。但不管結局如何，她都是一個個別的文化區域或經濟體系。海島與邊陲的位置是她不可改變的事實。在中國之內或世界之中，要有一立足的地位，有足以稱道的地方，就要在考慮其自然稟賦與歷史淵源下加以發展。東南亞鄰近臺灣，一半由半島的大陸國家，另一半由島嶼國家所構成；而除了印度尼西亞以外，都屬小規模經濟。華人移民對臺灣與東南亞都曾，也繼續不斷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世界大國和中國都不容許或不適合臺灣人過度介入其經濟活動的前題下，東南亞是臺灣的一個不錯的出路。

二次大戰後，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雖然經常受到戰爭的困擾，東南亞各國學者還是漸漸發展出本土的「自發性」(indigenous)歷史研究，值得重視。東南亞的歷史學家在最近數十年來對該國或該地區的歷史研究，曾經做過深刻的反省。現今東南亞本土歷史學家已有這方面的自覺，他們雖然仍需廣泛參考東南亞以外地方研究該地區的成果，但是他們更著手去開發本土的文獻，並且以邦國搏成的軌跡導引其思考、研究的方向。這樣的一個發展取向，或者與臺灣本土歷史研究者近年來的思考方向有異曲同工之妙：經由以本土為中心從事歷史撰述來達成民族自信，而不再將本土視為依附於某一文化或某一政權的從屬者。以這種方式得到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同時照顧到學術研究該有的客觀性，當能產生對本土較有益的研究成績。

從學術研究上來說，東南亞史地也是一個值得，而且必須開發的領域。就最近四百年來說，東南亞的大部份地區都先後，或長期、或短期地，淪為歐、美強權及日本的殖民地，與臺灣有相似的遭受外來政權統治的歷史經驗。在與強勢政權和強勢文化互動的過程中，臺灣與東南亞各國的反應有同有異。比較其經驗可以豐富人類知識的內容，同時也可以提供必要時的參考。

然而東南亞的歷史並不是歐洲人來到後才開始。部份地區的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耶穌紀元前後，如今越南北圻的交阯、馬來半島北部的狼牙脩(Langkasuka)和中南半島上的扶南(Phnom)等，都有近兩千年的史蹟可尋。但是東南亞地區的文字使用開始得較遲，而且除了越南北部外，很少有歷史撰述。但因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世界與東南亞的接觸也開始得很早，因此在中國史書、阿拉伯遊記和南印度碑銘中還是留下一些蛛絲馬跡。其中，較有條理，而且涵蓋面最廣的畢竟是中文材料。解讀中文材料正是中國(含臺灣)學者可以在東南亞史地研究上取得優勢的地方。

不過，中國人雖然很早與東南亞來往，其主要內容卻只有通商與通貢兩種方式。中國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除了對越南北部外，並未發生有意義的影響。在伊斯蘭教(十四世紀)傳入及西方勢力介入(十六世紀)以前，改變東南亞原生本土文化的，是印度的宗教與政治傳統。這也是著名的法國東南亞史家 George Coedès所說的"Indianization"。十四世紀以前，東南亞的主要文化都帶著印度教(濕婆Siva信仰)、大乘佛教(Mahayana)、小乘佛教(Hinayana，即南宗佛教 Theravada)與密宗佛教(Vajrayana, Tantric Buddhism)的色彩。南印度人(古達羅毗荼人 Dravidians，今坦米爾人 Tamils)在東南亞地區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力。梵文長期成為當地主要的上層社會的資訊媒介，其語彙也經過轉型溶入當地的語言中。南印度及錫蘭且曾數度介入東南亞地區的戰爭。宗教的發展與戰爭的後果，促成古東南亞邦國在南印度及錫蘭留下一些可貴的碑刻文獻。

阿拉伯人和波斯(伊朗)人早先已曾經由陸路與中國發生商業、文化的接觸。七世紀以後，他們更經由海道而來，並且正是中西貿易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東南亞地區為海道必經之途。阿拉伯及波斯的商人、知識分子、探險家和外交官，或多或少受到伊斯蘭教主穆罕默德「追求知識，即使(知識)在中國」教訓的影響，常在往來東南亞及中國時，留下可貴的見聞記錄。阿拉伯文的記述對於整理此一時期東南亞的歷史因此也頗值得重視。雖然伊斯蘭教傳入東南亞世界的途徑究竟是直接由阿拉伯傳入，還是間接得自中國，學術界頗有爭議，但從十四世紀起，

東南亞世界的許多部份開始浸潤在伊斯蘭文化的影響下，則是不爭的事實。處理伊斯蘭文化也成為研究東南亞歷史不可疏忽的一環。

十六世紀初，西方海上強權開始介入東南亞世界。從葡萄牙人入據滿刺加(Malacca)開始，葡萄牙、荷蘭、西班牙、英國、法國、美國陸續成為東南亞地區的殖民主。中國人則始終是活躍於東南亞的一組重要的外來人群，至遲從十三世紀起就擁有自己的獨特聚落，甚而建立獨立但短暫的政權；日本人則在十六、七世紀之間，也在東南亞建立了許多獨立聚落，稱為「日本町」，其後因日本母國的「鎖國政策」，「日本町」的發展一時中止。日本人再度在東南亞扮演重大角色，差不多要等到二十世紀初期以後，尤其是1930年代實行所謂「南進政策」才再開始。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佔領許多東南亞領土。戰後雖然放棄佔領，但始終擁有很大的經濟影響力。

在東亞與南亞、西亞乃至西歐的經貿關係上，特就運出商品一點而言，東南亞扮演過，也還一直扮演著兩種角色：一是轉口港埠的地位，一是原始出口港埠的角色。前者將東亞產品轉介到南亞、西亞，或是反向為之。後者則直接提供供給東、西兩側鄰居的商品。直到十九世紀以前，東南亞的主要出口品為香料(十二世紀前主要為焚香料，其後則加入了食用香料，如丁香、荳蔻和胡椒)和藥材。最初葡萄牙人東來，說是為了「追求香料和基督徒」，實際上也就是為了丁香、荳蔻和胡椒這些調味料。十九世紀以後，木材、錫礦和石油日趨重要。

## 發展東南亞歷史學研究的一些獻議

東南亞歷史研究的主題，從十九世紀後半起，有了重大的改變：歐洲殖民強權的學者，開始由為統治目的而展開的研究轉為純學術的研究。雖然研究的對象仍以其所屬國家的殖民地為主。如法國學者對安南、柬埔寨，荷蘭學者對印度尼西亞，英國學者對馬來西亞，美國人對菲律賓的研究。配合自然學者、人類學家與考古學者的調查，古文明遺址的發現，開始加入研究當地的原始材料，豐富了東南亞研究的內涵。歐洲漢學家，如著名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夏德(Friedrich Hirth)、柔克義(W. W. Rockhill)等也加入討論，將相對豐富的中文史料導入西方的東南亞研究。中、日學者到了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上半葉，也被引起注意和興趣，日本的高桑駒吉、藤田豐八、三本達郎等在這個時後加入東南亞研究；中國的沈曾植、馮承鈞、李長傳、張星娘、陳序經、蘇繼頤等也熱

烈參與這方面的研究。【不過，中國學者的動機多少是受當時東西交通史和華人移民史研究風氣所催動，並非完全為了純粹的東南亞研究。】

二十世紀後半，除了海外華人尚有致力於東南亞研究，如王賡武、陳荊和、吳振強等外，居住於大陸或臺灣，使用中文寫作的學者幾乎放棄了東南亞研究這個範圍。專就臺灣地區而言，學者偏重使用華文資料、處理華人在該地區的奮鬥歷程，但往往不能充分處理周遭本土人士所參與的政、經、文化活動，遑論觸及東南亞各邦國自身的歷史發展，也不能利用各種出土文物。至於大陸方面，深入的研究雖然不多，但至少翻譯了一些當行經典，如George Coedès、D. G. E. Hall和H. G. Quaritch Wales等人的作品，不失薄有貢獻。要言之，二十世紀後半的東南亞研究，仍然以歐、美、日本為馬首是瞻；但最近一、二十年加入的澳洲學界則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新興力量。

他方面，在過去四、五百年間，東南亞地區大都曾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即便幸免，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也廣泛地受到強勢文明的影響。從地緣與歷史的因素來看，東南亞又受到其腹背的強權——中國——的牽引，因而東南亞的歷史頗具國際的性格。在邦國的統一與文化的獨立發展長期受到威脅的情形下，在國民的經濟與文化能力落後的情形下，東南亞邦國的歷史在過去幾乎都由該地區以外的人來撰寫，使用外國文獻為主要資料。由於非由本土歷史學者主導其歷史寫作，因此撰述的方向也就不以各國的歷史發展為中心，照顧到的問題層面也不完整；或是只朝西方學術傳統的模式去思考，主觀地排除一些歷史事實與歷史論題於主流之外。

前者如歐洲的學者大都對當地的進出口貿易以及該貿易活動對內部經濟變遷的影響感興趣，可是東南亞內地依循自身經濟條件而發生的經濟轉變就沒有被適當地處理。這樣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畢竟是不完整，甚至免不了有所偏頗的看法。後者如泰國學者對Sri Vijaya（室利佛逝、三佛齊）古國都城的考訂，堅持位於克拉地峽（the Kra Isthmus）與阪東灣（Bandon Bight）附近的赤野（一稱斜仔，Chaiya）長期為Sri Vijaya的首都。這樣的看法雖然與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所主張的占卑（Jambi，在蘇門答臘島東南）繼巴鄰龐（Palembang，在占卑之南）之後為Sri Vijaya長期的首都的說法不合，但蘇門答臘出土的文物遠不及赤野附近所出亦為不爭的事實。本土的「自發性」研究雖然帶著濃厚的新興民族主義色彩，但對增長學術研究內涵未必沒有貢獻。

臺灣在最近幾年來開始重視東南亞研究，由於過去本地學界在此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極為有限，可以說是毫無基礎可以立足，因此要朝那個方向展開臺灣的東

南亞歷史研究，應當是開拓此一領域的先決問題。個人認為：就一時的目標而言，擬定一些重點主題，展開密集研究，固然能獲得相關的認識，在這些主題下稍有進展。但基於知識體系內個個環節的相互依賴性，只有先作廣而深的基础建設，方能健全地發展此一領域。個人建議依以下三個方向去作，循序推展，或許是可行與該行的辦法。不揣淺陋，聊作野人獻曝。

個人認為要發展東南亞歷史之研究，首先應從有關東南亞史地基本知識的教授與普及開始；接著先由學養與東南亞研究略具相關性或有意願、有興趣者，展開間接以依賴西方及日本既有東南亞研究成果的延伸研究；最後才是立基於原始材料的深刻基礎研究。這幾點淺見係就整個研究環境的條件而言，所謂的「循序推展」也是邏輯的過程，並不一定指時間的早晚。

### (一)、有關東南亞史地基本知識的教授與普及

簡單地說，就是在大學多開與東南亞史地相關的課程，作為通識教育的一部份；在市面上多出版與東南亞史地相關的進階書籍，以方便各階層的讀者自我建立這方面的常識。這些基礎工作應該可以刺激出一些新的研究者。可以配合的工作還有：

1. 應調查臺灣地區有關東南亞史地出版品的現況。這裏指的是一般市面可以找到的著作及各圖書館館藏的中、日、英文文獻。可能的話，要加強外文文獻(著作及史料)的譯介，以提供有志於了解或研究者一個方便的基礎。中央研究院的「東南亞研究計劃」已經作了該院館藏的調查，其他方面應該加以推廣。
2. 應調查臺灣地區東南亞史地教學的狀況，藉以了解課程內容及師資，擬定加強、推廣的方向與手段。唯有改善教學條件才能吸引年輕學者走入東南亞史地研究，培養出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年輕學者的興趣能被開發並在國內取得基本專業知識，再進一步送到國外進修，當可在人才培育上收事半功倍之效。

### (二)、立基於西方及日本研究成果的間接研究

譯介外文研究成果雖不可或缺，但為期教學水準之提升，亦應鼓勵現有相關學門對東南亞研究稍具興趣之教學人員及研究者，發展自身專長之延伸研究，將東南亞問題整合到自己的領域。為考慮到本地學者除中、日、英文(及少數其他歐洲語言)外，可能欠缺使用東南亞當地歷史語言及目前實用語言的能力，這一

類型的研究當以使用中、日、英文(及少數其他歐洲語言)文獻(含史料及研究著作)為主。其進行方式可為：

1. 應建立一套完整的東南亞研究文獻目錄，比較臺灣本地館藏狀況，設法補充欠缺之專書及期刊，使其集中一特定地點，開放公開使用。
2. 發展與歐、美、日本及澳洲東南亞研究先進國家之學術研究單位之合作關係，保持相關資訊趕上國際學術水準。
3. 提供現有教學人員及有志於東南亞研究之相關學者特別的後勤資助(如准許以搜集資料之名義出席相關會議或到東南亞地區作田野考察)。若有出色作品，當予特別獎勵。學者若為研究需要，必需加強語言能力，應予補助學費。

### (三)、立基於原始材料的深刻基礎研究

最終、最高的目標當以使用原始材料，在既有的學術基礎上深入研究。在語文上，東南亞的原始材料既包括中、日、西歐的文字，更包括歷史上使用過的梵文、巴利文、坦米爾文、吉蔑文等等，且不用說目前東南亞仍在使用的各種活生生的語文。至於原始材料的取得，除已發現、公佈者外，尚可透過考古學、人類學的田野工作而取得。例如，日本及歐洲國家就經常組織考古隊或訪查團到東南亞搜尋被遺忘的古蹟，時而有新材料的發現。其發展方式可為：

1. 培養東南亞研究之博、碩士生學習相關語文。
2. 鼓勵與外國學術機構合組考古隊或田野調查團；俟時機成熟也可以考慮由本地學者自行組團(隊)為之。
3. 翻譯、解讀東南亞原始材料，提供有志者參考。

以上僅為個人淺見。承 蕭新煌教授美意，在《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發表，希望能收拋磚引玉之效，集思廣益，有助於此一領域之開拓。

## 越南古代城市形成之歷史與城市特徵之研究 ——《大南一統志》所看到的順化古城——

黃蘭翔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大南一統志》是維新帝（1907—1916）即位後第3年所編撰的書。這是一本相當具有現代性的著作。該書雖對建置沿革有相當的描述，但是幾乎絕大部份都是描述阮朝的情況，特別是對成泰18年（1906年）以前的阮氏越南，有完整的敘述。

其中因「京師係根本重地，特別志之，以表隆重」，所以《大南一統志》以第一卷全卷的篇幅描寫京師的城池、壇廟、群廟、群祠、山陵、院園、臺榭、府第、官署、寺觀。其次近畿的部份，則以卷二、卷三、卷四共三卷來描述，其他的省分則以一卷篇幅來描述一省的情況。有卷五的廣南省、卷六的廣義省、卷七的廣治省、卷八的廣平省、卷九的平定省、卷十的富安省、卷十一的慶和省、卷十二的平順省、寧道省、卷十三的河靜省、卷十四、十五的義安省、卷十六、十七的清化省。各省所記載的大綱，則有分野、建置沿革、形勢、氣候、風俗、城池、學校、西壇、古蹟、陵墓、廟祠、洞寺、關汛、驛站、里路、津渡、橋樑、舖市、人物、孝子附、烈女附、土產等章節。

要對這整本書加以解讀尚需時日，現在先對「京師」<sup>1</sup>的章節先作嘗試性的

---

<sup>1</sup> 從下述的《大南一統志》的描述，其宮殿的名稱如午門與太和殿等，如實地說明順化故都，乃模仿北京故宮的規畫。然而其皇宮被置於外城城內的南邊，這種配置又極為近似元大都的配置。雖然元大都後來被改建成明清的北京城，但是城牆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所以以下的討論採用元大都或是

閱讀。《大南一統志》中所描述的「京師」，其實就是嘉隆帝（1802—1819）所興建的都城。下面就節錄有關「京師」的描述，來作分析檢討。

「京城：

周二千四百八十七丈三尺六寸（約 10,447 公尺）。高一丈五尺六寸（約 6.5 公尺），厚五丈（約 21 公尺）<sup>2</sup>。甃磚門十一，前曰體仁門、廣德門、正南門、東南門；左曰正東門、東北門、鎮平門；右曰正西門、西南門；後曰正北門、西北門。

城外有濠，各廣五丈七尺（約 24 公尺），深一丈（約 4.2 公尺）。城門跨濠砌石為橋。前面正中砌旗臺；四面城上，砌砲臺二十四，

並砲廠更店，凡四百五十五所，坊地九十五。

鎮平門外東北角，又起一層城，曰鎮平臺，周二百四十六丈七尺（約 1036 公尺），高六尺七寸（約 2.8 公尺），厚三丈五尺（約 14.7 公尺）。上豎旗竿二，砌砲門三，火藥一。濠，廣七丈五尺（約 31.5 公尺），與京城濠相通。

謹按京城，嘉隆四年（1805 年），土築前右二面。十七年（1818 年），甃磚左後二面。明命三年（1822 年），甃磚。

皇城：

在京城之內，廟殿在焉。周六百十四丈一尺（約 2579 公尺），高一丈五寸（約 4.4 公尺），厚二尺六寸（約 1 公尺）；磚砌南北各長一百五十一丈（約 634 公尺），東西各長一百五十五丈五尺（約 653 公尺）。門四，前曰午門，左曰顯仁門，右曰彰德門，後曰和平門。

午門內為太和殿<sup>3</sup>，大朝正殿也。嘉隆三年（1804 年）建，成泰三年（1891 年）重修，十一年（1899 年）基內改列花磚。殿前為丹陛，丹陛之下為龍墀，前臨太液池，池之南、北各豎龍雲銅柱，櫺星坊門，中砌中道橋，東左待漏院，西右待漏院。

---

明清北京城為比較的對象。

<sup>2</sup> 依清代的尺寸 1 丈為 3.2 公尺，但是根據中川武研究室中澤信一郎的研究，分析《欽定大南會典事例》與實地的測繪，得出結果為 1 丈=4.2 公尺。在此採用中澤信一郎的研究結果。以下全同。

<sup>3</sup> 中川武教授所領導的早稻田大學亞洲建築研究室的研究，知太和殿曾在 1923 年（啟定 8 年）作大規模修理。

顯仁門之左，為東闕臺，彰德門之右為西闕臺，和平門之左為北闕臺，城外，四面濠，周于午門前，曰金水池，跨石橋三，餘三門各砌石橋一。

謹按皇城，嘉隆初，前面正中處，為南闕臺，上建乾元殿。左、右門二，曰左端門、有（右？）端門。明命十四年（1833年）改建門五，中為午門，左右夾門二，左右闕門二，上建五鳳樓，左右待漏院。

#### 紫禁城<sup>4</sup>：

在皇城之內，宮殿在焉。周三百六丈十二尺（約 1286 公尺），高九尺三寸（約 3.9 公尺），厚一尺八寸（約 0.76 公尺）。前後二面長各八十一丈（約 340 公尺），左右二面長各七十二丈六尺零（約 305 公尺）。

城身內外塗以黃色，門七，南曰大宮門（懸乾成宮匾），東曰興慶門、東安門，西曰嘉祥門、西安門，北曰祥鸞門、儀鳳門。

前為乾成宮，前殿曰勤政殿，常朝正殿也。嘉隆三年（1804年）建，成泰十一年（1899年）重修，改列花磚，殿前左、右兩廡殿之東，便殿曰文明殿，西曰武顯殿，左廡之東建東閣，閣南曰聚奎書樓。

勤政殿之北，曰乾成殿。又北曰坤泰宮，垣西曰嘉壽宮，其北為長寧宮。殿庭之制，例弗敢載。

謹按紫禁城，嘉隆三年（1804年）營築，名曰宮城。明命三年（1822年），改今名。城前面正中，嘉隆初為太和殿，左右為左肅、右肅二門。明命十四年（1833年），移太和殿稍南，省左肅、右肅二門，以其地建大宮門。宮門外東西建坊門二，東曰日精，西曰月英（舊月花，紹治元年（1841年）改）。

乾成、坤泰二宮，嘉隆初，建大內，未有宮名。明命十四年（1833年），規制大備始定，以中和殿以前諸殿為乾成宮，中和殿以後諸殿為坤泰宮。

」

下面我們就針對幾項課題作一些簡單的討論。

（1）三重城牆。順化古城與明清北京城<sup>5</sup>（若不考慮明嘉靖 32 年（1553 年）所增建的南側外城牆；下面亦同。）、元大都都是有宮城、皇城、京城三重城牆所

---

<sup>4</sup> 在此僅解讀紫禁城中軸部份，因其餘部份的描述較為複雜，等待別的機會再作分析。

<sup>5</sup> 明代北京城是以元大都為基礎所改建的都城，因為要減少建城的工程量及縮短防線，將元大都城北邊較荒涼的部份，去除五華里到城外；南部為了以容納官署，延長宮門前御道長度，將城牆南移一里；東西城牆則仍沿用元大都的城垣。

繞的都城。元大都採用三重城垣乃是受宋東京開封城的影響<sup>6</sup>。中國都城蓋城牆的傳統雖可追溯到春秋戰國以前，然而這種三重城牆的形制則可知起於宋代都城興建。

在型態上，順化古城有一特殊的部份，那就是於鎮平門外的東北角，有一層外凸的城，週長有 1,036 公尺，稱為鎮平台，這是在中國都城裡所罕見的現象。

(2) 城牆的規模。宋開封城與元大都的規模大致相當；而元大都的外城牆東西長 6,635 公尺，南北長 7,400 公尺，可知面積大約為 49 平方公里。北京內城東西長為 6,650 公尺，南北長為 5,350 公尺，面積為 35.6 平方公里。順化的外城週長大約為 10,447 公尺，若以正方形計，則每邊約為 2,600 公尺，換算成面積，得 6.8 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元大都與北京城各為順化古城面積的 7.2 倍與 5.2 倍。相形之下，感覺順化古城的規模甚小。

皇城的部份。元大都皇城的週長約 20 里（換算成現代的公尺制為 11,059 公尺），按復原圖之比例換算得東西約為 3,072 公尺，南北約為 2,458 公尺，面積約為 7.6 平方公里。另一方面，北京城的皇城，東西長為 2,500 公尺，南北長為 2,750 公尺，面積則為 6.9 平方公里。順化古城，東西長約為 653 公尺，南北長約為 634 公尺，面積則為 0.41 平方公里。元大都與北京城的皇城各為順化皇城的 18.5 倍與 16.8 倍，但是卻約與順化古城的整個規模相等。

(3) 城門及街坊。元大都、北京城及順化城都是開 11 門。但是，前兩者為北 2 門，東、西、南各 3 門。這與《考工記》的「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的理想甚為接近。然而順化城是南開 4 門，東開 3 門，北與西都開 2 門。實際上，東面與西面相同都是開 2 門的份，但因為順化古城於東北角的鎮平台，開了一道「例外的」鎮平門，所以才多了一道門。

造成順化古城四面均為雙數門是有原因的。此乃因順化一方面承襲了中國傳統的都市計畫，另一方面其城牆部份又採用法國 Vauban 城塞形式，使得四面共有 400 門大砲，備有 24 個稜堡（除去四隅，則每面共 5 個稜堡，正好中央為稜堡的位置，所以每面就有 4 個稜堡之間隙，南面也就於此設 4 個城門，至於而其他的面則開 2 個城門），形成鋸尺形狀<sup>7</sup>。正面的中央稜堡作成 3 層的旗台，旗竿上飄揚著皇帝的旗幟。

根據馬可波羅的描述，元大都城市規畫完善，亦即「畫線整齊，有如棋盤」。

<sup>6</sup> 參考郭湖生的 元大都——兼論金中都——，可知包括金的中都在內都有三重城牆。

<sup>7</sup> 為了增加軍事作戰的機能，中國傳統的城牆面增建了「馬面」，而順化則採用法國的 Vauban 式

街道的基本形式是，通向各城門的街道組成城市的幹道。因為城中有皇城及水面設施，所以南北城門不相對。大都城內街區劃成 50 個坊；這些坊只是一個地段，並無坊牆及坊門。到了明代，其皇城四週僅剩下 37 坊。順化城雖然小但是卻化城內為 95 坊，基本上各城門均相對，但也有少數的幹道是不相通的。

(4) 宮殿。關於宮殿，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午門<sup>8</sup>。午門是模仿北京紫禁城午門的建築，據說明命帝為了營建午門曾派遣工匠去北京。磚砌作成凹狀的台基構造物上，蓋有同樣為凹形排列的五棟樓——五鳳樓的午門，其實就是配合順化皇城的規模，將北京的同形建築的兩翼縮短的小號版。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北京城的午門是蓋在紫禁城的正南門，而順化紫禁城的正南門是大宮城，順化午門卻是皇城的正南門。北京的太和殿在紫禁城內，而順化卻在紫禁城外。

北京城從大清門、天安門、端門、午門、太和門的五門，以及太和、中和、保和的三殿各別附和了《考工記》的「五門」制度與「三朝」制度。順化似乎沒有明顯的「五門」「三朝」的制度附會<sup>9</sup>。然而根據《大南一統志》的記載，太和殿是「大朝正殿」，與勤政殿是「常朝正殿」；勤政殿後面的乾成殿與坤泰殿則似乎是寢宮，所以其《考工記》的「前朝後寢」似乎仍適用於順化。

還有一些細節的記載如分乾成宮與坤泰宮的界線是「中和殿」，但是《大南一統志》的附圖之中，卻完全看不到中和殿蹤影。京城內有「砲廠更店，凡四百五十五所」的描述，這裡的「更店」所指何物？尚不清楚。北京城太和門前午門後的石橋稱為金水橋，而順化午門前的水，稱為金水池，這種命名方式絕非偶然，但是其所代表的意涵仍需進一步擬清。

順化古城雖然是模仿明清的北京城所蓋的，但是從以上的解讀，順化或因越南原有的本土文化、或因受法國統治的影響，或因地處北京都城文化邊陲地域，造成有與北京城不同的特色。但是這些異同點仍須進一步研究才能得到更切確的答案。

---

的「稜堡」。

<sup>8</sup> 原來於皇城的四面各有闕台；亦即「顯仁門之左，為東闕臺，彰德門之右為西闕臺，和平門之左為北闕臺」，「嘉隆初，前面正中處，為南闕臺」。原本於南闕台上建有乾元殿，明命十四年（1833年）改建成午門。

<sup>9</sup> 從「皇城」部份的記載，於太和殿前，午門後的太液池南北有「雲龍銅柱的櫺星坊門」，以及於午門的左、右有左、右「端門」，這些是否附會著「五門」的制度，似乎也有進一步討論。

##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宗教變遷

宋光宇、張珣、陳志榮、林富士\*

本計劃是本院東南亞研究計劃中，唯一一個以華人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分支計劃。在東南亞各國當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華人所佔人口比例比較高的兩個國家。新加坡的華人佔該國總人口的80%以上，馬來西亞的華人則佔該國人口的26%。其他各國的華人在各國的人口比例就相當的低。在菲律賓只佔2%，在印尼，華人雖有六百萬，但是印尼有一億人口，因而只佔總人口的0.6%。在泰國，華人傳不過三代就被同化了。因此，本分支計劃就選擇華人所佔比例比較高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國做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本分支計劃的基本假設前提如下：「台灣和新馬華人社會都是來自閩粵的移民所組成，時間上，都是十九世紀末，經過一百年的時間，各自因緣發展，而今這兩個地方的華人社會有那些相同的地方，又有那些相異的地方？」本計劃是以「宗教」作為切入的路徑，研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原始結構及其變化。

本計劃的人力配置是這樣的，宋光宇負責調查各種從中國大陸和台灣傳過去的教派和一般華人社團組織，例如德教會、世界紅卍字會、一貫道等；張珣負責調查天后（媽祖）信仰和佛教，林富士負責調查乩童和道教，陳志榮負責調查天主教和基督教。由於馬來西亞的法律規定回教是國教，馬來人信奉之，一般來自閩粵海南的華人較少信奉，也就暫時忽略不計。

本計劃的研究方法是採比較研究的方式。在同一個主題上，比較研究台灣與新馬華人社會的異同，進而討論導致這種差異的原因為何。

---

\* 宋光宇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張珣為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陳志榮為淡水工商學院宗教系系主任，林富士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綜觀這一百多年來的華人移民史，可以粗略的分成四波大移民潮。第一波移民潮是發生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年，台灣和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社會主要是由這一波移民所構成，第二波移民潮發生在一九五〇年前後，由於中共政權的建立，大約有兩百多萬人逃離大陸，主要是到台灣和香港，也有不少人移到歐美各國。第三波移民是一九七〇年代以後，從台灣移往歐美澳紐以及東南亞各國。第四波移民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移往世界各國的大陸客。各波移民在宗教方面的表現各不相同。

第一波移民主要是因為閩粵海南等地由於缺乏生計而到海外尋求發展，常見全村全族的子弟夤緣前往海外某地，共同從事某種行業。而他們在宗教方面的表現就是共同信奉家鄉的神明，如：媽祖（天后）、三山國王、清水祖師、保生大帝等。

台灣和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社會既是由第一波移民所組成，在宗教行為方面，他們都有同樣的模式：在前往目的地的時候，通常都會迎請家鄉的某一尊神明同行，以為保護神。到達目的地之後，先是將神像供奉在某人的店中或家中，或者是建一座小茅屋以奉祀之。三五十年後，由於經濟條件稍稍寬裕，就用磚瓦另建新廟來奉祀這些家鄉的保護神。以後再逐次翻修和擴建，終而有今天宏偉的廟貌。在台灣，寺廟也就成了地方的信仰中心，旁邊的空地也由於攤販雲集，發展成為市集。我們有興趣探討這種情形是不是也見之於新馬兩地的華人社會。

馬來西亞的都市大都是華人開發的，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當本計劃的成員於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十九日至二月五日，走訪吉隆坡、檳城（檳榔嶼）、怡保和馬六甲等地，看到當地有不少宗祠和會館。一般的會館在正廳，或者是最上一層樓，都會供奉一位主神和幾位陪祀的神明，形成一座寺廟，如檳城和吉隆坡的海南會館都供奉天后，廣府會館供奉重陽帝君。有一些會館，在最上層供神，中間是禮堂，可以從事各種文藝表演活動，下層是餐廳和商店，如吉隆坡的海南會館最上一層是天后宮；也有將禮堂改成旅社的例子，如馬六甲的興安會館，最上一層是天后宮，中間一層是旅社。這種會館與寺廟結合的情形已不見之於台灣社會。而台灣社會似乎也不曾普遍出現過會館。在台灣，一些百年老廟以前都是由當地的郊商所控制，而不是由會館來控制。

在新加坡，有不少的會館由於地段座落在商業區，往往與日本的大百貨公司合作，改建為高樓，成為購物中心，如新加坡的潮州八邑的義安城。已不再有祀神的功能。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新加坡政府強力營造社區，提倡國家

認同，原來華人社會的地域觀念逐漸淡薄，為國家意識所取代，會館必需改弦易轍才能生存下去。

第一波移民所建立的寺廟，跟台灣和大陸原鄉都有往來。就以吉隆坡的天后宮來說，跟台灣幾個有名的天后宮都有連繫，最近十多年，當然也跟福建湄洲的天后宮有所往來。

第二波移民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惶惶離家出走。其中包括不少住在城市中，受過現代科學教育知識份子。這波移民由於來自不同的省份，他們不太能夠認同第一波閩粵所建立的寺廟，因而在宗教上的表現，或者堅持無神論的信仰，或者是皈依具體的教派，無論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一貫道或其他教派。主要的訴求不再是先前的血緣或地緣的認同，而是個人的、疏離的、亂世的精神指引。

日據時代的台灣原本沒有正統中國叢林佛教，這一波的移民方才將大陸佛學院受訓出來的僧侶帶入，台灣才算有正規的中國叢林佛教。台灣的基督教原來只有長老教會，也是由於這一波的移民，基督教陣營方才多樣化。回教和一貫道也是這一波移民帶入台灣的。

在一九四九年大陸鼎革之際，大陸上的本土教派（也就是中共所謂的「反動會道門」）紛紛避走南洋各地。香港就成了這些教派的總部所在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由於華人眾多，自然成為這些教派寄生的所在。因此，在中國大陸已經不存在的教派，在新馬地區仍舊可以找得到，如先天大道、真空教等。這種現象對於研究中國宗教史有相當大的正面意義。

第三波移民是以台灣的商人為主要核心。一九七〇年以後，台灣商人的足跡走遍全世界，有些人為了工作上的方便而移居海外。也有人為了子女的教育問題，台灣內部的政治、治安、環境等問題而移居海外。這一波的移民潮中，夾雜著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主要的宗教團體有三，那就是慈濟功德會、佛光山和一貫道。這三個宗教團體都有很強的「傳道動機」，配合上適當的宣傳和政經關係，在全球華人社會中有良好的發展。這三個團體在組織方面各自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再加上企業化的經營手法，隨著信徒外移世界各地，在海外成立分會，向海外的華人和當地非華人族群傳道。並且不斷的組成訪道團，從東南亞各地回台灣朝聖，台灣的信眾也不斷的組團前往東南亞各地的佛堂訪問，因而增進雙方的情誼，形成一體。

在新馬地區，這三個教派近十幾年來都積極的擴張勢力。主要的對象是第一波移民的後代。因為第一波移民的後代對於原來的地域性寺廟已經不是像父祖輩

那樣的熱衷，社會環境也有所改變。當這一波的移民帶來新的宗教儀式和組織的時候，就可以吸引一批有志尋求宗教理想的人士加入。使用華文華語作為溝通交談的媒介，正好觸及這十幾年來，東南亞各國政府不再強力排斥華語華文的趨勢。

第四波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由於長期受馬克斯主義無神論的影響，對於宗教活動方面，就不像第三波來自台灣的移民那麼熱衷，出國之後，大多繼續保持無神論，有少數移民改變態度，加入第三波移民的宗教活動，於是就成為第三波移民中的宗教狂熱者宣教的對象。這波移民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在東南亞的人數不多。馬來西亞有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回教徒，在回教大學讀書，這批回教徒跟前述任何一波移民都沒有關係。

本分支計劃就是要研究第一波和第三波華人海外移民的宗教活動，探究這兩波移民在宗教方面的互動情形。第一波移民原有的宗教團體如何演變。其中當然要牽涉到移民的祖籍地的社會歷史背景、促成外移的社會文化經濟因素、移民的特質（如經濟移民、政治移民等），移民本身的性質（如商人、工人、農人、知識份子、退休人員等），移民國度所提供的資源（如馬新兩國的基本社會結構、允許華人從事的行業）異國的宗教政策（如馬來西亞的宗教司制定的宗教法，不強迫華人改信回教，但是華人也不可以向馬來人傳播儒家或佛家思想）。

宗教團體在第一波和第三波移民社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功能，以及今日的轉變，新舊移民之間的經濟互動互賴，是否影響彼此之間在宗教方面的互動，是耶？非耶？

## 巴丹群島語言的調查研究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

台灣南島語言和菲律賓語言有明顯的差異。介於這兩地區之間的巴丹群島的語言可以說是這兩個地區兩種不同類型語言的橋樑。對於巴丹語言若有進一步的認識，將有助於瞭解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歷史文化關聯。有鑑於此，我決定到巴丹群島去調查當地的語言。

蘭嶼島的雅美語隸屬於巴丹群島的語言。我從二十年前(1976年9月)開始調查雅美語言以來，斷斷續續地做了一些雅美語的調查研究。自然而然地想要進一步去認識和雅美語密切相關的其他巴丹群島語言。這是我去調查巴丹群語言的另一個動機。

巴丹群島和蘭嶼地理上很接近(約40海里)，但我們必須繞遠道而去：先從台北飛馬尼拉，再轉搭菲航的國內班機飛巴丹省的首都 Basco。過去每週只有兩班飛機，故須提早訂機位。(按：目前每週有三班飛機，但風速超過標準就停飛。)我前兩次都沒去成。第一次原已訂好班機的座位，卻因我調查小黑人語言時，天氣炎熱，衛生欠佳，嚴重腹瀉而被迫臨時取消行程。第二次因旅行社作業上的疏忽，最後我只得到從馬尼拉飛 Basco 的座位，卻沒有回程的座位，我擔心到了那邊被放鴿子又沒去成。直到去年(1996)三月下旬才首次到達巴丹島做了初步的調查，只待了一週，蒐集了一些初步的語言資料。今年(1997)2月16~26日再度赴巴丹島做進一步的調查，補充一些方言的資料，並曾坐渡船到另外一個大島 Sabtang 調查，進一步瞭解兩島之間的異同。

到了旅館(Mama Lily's Inn)放下行李之後，我就先到省政府拜會省長

Governor Telesforo F. Castillejos，他表示歡迎我去做學術調查研究。然後我去拜訪 Dr. Hornedo 和 Saint Dominic College 校長 Mrs. Alcantara，請他們介紹發音人。得到他們的首肯和幫忙，我的調查工作就容易進行了。我要感謝日本姬路獨協大學山田幸宏教授來信介紹我去見他們。他們都很友善。省長告訴我他來過台灣洽談漁業糾紛事務。他提到台灣漁民時常侵入菲律賓領海並非法捕魚，造成雙方合作上的困擾。那次拜會過後不久，有個警察到旅館打聽我到那裡去做什麼。我請旅館的服務人員轉告他，我去拜會過省長。以後再也沒人懷疑我到那裡的動機了。

史語所考古組陳玉美曾到過巴丹群島調查。她給我相關的資訊很有幫助，包括旅館和找發音人。我在旅館住了三天之後，旅館又住進了三、四個菲律賓人。他們是教育界的人到那裡開會。後來他們就邀我和他們在週六一起環島訪問了，由省長公子開車導遊。我們本來想要去聽一位老婦人唱傳統的歌謠叫做 Iðji，可惜事前並沒約好，她已到田裡工作去了。省長兒子名叫 Christian，他後來就成為我很好的發音人。他講 Ivasay 方言，大學畢業，在省政府服務，反應非常靈敏，而且很熱心，又有耐性，在短時間內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語言資料。

巴丹群島由三個較大的島：Batan(中)，Sabtang(南)，Itbayat(北)和一些小島組成。其地理自然環境和人種語言都和蘭嶼很相似。沒有高山，但有很多漂亮的海灘。他們的房子雖然矮小，但都在地面上，不像蘭嶼傳統的房子向地下挖以防颱風的侵襲。Basco 的街道狹窄，都鋪了水泥路。島上的交通主要是靠小吉普車(jeepney)。島與島之間的交通都靠小船。Batan 和 Sabtang 兩島很近，船行約 30分鐘就可抵達，但從 Batan 到 Itbayat 卻遠，船行需四小時。巴丹島上傳統的房子由石灰岩和石灰搭建而成，有一層或兩層樓。颱風破壞了椰子和香蕉樹，因此不容易買到椰子和香蕉，但有一些蔬菜、番茄。

Sabtang 島比巴丹島更像蘭嶼島，它的自然景觀、生長的植物(如林投和各種台灣稀有的植物)、海岸、環島公路(大都是碎石子路和泥土路，沒鋪水泥或瀝青)，多保持原始和自然的環境。房屋牆壁多由石灰岩石所築，屋頂蓋茅草。有不少房子毀壞或廢棄了，可見人口外流嚴重，從外地遷移進來的大概絕無僅有。Sabtang 島有好些景觀的確非常像蘭嶼。環島道路比蘭嶼的要寬一些，陡坡卻比蘭嶼的要陡，而且平坦的地也要比蘭嶼的寬闊些。有的村落很偏僻，交通不便，雖然家家戶戶捕魚，卻賣不出去，就曬魚乾保存。我看

到用竹竿曬魚乾，又想到此地和蘭嶼的習慣也相同。

蘭嶼有許多芋頭田，巴丹島卻不見芋田，而有玉米田。蘭嶼養的豬到處跑，巴丹的豬卻用繩索鏈住。巴丹島有水牛、黃牛、羊，也有牧場，牧場是最近才開發的。海上魚資源豐富，旅館供應的三餐都有魚，包括石斑、龍蝦等昂貴的海鮮。

巴丹群島的語言主要分布於巴丹群島的三大島、蘭嶼島、以及 Babuyan 群島中的 Babuyan 島。這些島上語言的密切關聯，早在二次大戰前夕日本學者如鹿野忠雄(1941)就舉出許多動植物名稱之相同來證明了。巴丹群語言的比較研究資料，後來有 Tsuchida, Yamada and Moriguchi(1987) 列舉了851個詞彙比較表，Tsuchida, Constantino, Yamada and Moriguchi(1989) 列舉了590個句子或單語比較資料。這些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語言比較資料。一週內我核對了其中部分詞彙資料：Ivasay 方言的851個詞彙全部核過一遍，核對改正鹿野(1941)論文中 Itbayat 和Ivatan的各種動植物名稱，記錄了 Itbayat 一些句法結構方面的句子。第二次再去時，Itbayat和Isamorong方言的851個詞彙也都全部核對過，並且補了原書中的一些缺漏。

森口(Moriguchi 1983)曾發表過一篇論文，根據他對巴丹群語言的分類，他提出早期巴丹群的分化和遷移歷史。在 Babuyan 服務多年並熟知當地語言情況的 Rundell Maree 不接受森口的說法。如今我對巴丹群島各種語言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看到幾條有趣的語音對應關係，我想我也可以有提出比較令人滿意的分類，並根據我的新分類法來推斷巴丹群的遷移歷史，包括蘭嶼雅美人的來源和遷移路線。

本計畫成果之一是一篇書評，評論東京大學出版的Lists of Selected Words of Batanic Languages by Shigeru Tsuchida et al(1987)，將刊於 Oceanic Linguistics 期刊。另一篇是論文，探討巴丹群語言的分類及其種族遷移問題。

## 参考書目

鹿野忠雄

1941a <パシ海峽を中心とせる台湾とフィリピンの文化關係 動植物語彙より見たる>, 《人類學雜誌》56.8.

1941b <動植物名より見たる紅頭嶼とパタン諸島の類緣關係>, 《人類學雜誌》56.8: 434 ~ 446.

Moriguchi, Tsunekazu 森口恒一

1983 Linguistic survey: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Ivatan dialects. Batan Island and Northern Luzon: Archaeological, Ethnographical and Linguistic Survey, 205 ~ 253, University of Kumamoto.

Tsuchida, Shigeru, Yamada, Yukihiro & Moriguchi, Tsunekazu

1987 Lists of Selected Words of Batanic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Tokyo.

Tsuchida, Shigeru, Constantino, Ernesto, Yamada, Yukihiro & Moriguchi, Tsunekazu

1989 Batanic Languages: Lists of Sentences for Grammatical Features, University of Tokyo.

# GATT 烏拉圭談判協議對菲律賓經濟的衝擊

徐正光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

## 一、GATT 簡介與烏拉圭談判

GATT 成立於 1947 年，從一開始的 23 個創始國，擴充至目前的 118 個國家，佔全世界貿易總量的 90% 左右。菲律賓在 1982 年也成為 GATT 會員國之一。GATT 堅持自由貿易的精神，它的主要原則包括非歧視性、相互性、與透明性的貿易原則。

GATT 透過持續不斷的協商談判，來逐步達成減少貿易與關稅障礙的目標。GATT 的第八次談判，也就是烏拉圭回合談判，是目前為止對世界貿易影響最為深遠的談判。烏拉圭談判開始於 1986 年，它的協商範圍包括許多傳統上未曾進入國際貿易協商的議題，例如農產品貿易、服務業、銀行、金融業、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國投資等。GATT 協議期望對世界貿易的前景做出良好的規畫，諸如最惠國優惠待遇、制度化的多邊貿易協商、進口數量限制的取消、非歧視性的貿易規範、將非關稅貿易障礙予以關稅化、防止惡性的貿易報復戰爭等等。

## 二、烏拉圭談判協議內容

經過長達七年之久的協商過程，烏拉圭談判終於在 1993 年 12 月 15 日完成談判。烏拉圭談判最後協議書多達 500 多頁，以下是協議內容的大要：

## (一) 農產品貿易

烏拉圭談判對於農業問題達成四項主要協議：

(1) 將所有對農產品所施加的進口數量限制，全部予以關稅化。進口數量限制是該國政府所強制，以拒絕或是限制其他國家農產品的進口數量，它包括發放進口執照、數量配額、禁止進口等形式。GATT 烏拉圭談判所達成的農業協議下，這些數量限制都將被取消 GATT 的會員國則可以改以關稅的形式，對這些產品課以同等於數量限制下的關稅稅率。

另一方面，為了補償因為進口數量限制的取消，而導致農業生產者所受到的衝擊，GATT 也有一個特別的防衛條款 (safeguard)。

(2) 綜合性與廣泛性地降低農業產品的關稅。在 GATT 的協議下，各個會員國必須對農產品的關稅，設立 (限制) 一最高關稅額度。開發中國家必須在十年之內 (從 1995 年起算)，將各項關稅至少減少 10%，平均至少減少 24%；已開發國家則必須在六年之內 (從 1995 年起算)，將各項關稅至少減少 15%，平均至少減少 36%。

(3) 減少國內的農業津貼，在 GATT 協議下，每個會員國必須計算其國內對於農業生產的津貼，這些津貼的總額稱為 AMS (aggregate measure of support)。開發中國家必須在十年之內，將 AMS 減低 13%；已開發國家則必須在六年之內，將 AMS 減低 20%。

另一方面，政府鼓勵農業投資的措施、以及為了發展農業而對生產投入所做的津貼，則不在這個範圍以內，只要這些津貼不是直接給予生產者。

(4) 減少出口津貼。開發中國家必須在十年之內，將受到政府出口津貼的農產品數目減少 14%，在同一段時間之內將政府的津貼總額減少 24%；已開發國家則必須在六年之內，將受到政府津貼的農產品數目減少 21%，在同一段時間之內將政府的津貼總額減少 36%。

(5) 協調衛生檢查標準與規定。衛生標準的擬定將基於國際標準、或者是由國際機構所建議的。

## (二) 服務業

服務業的範圍包括銀行、保險、旅遊運輸、顧問、電信、會計、電影和電視、勞動供給等。建立服務業的新規範是基於兩個理由：首先，根據 GATT 以往的經

驗，服務業貿易開放與自由化協定，將會強力地推動服務業貿易的成長。其次，如果沒有多邊貿易協定，各國政府恐怕會對服務業採取貿易保護措施。

### (三) 智慧財產權保護

智慧財產權的範圍包括技術、研究、發展、創新等。烏拉圭協議最終對智慧財產權達成廣泛的共識，涵蓋專利權、複製、錄音帶創作保護、商標、工廠設計、積體電路、商業機密等。

### (四) 紡織與成衣貿易

自從 1974 年起，大多數工業國家都透過 MFA(multifibre arrangement) 的雙邊進口限額協商，限制外國紡織品與成衣的進口。在 GATT 的規範下，進口限額與 MFA 都是非法的貿易措施。除了西方國家利用 MFA 以作為限制紡織品與成衣進口的手段之外，許多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也通常對紡織品與成衣進口課以高額度的關稅。烏拉圭協議預計在十年之內逐步地廢除紡織品與成衣的進口限額，並且減少其進口關稅。

### (五) 反傾銷與安全防衛措施

GATT 明令規定，如果出口國有傾銷的情形發生，進口國就可以對這些產品採取特別的關稅。此外，當國內特定的工業，極有可能因為大量進口而導致國內生產者嚴重的損害時，進口國就可以採取安全防衛措施。

### (六) 貿易規範制訂

GATT 在 1995 年起將由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所取代。WTO 貿易規範的制訂，是要將透明性、可預測能性、穩定性等原則帶入貿易政策及貿易協商當中。

### (七) 紛爭處理程序

在烏拉圭談判的最後協議中，各會員國同意不再採取單邊性的貿易行動，並將遵循 WTO 貿易紛爭處理體系，遵守紛爭處理的規範與程序。在 WTO 的架構下，將有一個紛爭處理委員會(DSB, dispute settlement body)，負責處理所有的貿易糾紛。DSB 得以組成調查小組、採用調查小組的報告、監督協議結果的執行、在當事國家不確實執現行協議時，授權報復性的貿易措施。

### 三、菲律賓簽署烏拉圭協議

在菲律賓國會進行投票，至如歸以便決定菲律賓是否簽署 GATT 烏拉圭回合談判以前，菲律賓國內對於簽署該協議的爭論焦點，其實已經從原本的簽署與否，轉移成為要求政府對未來貿易局勢提供一個合理的保護措施。菲律賓國會在 1994 年 12 月 14 日簽署了 GATT 烏拉圭談判協議，菲國政府同時整合各方的意見，擬定了一份行動計畫(action plan)。在政府的行動計畫中，對菲國既有的法律與行政規定作了大幅的修改，其目的是要讓菲國的法律得以不違背烏拉圭協議的事項，同時保護國內的經濟以避免來自國外貿易的衝擊。

菲國既有的法律中，需要進一步做修改的包括修改關稅條款；反傾銷立法；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律，進口數量限制與禁止部份農產品進口的相關法律。

### 四、菲律賓官方的行動計畫

菲國官方在行動計畫中，擬定了一系列在 GATT 烏拉圭協議生效前後，所必須完成的改革事項。目前菲國官方已經完成的主要事項包括：

- (1) 反傾銷法案的制訂。
- (2) 提高農業部的經費預算。
- (3) 由內閣成立委員會，以監管菲國所允讓的最低進口數量等事項。
- (4) 由於菲國在簽署烏拉圭協議時，對於糖類與頭豬的進口數量作了過於放鬆的數量，菲國官方因此希望透過技術性的修正，減少這些商品的進口量。
- (5) 籌募 720 億披索，以作為農業中期發展計畫 (MTADP) 所需資金。
- (6) 允許玉米與稻米的出口。

### 五、尚待執行的行動計畫

菲國在烏拉圭協議中所做出的一項重要決策，就是將農產品的進口數量限制，全部予以關稅化。這項措施目前尚未執行，但是草案已經完成，並且即將舉行公開的公聽會。

在烏拉圭協議生效之後（也就是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立日），菲國國會預計陸續推動以下的法案：

- (1) 修改馬可仕時期發佈的第 717 號總統令。

馬可仕政府時期曾經針對農村資金借貸，發佈了所謂的第 717 號總統令 (president decree 717)。該法令規定農村銀行必須將 25%的資金借貸給農業部門，其中的 10%是作為農業改革基金，其餘的 15%是作為農業生產借貸。由於該法令允許銀行將 10%的資金購買政府公債，使得大部份的銀行都將農業改革基金移作他用。同時，銀行對於小型農戶的償還能力普遍不信任，使得剩下 15%的資金，通常是貸放給大規模經營的農戶。

受到農業部所支持的 Teve's 法案，則是要彌補第 717 號總統令的漏洞，禁止銀行將農業基金用於購買政府的公債。該法案建議，75%左右的農業基金應該嚴格地使用於農村信用借貸，其餘的 25%則由銀行自行運用。

## (2) 保護當地的農作物品種

菲國的科學家也正在推動一項法案，以保護菲律賓農作物的基因資源 (genetic resources)。菲國的科學家擔心在世界貿易組織連作之後，菲國的農作物品種會因為專利權的緣故，而落於外國公司的操縱之中，這項措施因而是因應這項恐懼而有的立法。

## 六、菲律賓在談判中所做的承諾

由於農產品出口貿易佔了菲律賓國民生產總額相當大的比重，農產品協議對於菲律賓更是顯得重要。基於菲律賓在談判中所做出的承諾，菲律賓必須在農產品貿易方面，執行以下的事項：

(1) 取消所有對農產品的進口數量限制 (稻米進口除外)。目前，菲律賓實施進口數量限制與執照規定的農產品項目包括：玉米、家畜、家禽與肉類製品、大蒜、洋蔥、茄子、咖啡與其產品。在去除這些產品的數量限制之後，官方的第 470 號命令 ( executive order 470) 將對這些農產品課以等同於兩倍數量限制下的關稅稅率。

基於糧食供應安全的考量，開發中國家 (例如菲律賓) 被允許可以保留部份的數量限制。菲律賓的稻米進口數量限制將可以繼續保留十年，但是菲國也必須同時為這項特權付出代價，也就是菲國必須從 1995 年開始，每年進口相當於其國內稻米消費總額的 1%的稻米進口數量。

(2) 減少農產品的關稅。農產品的數量限制取消之後，菲國將對這些產品訂定相當兩倍於既有關稅的稅率。比較重要的產品例如玉米、家禽與家畜製品，最高

關稅將訂定在 100%。對於不受到數量限制規定保護的農產品，一開始的最高關稅稅率，將訂定在比既有稅率高出 10%。同時必須在 2005 年以前降低關稅稅率 10%。受到 GATT 東京協商的農產品，則最高關稅則維持在目前既有的稅率，並且在 2005 年以前降低 10%。

- (3)減少國內的津貼。菲律賓目前對國內的稻米、玉米、椰子、糖類等實施津貼，這些津貼都是採取生產支持性措施的形式，例如肥料、種子、價格支持等。由於菲律賓對這些農產品的津貼都低於 10%，因此菲國沒有義務減少這些農產品的津貼數量。
- (4)減少出口津貼。由於菲律賓並沒有對任何農產品實施出口津貼，因此不需做任何調整。
- (5)協調衛生檢查標準與規定，以符合國際標準。

## 七、菲國官方的意見與措施

### (一) 簽署烏拉圭協議的理由

菲律賓政府認為，GATT 的會員國可以獲得以下三項利益：

- (1)更多出口與賺取出口所得的機會。由於各項協議的簽訂，使得會員國家更有機會將產品銷售至其他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出口市場的擴充也會給國內經濟的成長帶來乘數效果。
- (2)由於 GATT 穩定與透明的貿易規範，使得投資與貿易活動將獲得改進。在 GATT 的規範下，隨意的關稅稅率、限制性的進口配額、非關稅貿易障礙等，都將被減少至最低。
- (3)對於缺乏經濟資源與政治影響力的國家而言，GATT 可以確保他們在國際貿易上獲得平等的對待。GATT 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非歧視性原則，在該原則之下，會員國的產品在其他國家市場將會獲得平等的對待。同時在 MFN (Most Favored Nation) 的制度下，任何一個國家在貿易上所做的讓步，也同時適用於其他會員國家。

菲國官方認為，烏拉圭協議內容廣泛，包括全球 118 個簽署國，涵蓋全世界貿易總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菲律賓如果不簽署烏拉圭協議，就會孤立於世界經濟之外，並且遭遇貿易的歧視。菲律賓將會喪失與各貿易國間的優惠關稅，並且

可能面臨來自美國的單邊貿易壓力（例如 301 條款）。以農業協議為例，如果菲律賓拒絕簽署烏拉圭談判農業協議，菲國的農業產品將隨時可能面臨高關稅與其他形式的貿易障礙。菲國的農產品將更無法進入國際市場，也會進一步導致就業機會減少與所得降低。

## （二）菲律賓在烏拉圭農業協議所獲得的利益

菲律賓官方認為，菲律賓加入烏拉圭協議的直接利益包括：350 項出口產品，獲得平均 35% 的關稅調降；主要貿易國家平均關稅降低幅度分別是，日本降低 45%，歐洲共同市場降低 27%，美國降低 21%。菲律賓也會間接地因為其他國家間的最惠關稅待遇，而獲得將近 35% 的關稅降低。工業國家降低其農業津貼數額，也會使得菲國的農業出口更具有競爭力。

由於關稅降低、數量限制的取消、國內與出口津貼的降低，世界農產品的貿易將會大幅成長。GATT 在日內瓦的秘書處估計，全球貿易量將會增加 12% 左右。僅就農產品而言，貿易量將會增加 20%。菲律賓可望獲得的利益包括：

- (1) 每年農產品貿易的淨收入，增加大約 34 億披索。
- (2) 每年農業生產總附加價值增加 600 億披索。
- (3) 每年產生 500,000 個就業機會。

菲國官方強調，這些利益都是最保守的估計，也都是菲國在簽署烏拉圭談判協議之後，最起碼可以獲得的利益。

許多反對 GATT 新協議的人士認為，烏拉圭協議將會損害菲律賓農民的生活水準，加劇菲國農村的貧窮化。菲國官方認為，這類看法是過渡誇大了新協議的負面衝擊。

菲國官方並且提出數點理由加以反駁：

第一點，烏拉圭農業協定將農產品貿易納入 GATT 的貿易規範範圍，其最終結果，將會增加不實施農業津貼的農業出口國家（菲律賓是其中之一），在世界農業貿易中的市場佔有率。

菲律賓長久以來一直是個農業淨出口國，已開發國家對於農業生產與出口的不公平津貼，以及菲國出口市場的逐漸萎縮，一直對菲律賓經濟造成負面的影響。已開發國家不公平的農業津貼，減少了開發中國家的農業出口收入，造成農產品價格的扭曲並且減少菲律賓出口農業的競爭力。一旦農業貿易被納入 GATT

的規範，已開發國家必須停止不公平的農業津貼，菲律賓因此而獲得的利益，將遠大於因其本身開放進口所造成的損失。

第二點，雖然菲律賓必須開放農產品的進口，但是新協議也同時提供對付不公平貿易的措施，以及內在調整機制，以減少不必要的成本扭曲。

首先，當原本屬於非關稅貿易障礙範圍底下的產品，取消非關稅貿易障礙而轉變成為關稅形式時，該國可以增加該項農產品的關稅，以補償國內的生產者。其次，開發中國家可以有十年的時間，視情況逐步調低其國內的農產品關稅。此外，當國外大量的進口嚴重損害國內農業部門時，該國可以採取特別的防衛措施。

第三點，已開發國家將會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創造出口農作物的新市場。依據烏拉圭談判協議，已開發國家必須在六年之內，減少其農產品關稅的 36%。相對地，開發中國家則必須在十年之內，減少其農產品關稅的 24%。根據 GATT 秘書處的估計，這將使得每年的農業出口增加 20%。

為了促進農業貿易的透明性，GATT 的會員國必須停止非關稅貿易障礙措施，例如進口數量限制等。會員國必須將非關稅貿易障礙予以關稅化。此外，協調各國的衛生檢查規定，建立會員國互相認可的衛生檢查程序。

第四點，在 GATT 的新協議之下，政府依然可以提供基礎建設等提高競爭力的措施，這些措施的實施，將會使得菲國農民在新協議之下獲得利益。

GATT 協議允許菲律賓採取國內支持政策，以增加菲國農業競爭力與確保糧食供應安定（先決條件是這些措施不能具有提供價格支持的作用）。這些措施包括：研究與開發、蟲害與疾病防治計畫、訓練服務、農業諮詢服務、行銷促進服務、基礎建設、農業改革。這些援助計畫的實行，都必須符合公開透明的原則。

### (三) 烏拉圭談判農業協定對特定農業部門的影響

菲律賓官方對於 GATT 對國內農業部門的影響，做了以下的評估：

#### (1) 稻米

在新協議之下，稻米所受到的衝擊影響並不大。基於糧食供應安全的理由，菲律賓可以延緩其稻米進口限制的關稅化。同時，菲國所承諾每年所必須進口的稻米數量，也只佔了國內稻米消費的極小部份。

#### (2) 玉米

玉米的數量限制在取消之後，則代以課徵關稅的形式。菲國對玉米進口所設定的最高關稅為 100%，並且預計在 2005 年以前降低到 50%。由於以往菲國國內的玉米批發價格都高於國際價格 50% 左右，因此 100% 的最高關稅將足以對

國內的玉米生產者提供保護。烏拉圭協議使得玉米貿易透明化、穩定化，最大的獲益者就是國內的家畜畜養部門。

### (3) 糖類

歐洲國家與美國減少其國內對於糖類生產的津貼之後，世界糖類價格也會跟著上升。但是根據估計，糖類價格上升的幅度將不會高於 1%。

從 1980 年至 1993 之間，世界糖類的平均價格是每磅 10.5 分。而菲律賓糖類的價格則高達每磅 16.5 分，在如此大的價格差距下，烏拉圭協議對於菲律賓糖類的出口，似乎無法給予菲國糖類提供任何貿易市場。但是在 GATT 防衛條款之下，菲律賓的糖類生產者，將不用擔心會面臨外國糖製品大量傾銷至國內的情形。同時，美國在 2001 年取消其糖類進口限制之後，對菲國的糖業也將有所影響。

### (4) 肉類

在烏拉圭協議生效之後，國際豬肉價格預計將會上升 7%。亞洲地區對於豬肉與家畜產品的需求，估計將會增加 1.5 億美元左右。其中大部份的需求都是來自東亞地區，例如日本、南韓、香港等。許多研究都指出，菲律賓在家畜生產上具有比較利益（特別是豬肉），如果菲國可以降低飼料的成本、提供適當的公共投資，菲國將極有可能成為東亞地區主要的家畜供應者。

### (5) 簽署烏拉圭協議的成本

菲律賓官方也承認，雖然總體來說，烏拉圭協議的簽署對於菲律賓是有利的，但是菲律賓也必然要承擔負面的衝擊。

菲律賓貿易暨工業部認為，新協議導致菲國經濟損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菲國不再享有出口至美國的優惠關稅，以及成衣、糖類製品出口至美國的優惠配額。菲律賓出口一直相當依賴美國的優惠關稅，也相當依賴每年出口至美國的成衣與糖類製品的配額。這些優惠措施一旦取消，將給菲律賓經濟帶來相當負面的衝擊。

菲律賓加入烏拉圭協議的成本包括：2664 項工業產品與 537 項農產品的關稅，其最高進口關稅稅率不得比 1995 年的關稅高出 10%；114 項農產品關稅不得比 1995 年的關稅多過 5%；必須在十年之內降低 12 項紡織品與 27 項農產品的關稅。菲律賓也必須修改國內的法律，以符合 GATT 的協定；菲國也必須取消其 93 項農產品的進口數量限制，並代之以關稅的形式，且不得超過 1995 年關稅的兩倍。

## 八、反對者的意見

### (1) 不平等的貿易依賴

GATT 的新協議預期將會造成世界貿易的巨幅成長。但是開發中國家最為關心的，並非是全球貿易的增加，而是該國的所得是否可以改善，是否可以縮減貿易赤字？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長久的貿易不平衡與逐漸擴大的不平等，正是反映了它們之間不平等的依賴關係。第三世界國家的出口，大部份是屬於勞力密集的產品，例如紡織與鞋類就佔了四分之一。初級產品以及未加工產品，是第三世界與世界貿易最主要的聯繫。在自由化實施之後，第三世界原本已經逐漸惡化的貿易條件，可以預見會更加惡化。

### (2) 危害糧食供應安全

在 GATT 新協議的農業貿易自由化之後，菲國勢必以糧食進口，作為解決國內糧食生產不足的手段。但是，這並沒有根本解決菲國糧食供應不足的問題。菲國糧食供應不足的原因，來自於當地稻米生產力的不斷下降，國內稻米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等因素。許多農業用地轉變成為非農業用地，以及糧食生產轉變成為出口農作物生產，都加速了糧食供應不足的趨勢。

即使面臨糧食短缺的情形，菲國政府依然在規畫不切實際的計畫。菲國官方計畫經由密集農業耕作，在西元 2000 年達到糧食供應自足的目標，並將多餘的稻田，轉變成為種植具有經濟價值的出口農作物。

### (3) 加劇土地壟斷

到目前為止，菲律賓政府所實施的土地改革計畫，只達成了計畫中的 20%。即使是在稻米耕地，土地改革實施的比例也遠低於計畫中的目標。另一方面，菲國法律雖然不允許外國企業擁有土地，卻允許它們以極為低廉的價格租借土地，借期為 50 年，租約終止後可以再延長 25 年。這種長時期的租借，其實與直接擁有土地並沒有兩樣。

在面臨土地的壟斷未獲得改善，加上土地計畫的微小成效，GATT 新協議將會加劇土地所有權（控制權）的不平等。自由貿易與市場機制，只會使得土地更加集中到那些原本在經濟上就佔有優勢地位的人。

### (4) 農村的貧窮化

GATT 勢必對菲律賓的農業發展造成影響。不幸地是，從 1986 年的談判開始，菲國的農民就鮮少被告知 GATT 的協商，與可能帶來的農業貿易衝擊。

GATT 新協議對於菲國衝擊最大的就是農業部門。傳統的糧食作物（例如稻米與玉米）與傳統的出口農作物（例如椰子、糖）佔了菲國農業面積的 90%，在自由貿易之後，這些農作物的國內市場，將會面臨來自其他國家，價格也較為低廉的進口農作物的競爭。進口稻米與玉米充斥菲國市場，將會導致國內糧食價格的下跌，農民收入減少（甚至破產），負債增加。根據菲國農民協會的估計，只有非傳統的出口農作物（例如蘆筍、芒果、鹿角菜）可以從全球農業貿易自由化當中獲益，但是這些非傳統的出口農作物，只佔菲國農業面積的 5% 不到，無法補償其他部門所遭致的損失。

不論是在生產或是出口津貼，菲律賓的農民幾乎很難獲得國家的支持。菲國政府所提供的基礎建設、服務設施等也是相當的貧乏。因此，自由貿易的實施將會造成菲國農業生產的降低、普遍的貧窮、農村失業增加、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導致社會政治的不安定。

由於菲國將近一半以上的人口都是屬於農業部門，政府的農業津貼又是極端地少，因此法律所規定的進口數額限制，就成了唯一能夠保護菲國農民的措施。因此，除非基於國內生產的不足，政府不應該進口國內已經有所生產的農作物。但是菲國官方顯然並沒有這樣的認識。當各國協商代表盡其所能為各國的農民爭取利益時，菲國的協商代表，卻輕易地將菲國農民的利益拱手讓出。

#### (5) 政府缺乏與民間溝通

從烏拉圭談判一開始，菲國政府就從未告知民眾談判的進展情形。民眾不知道政府官員在談判時採取的立場，政府對 GATT 所做的承諾等等。在其他國家，談判代表不但要定期向國會報告進展，也要告知社會中不同的部門。但是在菲律賓，官方與民眾對於 GATT 的協商一概不知，政府只是一再地給予民眾空洞的承諾，例如自由貿易會增加民眾福利等等。協商代表或是國會議員，甚至不瞭解 GATT，以及菲國到底做了些什麼承諾。在協商的過程中，談判代表從未徵詢民眾的意見，只是不斷給予籠統的保證。菲國的商人與企業也未曾被諮詢。反對者認為，應該公開地詳細討論 GATT 談判的各項細節，特別是農民與工人，更是需要被諮詢。

另一方面，菲律賓全國對於即將來臨的世界新經濟秩序，並未做好應該有的準備。官方對於即將來臨的全球貿易戰爭毫無準備。政府在各種場合不斷地宣傳

GATT 新貿易協定的利益，卻從不提及菲國農民與工業可能遭遇的損失。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之下，世界貿易的擴充，也未必意味著菲國可以從中獲得利益。整個情形，就彷彿菲國發生在 1980 年至 1985 年的結構調整計畫 (SAP) 一樣，菲國政府不但對於結構調整計畫毫無準備，政府的技術官僚在決策過程中，也未曾做到告知民眾的責任。

## 九、農民協會的意見

菲律賓農民協會認為，GATT 新協議確實會帶來部份貿易的獲益，但是受到 GATT 影響最大的農民，將無法分享到這些利益的任何部份。菲國政府同意取消進口農作物的配額、減少進口關稅，這些措施將會導致菲國農民面臨更為廉價的進口農作物競爭。已開發國家的農民長久以來，一直享有該國政府的政策支持，菲國農民根本無法與他們競爭。

農民協會認為，工業國家一直致力保護其國內的農業部門，相對地，菲律賓政府幾乎未曾給予農民任何協助。從馬可仕政府晚期，到艾奎諾政權，到目前的羅慕斯政府，菲律賓農民，總是成為自由化措施中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農民協會認為，從 1950 年開始的國家政策，就一直忽略農業部門的利益。政府幾乎不提供任何農業津貼，計畫中的穩定價格措施成效也不大，即使到現在，政府都還在計畫逐年減少稻米的收購比例。

除了政府的撒手不管之外，另一項農民增加的負擔，就是生產成本的上升，包括專利權與農業投入產品的上升。近年來的資料顯示，菲律賓正逐漸喪失出口農作物生產的比較利益，這是因為生產成本昂貴、缺乏政府技術的支持、小農民沒有誘因去改善其生產。農民協會認為，政府如果要開發農業的潛能，挽回已經喪失的優勢，就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這些改革必須包括打破土地所有權、資金與資本、投入與技術、銷售市場等的壟斷。

農民協會強調，他們並非認為自由化一定是不好的，他們真正反對的是，政府在每次的自由化措施中，總是以犧牲弱勢的農民利益為代價，這正是農民協會反對 GATT 新協議的原因。農民協會也認為，菲國政府不斷地宣傳 GATT 新協議給菲國帶來的光輝前景，卻從未真誠地說明，是哪些人正為此付出成本與代價。

## 十、改善勞工待遇的立法

烏拉圭談判具有爭論性的議題之一，就是工業國家要求各國同時改善勞工的

生活水準，並且堅持勞工社會福利、最低工資等議題是與自由貿易互相關連的。美國與歐市等國，都同意將最低工資等立法納為世界貿易組織規範的一部份。另一方面，這項建議卻無法為開發中國家所接受，例如印度、馬來西亞、巴西、新加坡等國家。

勞工團體的人士主張，菲律賓政府應該訂定勞工的社會條款，以確保勞工的福利與保護勞工的利益。目前菲律賓勞工雖然有憲法、勞工法律等的保障，但是這些都未曾真正落實。勞工團體因此主張訂立社會條款，以便確保這些法律的實行。特別是菲律賓在烏拉圭貿易談判之後，必須逐步走向貿易與經濟的自由化，並且面臨來自世界其他國家的競爭。國際社會都普遍強調勞工生活水準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連，並且認為不能以剝削勞工作為提高競爭力的手段，而是應該讓勞工也能同享自由化所帶來的益處。相對地，菲律賓政府在確保勞工福利方面幾乎是沒有做出什麼努力，對於勞工在自由化之後所面對的處境也不加以關心。

## 十一、結論

面對 GATT 對國內經濟（特別是農業）可能造成的衝擊，學者對菲國未來提出了幾項建議：政府在短期之內應該廣泛地徵詢社會對 GATT 新協議的意見；告知民眾協商的進度與情形；凝聚廣泛的共識；加速土地改革的速度。長期的措施則包括：反省與修正菲國的農業中程發展計畫；防止任何企圖阻撓農業改革實施的立法；政府全力支持糧食供應自足；對農民提供資金、設備、灌溉、行銷等的支持性措施。最重要的是，民間應該更積極參與協商，主動地監督政府在各個階段的執行成效。

# 日本之東南亞佔領與「解放史觀」\*

後藤乾一\*\*著

周婉窈、酒井郁、蔡宗憲\*\*\*譯

## 序言

本章根據「戰後五十年」的諸種論議，探討戰後日本如何認識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東南亞的統治問題。尤其是，在各式各樣的戰爭認識論中，針對「解放史觀」的觀點，考察其受到提倡的背景以及該史觀的邏輯，並以身為東南亞研究者的立場，嘗試提出此一史觀之妥當性的問題。

## 一、「戰後五十年」與亞洲之認識

戰後日本一般的傾向是，政治領導者對於近現代史中的日本與亞洲近鄰各個地域與各個民族的關係，甚少明確地表明自己的歷史認識。在「日韓基本條約」簽字（一九六五年六月）之前，針對「日韓合併的是與非」之質問（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眾議院預算委員、社會黨野原覺議員），當時首相佐藤榮作回答說：「這類事情的最終結論，該由所謂的歷史家來做決定。」此外，近年來竹下登首相所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評價應「委託給後世的歷史家」，對此發言，我們的記憶猶新。

---

\* 原稿發表於「東南アジア史中の日本佔領—評價と位置づけ—」討論會（日本逗子市，1995年11月3-5日），修訂稿收入《東南アジア史中の日本佔領期》（東京：早稻田出版部，即將出版）。本文譯自修訂稿。

\*\* 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 周婉窈，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酒井郁、蔡宗憲，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在此「傳統」之下，一九九三年八月，由於自民黨單一政權的垮臺而成立的聯合內閣，其首相細川護熙在就任後（八月十日）的記者會中非常明確地表示：「我認為上次的大戰是侵略戰爭，且是錯誤的戰爭。」（不過，對於「上次的大戰」沒有給予具體的定義。）一般而言，這項聲明在國內外頗受好感，但在某些政治、社會集團間引起很大的反彈。尤其是變成在野黨之自民黨的靖國關係三協議會（「報答英靈之議員協議會」、「遺族議員協議會」、「全體參拜靖國神社之國會議員之會」，主席是原田憲），在細川發言後的十一日，以緊張役員會為首展開熱烈的批判活動，到了廿三日，發起「歷史 檢討委員會」（會長為山中貞則），頌揚的「宗旨」是「如細川首相的『侵略戰爭』發言與聯合政權的『戰爭責任之謝罪聲明』的意圖等所見的，對於這種以反對戰爭為名，偏執、自虐之史觀的橫行無法坐視，所以我們確信，基於公正的史實確立日本人自身的歷史觀是一項緊急的課題」。<sup>1</sup> 結果，兩週之後，在國會初次的「信念表明」中（八月廿三日），細川首相撤回「侵略戰爭」，改成「侵略行為」、「殖民地支配」等低調的說詞。（雖然如此，細川首相的態度得到高度的支持，例如，根據《朝日新聞》的民意調查，百分之七十六的人回答「值得稱許」。）我認為徹底地檢證這兩週間環繞著細川之發言的政治、社會過程，是明瞭現代日本的戰爭認識之構圖的重要課題。<sup>2</sup>

總之，在國內政治方面，細川的發言在爾後戰爭認識的論爭上投下巨石，惹起風波；在國外方面，以亞洲近鄰諸國為中心所產生的肯定性的反響，也是一樁事實。那麼，日本近現代史研究者之間將如何為細川的發言作定位呢？撇開所謂的「解放戰爭」史觀和「自衛戰爭」史觀等立場來批判的評價不談，我認為尚存在著兩個相異的見解。例如，江口圭一認為，「盡作惡政」的細川首相其「唯一的善政是明白地表示『上次的大戰』是『錯誤的戰爭』、『侵略戰爭』、『侵略

---

<sup>1</sup> 歷史 檢討委員會編的《大東亞戰爭の總括》（展轉社，1995年）是其成果。

<sup>2</sup> 八月廿五日，細川首相在答辯眾議院代表關於「侵略戰爭」發言之真意的質問中述及：「『侵略』發言顯示我個人的認識，並非以所謂的戰後補償為前提。關於戰後處理，會根據相關的條約誠實地處理。對於這種法理的立場，我想不用再重新評估。」《朝日新聞》1993年11月13日。毋庸說，後者的立場承襲自歷代自民黨政府對於「補償」問題的基本立場。

行為』與『殖民地支配』，並明言那是不好的。」雖然江口語帶諷刺，話中也有一定的保留，不過對於細川的發言他還是予以肯定。<sup>3</sup>

此外，吉田裕則批判細川首相將用詞從「侵略戰爭」改成「侵略行為」一事是「無法坐視的變化」（江口對於這點表示不想「辯論」），至於細川發言的本身，吉川認為與其說它另闢新徑，不如說它延續自中曾根康弘內閣以來歷代自民黨政權的傳統，甚至可以說它把握住新進黨首腦之歷史觀的共通性。亦即，吉田認為，細川發言是以除去日本在國際上（特別是亞太地區）作為大國的障礙為考量；根據這個立場，他指出細川發言具有「歷史觀對於現實政治之必要性的從屬關係」。<sup>4</sup>

翌（一九九四）年夏天，以社會黨黨魁村山富士為首成立聯合內閣，並且在自民黨、社會黨、先驅黨三黨政策的協同下，以「戰後五十年」為契機，「反戰決議」在國會通過。因此，由於細川之發言所觸發的環繞著所謂歷史認識的政治層面的辯論，更加地激化。其動態具體地來說，以聯合政府的主力——自民黨和在本質上與它是雙胞胎的新進黨為中心，在國會內外展開「反戰決議」的反對運動。首先，點燃戰火的是自民黨內的「終戰五十週年國會議員聯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成立），接著是新進黨國會議員所組成的「傳授正確歷史之國會議員聯盟」（一九九五年二月廿一日成立）。尤其前者是以曾因「奧野發言」而辭去國土廳廳長的奧野誠亮為會長，且其成員包括橋本龍太郎（現任首相）、渡邊美智雄（已故）與森喜朗等多位自民黨的核心分子，加上參、眾兩院約三分之二的議員。若整理這份自民黨「議員聯盟」成立旨趣書的要點，可以歸納如下：<sup>5</sup>

---

<sup>3</sup> 江口圭一，《日本の侵略と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ブックレット，1995年），頁3。

<sup>4</sup> 吉田裕，《日本人の戦争観》（岩波書店，1995年），頁2、頁7。關於這點，吉田裕進一步述說，日本政府的立場為對外承認最小限度的戰爭責任，以此獲得作為美國同盟者之地位。另一方面，在國內實際上則否認戰爭責任的問題，或是不加理睬，並指出關於戰爭責任問題存在著「某種雙重標準」。同上，頁82。

<sup>5</sup> 依據自民黨「終戰五十週年國會議員聯盟」成立旨趣書。而且，自民黨內設立之歷史檢討委員會編纂的《大東亞戦争の總括》（展轉社，1995年）是觀看該黨之戰爭觀與亞洲之認識興味極其深遠的文獻。可稱之為自民黨「終戰五十週年國會議員聯盟」之「改訂版」的集團，是1996年4月發起的「明朝之日本國會議員聯盟」（會長奧野誠亮）。這個聯盟有參、眾兩院議員一百六十人參加，然其旨趣書中改而強調「作為侵略國家而視之為罪惡之自虐的歷史認識，與卑屈的謝罪外交是不同調的」。這個團體是看準同一天晚上預定舉行的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會（亞洲女性和平國民基金，1995年7月設立）之理事會營運審議會共同集會而配合發起的。以上次大戰中成為日本軍慰安婦之外國女性的「補償」為主要目的的亞洲女性基金，本來是要按照同夜之

一、關於「過去之戰爭處理」的問題已經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等一連串的條約中獲得解決。（於此並無對加害者性格的認定，毋寧說此和平條約也顯示日本「在傷痛的犧牲與補償之下，在外交上已達成了協議」。不過，由於〔此一旨趣書〕間接地提到明言接受「遠東審判」之舊金山條約的第十一條，從客觀的角度來說，是承認了日本作為加害者的性格。）

二、「今日的和平與繁榮」建立於為「日本之自存自衛與亞洲和平」（行書體為作者所改，以下同）而殉難的「兩百餘萬戰歿者之基礎」上，因此向戰歿者表示「由衷的追悼與感謝之意」。（在此也僅記述日本方面的犧牲而已，同時暗示著自衛戰爭史觀或是解放戰爭史觀。可以說，這樣的英靈史觀式的認識，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上，以當時首相池田勇人發表的悼辭而正式出現，傳承至今。<sup>6</sup>）

三、作為先進國的一員，又是「亞洲的領袖」，「日本被要求善盡其在國際社會上應負的責任與領導作用」，而相對於「要求日本對過去謝罪，亞洲各國更一再提到要日本能在外交作為上更具建設性」。（這種說法可能是指一九九四年夏天村山首相訪問馬來西亞時，馬哈迪（Mahathir bin Mohamad）總理的發言，他說：「日本一直為過去的戰爭而道歉是很奇怪的。若要追問日本對過去戰爭的責任的話，那麼，長期以來將亞洲視為殖民地，進行非人道的掠奪與統治的歐美宗主國，其責任又是如何呢？」）

四、因此，「在國際社會中，會對後世留下歷史禍根的國會決議」是「絕不能承認」的，而且，「決定歷史觀」之事是立法機關「逾越權限」（與此想法表裡一致的是，近幾年某些團體反對頻見的「土下座外交」（道歉外交）與「謝罪外交」的言論）。

---

前的議論來決定其基本方針，結果，以下述三點為骨幹的方針獲得通過：一、受害者每人的賠償金最低為兩百萬日幣。二、加上橋本首相的「致歉書」。三、給予醫療、看護與住宅之生活支援。另外，將此「從軍慰安婦」問題視為謝罪外交之一環的聯盟會長奧野誠亮議員表明「當時公娼是被認可的，（慰安婦）被認可為一種商業行為」的立場。《朝日新聞》，1996年6月5日。

<sup>6</sup> 關於此問題，參考田中伸尚、田中宏、波田永實之《貴族と戦後》（三）（岩波新書，1995年）。

簡而言之，日本對作為亞洲近鄰諸地域、諸民族的加害者的意識非常薄弱，而同時被強調的看法是，日本已到了應在亞太地區完成新使命的階段。這件事情可以從短短的 成立旨趣書 中三次出現的「亞洲」（原文作アジア，「亞細亞」）一詞的用法中一目瞭然（參考引文的斜體部份）。再者，在新進黨的「傳授正確歷史之國會議員聯盟」的成立旨趣書中，相對地一次也沒使用過「亞洲」這個詞，並且關於「國會決議」，它表示，謝罪是「踐踏上次大戰中敗倒之將兵與戰歿者的努力與名譽，且無非是在未來永久地背負著我們是殘虐無道的民族的標籤。其觀點在文字上比自民黨更具「戰鬥的民族主義」的色彩。

在政府的層次，以自民黨、新進黨為中心的超黨派在國會內活動著，與此相呼應的是，在「民間」的層次，各式各樣的反「國會決議」運動也扮演著配合的角色，此為這次論爭的一大特徵。據自民黨「終戰五十週年國會議員聯盟」的旨趣書的說法可以瞭解：雖然反對運動是以日本遺族會為中心而展開，不過，除了上述制度化的壓力團體之外，由遺族會和神社本廳等組成的「英靈守護會（英靈にこたえる會）」（一九七六年六月組成），或是「終戰五十週年國民委員會」（會長加瀨俊一、首任聯合國大使）、「守護日本國民會議（日本を守る國民會議）」（議長黨敏郎）、「反『戰爭謝罪』國會決議之國民集團（『戰爭謝罪』國會決議を許さない國民の集い）」（代表中村黎）等等團體，也展開反對「國會決議」的「國民運動」。<sup>7</sup>

愛媛縣議會超黨派（共產黨除外）所通過的「決議」，最後雖然因為大眾媒體及輿論的反對而撤回，但仍算是上述保守性強、協贊型的「草根」運動的成果之一。這是應「愛媛縣民日本傳統與文化守護會（日本の傳統と文化を守る愛媛縣民の會）」與縣遺族會等的要求而作成的，強調「（上次大戰的結果，亞洲諸國）得以從歐美諸國數世紀的殖民地統治中獨立」，而且那完全是在希望祖國安泰與亞洲解放之下，由本縣四萬四千位以外，全國三百萬餘的戰歿者奉獻他們寶貴的生命所獲致的成果。<sup>8</sup>

進入敗戰五十週年的一九九五年，配合國會中的反「反戰決議」，地方議會層次的反對「反戰決議」運動也加快了腳步，其具體成果陸續以通過「戰歿者追悼感謝決議」的形式出現。宮城縣 釜市議會（議員人數廿八名）搖曳的「航跡」

---

<sup>7</sup> 茶本繁正，「草の根の反「不戰決議」」，〈世界〉（1995年5月號），頁190。

<sup>8</sup> 〈朝日新聞〉，1994年10月1日。

即為這一系列運動的代表。在此，我想根據地方重要報紙《河北新報》略述該市議會的動態。最初，該市議會在三月十三日全會（自民黨、新政俱樂部、新市民俱樂部、公明黨、社會黨與共產黨）一致通過要求國會作出「關於要求反省過去之侵略戰爭並表明對未來和平之決心之國會決議的決議」。決議的開頭強調，必須把大戰之悲慘與犧牲寶貴生命的事情傳給下一代，然後訴說「現在，我國必須做的事是清楚確認我國的戰爭責任，並向國內外的戰爭受害者道歉及進行補償」。基於這項認識，「（釜）市反戰決議」的結語中宣告「值當戰後五十年，為貫徹對戰爭的反省與反戰的決心，〔我們〕強烈地要求通過帶來世界之信賴與友好的國會決議」。<sup>9</sup>

此外，決議的初案中本無「侵略」一詞，經由民間團體一再建議「要清楚地確認侵略戰爭」，在各會派協議後，終於敲定上述的那段文字。決議之前有這樣一段過程。然而，通過「反戰決議」後，在市政府週邊反對決議之右翼團體的街頭宣傳活動活躍起來，且一般民眾也陸陸續續將疑問或反對的意見寄給市議會和市府當局。於是，在這些與國政層面的反「反戰決議」運動聯合運作下，三月廿日，釜市議會的全體協議會決定撤回一週前全體一致通過的「要求國會作出反戰決議的決議」（六十四派中，社會黨和共產黨反對），而且，在月底的臨時市議會中決定要提出包括撤回〔提案〕在內的新決議案。

在這過程之後，三月廿九日召開的臨時市會議裡，新政俱樂部議員說明提案的理由：「在例行會議中通過的決議是，對於上次大戰與反戰部份的討論不夠充份。因為必須詳細地調查並重新檢討國內的動向，所以不要求國會決議。」雖然共產黨和社會黨議員批評市議會屈服於右翼團體的脅迫，最後變更前次決議為「鑑於戰後五十週年的歷史事實，對於國難當前，為祖國安泰與守衛和平而獻出寶貴生命，為今日的和平與繁榮奠定基礎的三百餘萬戰歿者，表示由衷的追悼與感謝之意」。結果，這項類似自民黨和新進黨的「國會議員聯盟」旨趣書的決議，以十八比六的多數贊成通過了。閉會之後，佐藤貞夫議長在記者會中發表喪氣無力的評論：「一度決定了的事情如此輕易被推翻，對此深感遺憾。雖然右翼團體的抗議活動間接地有其影響，來自一般市民和遺族會的抗議也很多，但都比不上議員本身在未充份討論下即做成決議來得草率。」<sup>10</sup>

<sup>9</sup> 《河北新報》，1995年3月14日。

<sup>10</sup> 同上，也言及早於1995年3月30日釜市議會之舉動的約一週前，縣府所在之仙台市市議會所發生的動向。3月16日，市議會議會營運委員會協議處理已提出的兩件和平決議案，但無法整

以英靈為「和平與繁榮之基礎」而予以感謝的這種內向的邏輯，相對地並未遭到特別的抵抗；相對於此，一如今日愛媛縣議會「決議」的受挫所顯示的，戰爭對亞洲近鄰有所貢獻的「解放戰爭」史觀，可以說甚少被正式而直截地表明。雖然如此，日本人的心理深處至今仍黏附著「大東亞戰爭」是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中，將亞洲，特別是東南亞，解放的戰爭的想法，我想這亦是件不容否認的事實。例如，兼任日本遺族會會長的自民黨的橋本龍太郎（現任總裁），在其著作中批判細川的發言，他說：「前次大戰與導致戰爭之日本的全部行為，可以斷定為『侵略』嗎？至於跟美國、英國、法國、荷蘭作戰的所謂太平洋戰爭的一部份，我怎麼想也想不通那是日本進行的侵略戰爭。」言外之意即暗示著日本的武力南進在打破殖民地體制上扮演著一定的角色。<sup>11</sup>

與說辭委婉的橋本等人相對照，前述的奧野誠亮則最直接地吐露自民黨與新進黨「兩大政黨」之「國會議員聯盟」的真心話。奧野對「大東亞戰爭」的看法一絲不遺地被匯集在「解放亞洲之大東亞戰爭」的論題及如下的論說中：「我認為這場戰爭是從以亞洲為殖民地的白人手中解放亞洲人民的東亞解放戰爭，而且如詔書（指「戰爭終結之詔書」—引用者）所寫的，這場戰爭不是侵略戰爭。（東南亞諸國的）許多人不是說，東南亞得以獨立乃拜大東亞戰爭之賜嗎？儘管如此，為何仍說日本人與大東亞戰爭與亞洲的解放無關呢？我想，這些人戴著敵人的眼鏡來看東西，以白人批判日本的觀點來看事情。」<sup>12</sup>

此外，追究日本人之戰爭認識的吉田裕，其所進行的觀察則深具趣味：近年來直言「大東亞戰爭」就是「解放戰爭」的史觀趨向退潮，結果，代之而起的是認為前次大戰具有解放與侵略兩面的雙重性格論、日美同罪論，或是分開日本方面的意圖，這些看法認為戰爭對亞洲各國的獨立有貢獻，且受到熱烈的討論。<sup>13</sup>

---

合各派的意見，結果，以「決議案的一致化有困難」為由，本議會的提案遂被〔擱置〕待決。兩件之一是由自民黨市民聯合提出的「迎接大戰後五十週年誓言建設永久和平之決議案」，另一是社會、公明〔黨所提的議〕案，強調「嚴格地面對包含自身之侵略行為的過去的歷史」。《河北新報》，1995年3月17日。

<sup>11</sup> 橋本龍太郎，《政權奪回論》（講談社，1994年），頁99。

<sup>12</sup> 奧野誠亮，《アジア解放戦争としての大東亞戦争》，《民族と政治》（1989年3月），頁18。

<sup>13</sup> 吉田裕，前引書，頁206-213。

以下，我想根據近年以戰後日本的戰爭觀所作的民意調查，檢討關於戰爭與亞洲近鄰之關係的歷史認識。首先，表(1)是一九八七年春天以早稻田大學入學新生為對象（一七七名）的問卷調查的結果。就「你對戰爭時期日本的東南亞統治有什麼看法？」這問題，約有45%的學生認為日本是加害者，另一方面，持「自衛戰爭」史觀或可稱為「解放戰爭」史觀之立場的學生也分別佔32.8%及2.3%。亦即後兩者佔全體的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其它回答對此「不關心」的人，對於日本之東南亞佔領的評價，概形成二分的局面。如何解讀這項資料的意義——是近過半數的學生認同日本的「侵略」性呢？或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對日本的戰時統治給予肯定呢？——可能意見分歧。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與東南亞各國同世代的青年層對於日本佔領期的認識相比，必有明顯的乖離吧。

與這份問卷調查所顯示的學生歷史認識的兩極化成對比的，接著來看看一九九三年三月（細川內閣成立的五個月前）所作的民意調查。<sup>14</sup>對於「你認為亞洲各國如何看代现在的日本？」這問題(複數回答)，所統計的正面形象(plus image)的回答共計88.9%（其中，「因同為亞洲人，故對我們有親切感」佔16.1%，「身為亞洲近代化的先進國，故受尊敬」佔30.4%，「為了成為和平國家的模範而努力」佔16%，「為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盡心盡力」佔26.4%），另一方面，負面形象的回答佔80.3%（其中，「模仿歐美等先進國而輕視亞洲國家」佔33.1%，「對於過去對亞洲的侵略戰爭反省不足」佔39.9%，「以強大的軍備威脅亞洲各國」佔7.3%，「吸取亞洲的資源與財富，破壞產業與自然〔生態〕」佔32.7%）。

在此也可以看到日本人對亞洲近鄰的認識曲線的二分化，其中持「侵略戰爭」看法者佔全體約四成，這個結果和上述的學生問卷調查的44.6%，數值十分近似。簡言之，可以說現代日本人約四成左右（不管是對它加上「那麼多」或「只有」等字眼）坦承日本的「加害者責任」（但是，不用說也知道，這事應和國家賠償之正確方式分開來檢討）。

---

<sup>14</sup> 內閣總理大臣官房廣報室編，《平成五年版世論調查》（1995年），頁481。

表1 關於日本之佔領（單位：％）

由於對佔領區的人民造成莫大的傷害，因此無正當化的餘地	44.6
考量日本當時的處境，認為是不得不然的行動	32.8
驅逐歐美的勢力，給予東南亞各國獨立的機會，所以應該給予積極性評價	2.3
因為是四十餘年前的事，所以全然不關心	2.3
其它、不了解、未回答	18.1
合計	100.0

資料來源：後藤乾一監修 早稻田大學學生の東南アジア觀—アンケート調査報告—《早稻田フォーラム》第59號（1989年6月）。

另一份資料（表2）是在一九八二年「教科書問題」發展為與亞洲鄰近國家的外交問題時所作的調查，也附有「太平洋戰爭」之意義的調查（(A)是以日清戰爭以降的半世紀為對象）。在此，「侵略戰爭」的認識與「自衛戰爭」史觀兩極化的情形是顯而易見的。和這點相關的是，相對於對同為亞洲鄰國的朝鮮和中國所顯示之極高度的加害者認知，對東南亞地區而言，日本統治帶來積極性的衝擊，很明顯地，這種看法至今仍根深蒂固。

如以上的各種資料所示,包含中日戰爭的「大東亞戰爭」雖然對東亞造成極大傷害，卻是東南亞地區擺脫殖民地統治的重要契機，這種看法還根深蒂固存在於現今日本人之間，是顯而易見的。

表2 「日本人的和平觀」調查

以全國十六歲以上的國民為對象，有效回收數2623人（回收率72.9%，單位%）

日本從明治時代到昭和廿年的敗戰為止，進行多次戰爭與領土擴張，對此，你作何評價？針對問卷中A至D各項問題，請選擇問卷中的1、2、3一個來回答。

(A)、從甲午戰爭到太平洋戰爭之間五十年的日本歷史，是一段對亞洲鄰近國家的侵略史。

(B)、資源貧乏的日本，以軍事行動侵略他國，此為為了生存不得已的行為。

(C)、從明治時代以來，對朝鮮 韓國人與中國人的歧視、迫害與犯忌的屠殺事件，身為日本人應誠心地反省。

(D)、太平洋戰爭使苦於歐美諸國壓制的東南亞各國及早恢復獨立，對此應給予〔正面〕評價。

	(A)	(B)	(C)	(D)
同意	51.4	44.8	82.5	45.5
不同意	21.9	38.7	5.2	25.1
此為往事，與我無關	10.4	4.7	4.2	5.5
不知道，未回答	16.3	11.9	8.2	23.9
合計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內閣總理大臣官房廣報室編，《全國世論調查の現狀 昭和58年版》，1984年。

## 二、「解放史觀」之系譜

獨立貢獻論與日本人對東南亞之加害者意識的稀薄互為表裡，在它的基盤上存在著實質來說可稱之為「超越」史觀的東西，也就是認為：近代國際秩序是以歐美列強為主導而創造出來的，「亞細亞的日本」乃是針對於此的挑戰者。試觀

以下的文章：

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十日，日本國民哭泣地奉讀歸還遼東的詔敕。昭和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日本國民度過正式退出聯盟的第一天。

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三五年，時間間隔滿四十年的歷史是，日本持續對白人勢力的屈服與反抗。然而，今天要完全地不斷超越克服過去的歷史，追求輝耀於日本國家之上的自由與光榮之日的來臨。<sup>15</sup>

此一宣言（manifesto）是與北一輝、大川周明並稱為戰爭以前國家主義運動之「三位一體」的滿川龜太郎（一八八八—一九三六）所著《三國干涉以後》自序的一節。把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之大反對運動（此可說是持續到今日的協贊型「國民運動」之先例），與始於滿州事變之一九三〇年代以降的日本動向，視為針對歐美列強的民族主義式抵抗，或是對日本固有認同（identity）的回歸，這樣的看法，不限於滿川等人同時代的國家主義者，在日本社會的草根層也相當普遍可見。

以此氣氛為背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被稱頌為「以大東亞新秩序為目的之戰爭」（十二月十二日情報局發表）的「大東亞戰爭」爆發了。在當時的官定見解裡，雖然「大東亞戰爭」被當成「含支那事變」，也就是說雖然被了解成中日戰爭與對美英（荷）戰爭在同一線上，不論一般民眾或多數的知識分子，在日本人的意識裡，存在著對中戰爭異於對英荷戰爭的「暗默」的理解。對在「東亞之安定」的旗幟下，四年餘來與「同文同種」之中國作戰而深感窒息苦悶的大多數日本人而言，「十二月八日」，在緊張感的同時，帶來了一種解脫感。詩人草野心平密切參與南京政府（汪兆銘政權）之文化工作，根據以下所引的草野的回憶，率直地揭示了十二月八日是日本人之意識變化的分水嶺。

從支那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爆發的期間，對我而言是暗澹的，在這段時間我大約只能歌詠青蛙與富士〔山〕。然而，從對英美宣戰那天開始，我驀然歌詠起戰爭來。對我而言，這的確是自然的。<sup>16</sup>

---

<sup>15</sup> 滿川龜太郎，自序，《三國干涉以後》（傳統と現代社，1977年復刻）。

<sup>16</sup> 轉引自今村冬二，《幻影解「大東亞戰爭」》（葦書房，1989），頁39。

復言之，雖然「支那事變」與「對美英荷戰爭」在時間上連續，且含這兩者〔的戰爭〕被稱為「大東亞戰爭」，抱持著〔兩者係〕本質相異的戰爭的認識——也就是草野心平式的心情——，現在還是日本人戰爭認識的正當看法，這樣的看法可說是被廣為規定著。以是，一言以蔽之，就亞洲的認識而言，這也意味著：對東亞的認識與對東南亞的認識之間，可以劃出一條明顯的界線。以下的兩種情況正是其佐證：一邊是對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之加害者的認識有一定程度的確定，另一邊是摻雜著根深蒂固的〔正面〕史觀——也就是賦予使東南亞殖民地體制崩壞之積極意義。

毋庸說，近年來自我張揚的、宣傳日本對殖民地解放之貢獻的史觀向後退卻，取而代之的是，戰爭的兩義性論、「結果貢獻論」等占上風，其情形如前所述。「今日之和平與繁榮是在二百餘萬戰歿者之基石」上建立的，這樣的英靈史觀，可以說也是屬於此一系譜的。此一看法，簡言之是「殺身成仁」，也就是東南亞獨立之可能是建立在眾多日本人的犧牲之上這樣的理解。

站在「殺身成仁」之戰爭觀的一位論者是村上兵衛。村上出身陸軍士官學校，是曾擔任近衛步兵第六連隊旗手的「菁英」（elite），戰後東大德文科畢業後，以作家的身份，發表許多在現代史裡尋求素材的作品，如《櫻與劍》、《國破被剝奪的昭和史》。曾說：「描寫戰爭徒費筆墨之時，感到犧牲者的靈魂好像在我的周圍浮遊、窺伺著原稿」的村上，在「開戰五十週年」那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以聖經中「一粒麥子」作為比喻，建議作如下的理解：「日本帝國付出大量血、汗的犧牲，如同一粒麥子死了，使得廣泛的『正義』能在亞洲生芽。」<sup>17</sup>毋庸說，對村上而言，所謂「犧牲者之靈」，其第一義是與他同世代的日本散華者（譯按：「散華者」指戰爭中犧牲者），在日本統治下犧牲的其他亞洲各民族，可以說是在視野之外吧。再者，亞洲的「正義」建立在日本的犧牲之上的看法，是低估了戰前東南亞對西歐殖民地統治之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持續力。另外，村上也提供了導出如下說法的線路：「歷史的事實是：該戰爭之結果，最初以日本所驅逐之歐美勢力地區為首，發起澎湃的民族自立之戰，其波瀾殆及全球，遂出現今天的世界。」<sup>18</sup>然則，此一看法絕非僅止於村上，宏觀地來看近代日本，

---

<sup>17</sup> 村上兵衛，「大東亞」とは何だったのか，〈This is 讀賣〉（1991年9月），頁51。

<sup>18</sup> 村上兵衛，再說「大東亞」とは何だったのか，〈This is 讀賣〉（1991年12月），頁82。

在亞洲與歐洲的對抗軸之中，日本以亞洲的先鋒向近代西歐挑戰，以此為立場的論者，可以說是相當普遍的吧。

現在，「作為結果」也好，「作為原因」也好，亞洲近鄰受到「大東亞戰爭」與日本統治的衝擊，因而實現了「解放（＝獨立）」，這樣的命題，大抵是具體地從哪個地域或哪個民族的戰爭體驗，乃至於戰爭認識中歸納出來的吧。

日本的投降意味著「等於光復（解放）」的殖民地台灣（至少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當時）與朝鮮，或者中國大陸等東亞事例，不是〔解放史觀〕成立的基礎，此乃明白之事。總之，如前所述，東南亞正是孕育日本之「解放史觀」的苗床。今天在東南亞存在著十個民族國家（國民國家），然則，其中最接近所謂的殖民地解放的「古典」形象（image），也就是透過武力鬥爭——當然外交與國際輿論的支持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從舊宗主國解放出來的，是印尼與越南兩國。

其中與寮國、柬普寨共同構成法屬中南半島（佛領印度支那）的越南，一直到戰爭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根據日本軍的「佛印處理」為止，被置於日、法共同統治之下。因此，日本支持其從歐洲殖民地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這樣的邏輯，要一成不變地應用到越南這個例子上，是相當沒有道理的。在確認這個基本點之後，我想談及有關越南的兩個問題。

其一，是大亞細亞協會對「大東亞戰爭」開戰前夕日本軍進駐法屬中南半島的理解。該協會是當時有力的亞細亞主義團體，其機關雜誌《大亞細亞主義》，把日軍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北部（一九四一年九月）看成是對白人統治下之東南亞的最先的軍事行動，更且謳頌說：「作為亞細亞解放戰的支那事變，至此漸漸進入主題，對此一事實，忍不住會心的欣喜。——以此，皇軍之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就歷史意義而言，意味著向亞細亞解放戰躍進數步。」再者，同一雜誌一九四二年一月號的卷頭論說中，敘述道：「日俄戰爭是亞洲解放的緒論，大東亞戰爭為其結論」；如果遵循此一看法，進駐法屬中南半島，即會被定位為所謂的「亞洲解放戰爭」之最終局面的重要序幕。<sup>19</sup>

其二、關於「佛印處理」外務省一部份〔人〕所顯示的見解。敗戰六個月後之時作成的一件外務省內部資料，有如下的陳述：「——最後，如果將來能繼續保持南方的據點，理當支持法屬中南半島原住民的民族願望，必要如此做，且此一方向正是體現大東亞宣言之民族自主的精神——。」<sup>20</sup>奠基在大東亞會議（一

<sup>19</sup> 《大亞細亞主義》「卷頭論說」（1940年10月）。

<sup>20</sup> 外務省「外交資料 日佛關係ノ部」1946年2月。本資料原文係波多野澄雄氏所藏。

九四三年十一月)以及於該會場採納的大東亞宣言之相關新史料,近年來的外交史研究變得清楚起來,就如同這個情況,此一文書明白地反映了重光葵等外務省中樞對法屬中南半島的認識——他們主張在預期戰敗之餘必須提示日本之戰爭理念。

如此看來,就日本而言,上次大戰以及日本之佔領,對東南亞從歐美殖民地體制解放出來,造成一定的重要貢獻,在提倡這樣的史觀之際,必得引證像印尼那樣的具體實例。此等議論簡單來說的話,即出現如下的歷史因果律:呻吟於三百五十年之荷蘭統治(作者按:其實,在相當於今天的印尼全域成立所謂的蘭領東印度之殖民地體制,是本世紀初的事。)的印度尼西亞,靠著提倡「亞洲解放」的日本軍事力,而從嚴酷的白人殖民地統治之鐵鎖中解放出來,在其後三年半的日本軍政下,體驗嚴格的軍事、行政與精神的訓練,以此而育成、強化了強韌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成為戰後四年半對荷獨立戰爭終能取得勝利的原動力。

這樣的「解放戰爭」史觀,或「獨立貢獻」史觀,自然在歷史研究者之間,沒有理由居於主流的立場。儘管如此,如前述各種輿論調查所顯示的,其具有不能忽視的社會之支持基盤,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於此,讓我們看看作為要因之一,也就是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的政治家、知識分子透過媒體的言論吧。其典型是石原慎太郎一系列的發言。<sup>21</sup>

舉例來說,石原在一九九一年「開戰五十週年」的發言中,曾引用與印尼總統蘇卡諾見面時蘇卡諾的言論,據稱蘇卡諾說:「日本人倘若不打那場戰爭的話,我們大概不會被解放吧。」並論道:「東南亞人民樂於珍視對日本本質上的親近感。」關於「東南亞之友好關係」的重要性、必要性,基本上唱反調的人大概不存在吧。然而,關於石原所謂的東南亞人民「對日本本質上的親近感」,更慎重的議論有待追求;況且,這與「反美」、「嫌美」的民族主義結合,會導致如下的言論:「日本雖然得不到美國與歐洲的好評,但被這以外的國家所感謝,以此日本的聲望地位(prestige)得以提高。」對此,不得不提出異議。

石原在印尼「親日感情」的基礎上,提倡可稱之為反西歐的亞細亞主義,與石原的立場成對比的是,以更為混亂的形式主張日本國家利益的渡部昇一。在他出版三個月即印了九刷的近著《かくて昭和史は甦る》(昭和史於焉甦醒)中,渡部對今日的狀況描寫如下:首先,在日本,使五十年前的戰爭成為「熱門問題」的,「主要是韓國與中國之故」(原文加旁點),彼等把日本看成「不過是值得

---

<sup>21</sup> 石原慎太郎,「斷固「NO」と言うべき條件」,《文藝春秋》(1991年8月),頁135。

勒索的有錢國罷了。」<sup>22</sup>於是他敘述道：大東亞戰爭是「解放東南亞的日本戰爭」、「從白人統治下的解放戰爭」；在日本軍政下獲得「獨立」的緬甸、菲律賓兩國以外，日本之「致力於建立民族自決的國家，是明確」的。雖然關於後者的史料根據何在，未加以呈示，不管真假而擁有廣大讀者群的渡部的議論，是以定論的方式，推出「解放戰爭」史觀，另者，如下所示，在其底流又且存在著明顯的對東南亞的優越感。「然則，對於東南亞，我們不必要做出恩人的樣子。我們最好是以教師見到學生那樣的心情來看待東南亞。」<sup>23</sup>

至此為止的議論是，有關日本佔領對東南亞之影響，村上兵衛、石原慎太郎、渡部昇一等人所在所謂論壇水平(level)的發言大概。這些議論的密度雖然不一樣，對潛藏於日本人之國民心理的內在的「解放戰爭」史觀，可以說持續給予一定的影響吧。因此，在注意一般性言論的同時，我也想介紹曾在日本佔領(期)下在印尼擔任指導角色的軍人的戰後言論。在戰後各個時期，他們如何把自己曾經參與的東南亞的日本軍政內化的問題，是今後有待研究的戰後思想史重要的一個課題，不過，此時容我參照作為此一作業的基礎資料——印尼之日本佔領期史料討論會(forum)所編的《印尼之日本佔領期綜合目錄》(龍溪書店，近刊)。

與東南亞日本的其它佔領地相比，印尼，尤其是爪哇、蘇門答臘、蘇拉威西(Sulawesi，原西里伯斯)等主要地域，不惟沒成為激戰的舞臺，並且因此是日本軍之目標——「現地自活」相對地順利進行的地域。(「現地自活」，質言之，就是向民眾徵取糧食等物資與勞動力。)再者，到了戰爭後半期，雖然發生了新加帕那(Singaparna)事件、印德拉馬由(Indramayu)事件等數樁重要的反日起義，面對的不是在馬來亞、菲律賓或緬甸等地見到的有組織的、持續的抗日勢力。然則其與彼般之政治經濟狀況也有關連，例如第十六軍第一任參謀長兼軍政監的岡崎清三郎回顧云：「如果世間有天國的話，那正是爪哇」，且「如果沒有日本的犧牲，絕對無法獲得此一解放」。<sup>24</sup>又，最後的第十六軍參謀長兼軍政監的山本茂一郎(戰後歷任參議院議員等職)也強調：「爪哇軍政與印尼獨立有重大關聯之事實，是任何人再怎麼強辯都難以否定的事實。」<sup>25</sup>

---

<sup>22</sup> 渡部昇一，《かくて昭和史は甦る》(クレスト，1995)，頁3。

<sup>23</sup> 渡部昇一，前引書，頁355。

<sup>24</sup> 岡崎清三郎，《天國から地獄へ》(共榮書房，1977)，頁304、311。

<sup>25</sup> 山本茂一郎，《私のインドネシア—第16軍時代の回想—》(日本インドネシア協會，1979)，頁2。

更且，投降時第十六軍作戰參謀宮元靜雄指出：儘管盟軍東南亞司令部命令該軍在爪哇「維持現狀」，該軍透過各種方策，將大量的日本軍武器、彈藥移轉給印尼方面，此事對彼等之獨立鬥爭給予了重要的影響，以此他一再明言他的立場，也就是對第十六軍在爪哇適切之「終戰處理」給予高度評價。因此，對近年來的一項議論，宮元繼續基於上述的理解，更一般性地主張：「如果沒有大東亞戰爭的話，亞洲其它殖民地之民族獨立與解放能以既存的形式獲得嗎？經過大東亞戰爭所謂的大陣痛期的話，才有今天 ASEAN（東南亞諸國聯合；東協）的繁榮與和平，遂而全世界有色民族之獨立與解放得獲實現，此一事實即使和平主義者也無法否定吧。」<sup>26</sup>

最後，還有一位總山孝雄，我想談及他的日本軍政觀。歷任國際齒科聯盟副會長等職的學士院會員的總山，從《スマトラの夜明け》（蘇門答臘之破曉）開始，以懷抱著「所謂的亞洲解放之浪漫夢想」的參戰經驗（近衛師團通信小隊長）為基礎，寫成許多著作，在著作中，他始終一貫主張的立場是，日本的佔領〔東南亞〕係「亞洲解放」的具體化。因此，在總山看來，印尼歷史教科書對日本軍政之批判，是因為「戰後年輕人大都留學歐美各國，學習到的是根據戰勝國方面的意見與資料的歷史。」更且，近年來東南亞各國歷史教科書之反日，原因之一是「日本自身之謝罪外交，讓彼等想成一旦被非難就給錢」，他倡議：今後日本人「要拋棄過去作為無條件投降者之卑屈的羞恥感，以為了世界之未來的正義擔當者之身份，自負以持，不得不加入指導國之列吧。」<sup>27</sup>

總山對「謝罪外交」之批判，與渡部昇一斷言日本 = 「值得勒索的有錢人」之看法是同一性質的，再者，這樣的立場與前述「終戰五十週年國民委員會」一連串精力充沛的主張，根柢也是相通的。可稱為協贊型「國民運動」的同一委員會，除了批判現狀——例如「與昭和史相關的自虐的、認罪史觀的色彩越來越濃厚」——之外，展開如下的議論：此一潮流是「對在國家危難時奉獻寶貴生命的三百萬戰歿者難以原宥的冒瀆」，且作為「侵略戰爭」之謝罪一事，使得「已然解決的戰時賠償請求」再度點火，「反而對到目前為止建立起來的有好關係」有

---

<sup>26</sup> 宮元靜雄，「インドネシアの獨立回顧録（三）」，《民族と政治》（1990年5月），頁69。

<sup>27</sup> 總山孝雄，「アジアの教科書に書かれた日本の戦争」について，《教育正論》45（1993年），頁2-6。

所傷害。<sup>28</sup>

### 三、「解放史觀」的若干問題

前章是以環繞著「戰後五十週年」而出現之各種戰爭認識的議論為主，考察以東南亞為對象之「解放戰爭史觀」的情況。與此相關，本章根據這幾年國內外日本佔領期研究的成果，針對「解放戰爭」史觀的妥當性，試著以東南亞研究者的立場提出一些問題。

第一、關於「戰爭理念」的問題。若讀開戰當日所發表的對美英兩國宣戰的詔書（米英兩國ニ對スル宣戰ノ詔書），可以看到「和平」、「安定」、「自衛自存的存立」等字眼分別出現七次、兩次、兩次。毋庸說，妨礙「東亞的和平、安定」的最主要因素是「妄圖制霸東洋」的美、英兩國，「儘速芟除禍根」不僅是為了日本的「自存自衛」，且是以達成「東亞永遠的和平」為要諦，其邏輯如此。「解放」這詞雖未〔在詔書中〕明白地使用過，然可以說差不多與「和平」同義。

如果將對外發表的「宣戰詔書」當成日本對東南亞戰爭理念的表面原則，開戰前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決定的「南方佔領地內行政實施要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日）則為國家中樞內部確認的實質意圖。在這裡，「和平」、「安定」等詞都未出現，但在開頭的「方針」裡提倡軍政三原則（恢復治安、獲取重要國防資源、戰地自力更生），同時主張「助長原住民對皇軍信賴的觀念」，「避免過早誘發其獨立運動」。又，與軍政三原則之前二者有關聯的記載是「使〔他們〕忍受不得不波及民生的重壓」。<sup>29</sup>

另外，一九四一年以降，先於這項決定的一連串重要國策，例如伴隨國際情勢推移之時局處理要綱（國際情勢ノ推移ニ伴フ時局處理要綱，一九四

---

<sup>28</sup> 終戰五十週年國民委員會《アジアと日本の大東亞戰爭》（1995年），頁2-3。不過，1995年該委員會所製作的兩部記錄影片「獨立アジアの光」和「自由アジアの榮光」，是立足於典型的「解放史觀」的作品。在此系譜下的著作近幾年陸續出刊，奧村房夫編的《大東亞戰爭の本質》（紀伊國屋書店，1996年）是最新的一本。瀨島龍三在本書序中論道：「永遠受到半世紀前之佔領政策的控制（指所謂的遠東裁判史觀—引用者），喪失自尊與自信，轉而自虐，不斷地發出謝罪的言辭，對此姿態，亞洲的真正的友人感到悲哀。」同時，對於「大東亞戰爭」所波及的積極性的影響，提出問題：「戰後為何亞洲諸國達成獨立，現在向世界最繁榮的地域躍進呢？」

<sup>29</sup> 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編，《史料集 南方の軍政》（朝雲新聞社，1985年），頁92。

年七月廿二日)等文件中,「大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東亞經濟圈之確立」等詞語頻頻出現。從這樣的表現中可以看到,日本最高指導部的意圖是,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橫跨亞洲廣泛區域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秩序,質言之,就是要確保日本的生存圈,不管其它民族的意志與願望。其意味就如上山春平早先指出的,「大東亞戰爭」,「與其說是殖民地解放戰爭,不如當作以殖民地重編為目標的戰爭更能符合事實」。<sup>30</sup>

第二個問題是,如上述之「南方佔領地內行政實施要領」的名稱所示,「佔領」(不是「解放」)東南亞的日本,到戰爭時期提出什麼樣的構想和措施。要言之,這裡沒有與開戰前夕的基本方針「斷裂」,倒是有明顯的「連續」。與此有關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是,以首相東條英機(陸軍中將)為總裁,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陸軍中將)為幹事長,直屬內閣的大東亞建設審議會(一九四二年二月廿一日成立)所編纂之全八編的報告書。詳細解說審議會這份報告的企劃院之研究是「大東亞佔領地帶之指導方針」,該研究強調「毋庸說,南方建設應主要以皇國為中心而進行。且只要我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保持最高的程度,很顯然地就應站在指導的地位。也就是說,南方建設是以皇國為中心,並且應該在皇國的教導之下進行」。<sup>31</sup>

以此,再次確認日本的指導性和盟主性,同時指出,在新秩序之下,南方諸民族應該覺悟到「更為強固的犧牲精神與負擔之分擔」,這點對於「確切掃除物質至上的美、英勢力與新東洋精神之誕生」而言極具意義。該報告書說,作為大東亞審議會的根本想法的日本的指導性、中心性和盟主性,開戰後不論在軍方、官方或民間,各種文書、報告書中也都看得到。海軍省調查課所編纂的《大東亞共榮圈論》(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也是其中之一。<sup>32</sup>

於此,大東亞共榮圈分為指導國、獨立國、獨立保護國、直轄領以及圈外國主權下之殖民地等「五要素」,並以指導國日本為中心構成一強固的同心圓構造。關於東南亞的部份,一、只有泰國與中華民國(汪兆銘政權)、滿洲國一樣被視為「獨立國」。二、緬甸、菲律賓以及爪哇(與印尼其它地域分開來)為「獨立保護國」。三、其它諸地域則被定位為「指導國實際上以之為領地而統治」的「直轄領」。這個構想具有某種「真實性」(reality),因為翌(一九四三)年五月,

---

<sup>30</sup> 上山春平,《太平洋戰爭の遺產》(中央公論社,1972年),頁63。

<sup>31</sup> 企劃院研究會,《大東亞建設の基本問題》(同盟通信社,1943年),頁24。

<sup>32</sup> 土井章監修,《昭和社會經濟史料集成第十七卷》(巖南堂書店,1992年),頁8-25。

大略貫徹此項方針的「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在御前會議中被確定了。也就是說，大綱中明文記載給予緬甸與菲律賓「獨立」，而爪哇被降格編入印尼其它地域，與馬來亞共同組成「直轄領」。附言之，在「大東亞共榮圈論」之下，不認可「獨立國」之間的直接關係（交流）。更有甚者，因為沒有日本參與的各國間的關係將「危害到帝國的指導地位」，故而強調大東亞共榮圈必要的是，「帝國指導下」的亞洲的「球心之統合」。

第三、關於被頌揚為「大東亞戰爭」之理念的「解放」等於「獨立」的實情問題。日本在開戰後不久，從政略的觀點標榜賦予緬甸、菲律賓「獨立」，並且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和十月陸續具體地實現。然而，若採用前述海軍省調查報告的說法的話，日本所意指的獨立是，否定西歐「絕對主權」的原理，並且應使之服從於日本的「指導媒介」。這點更明確地表現在樞密院會議裡東條首相的發言中。一九四四年初，關於「獨立國」緬甸的動靜，石井菊次郎和南弘兩位顧問官異口同聲地表示憂懼，針對這兩人，首相以訓斥的口吻答辯說：「請記得前提是，有皇軍嚴然地存在，緬甸多年來渴望之獨立方能達成」，「條約（日緬同盟條約——引用者）的文字特意以對等的方式書寫，如此，緬甸的面子才得保住。然而因為我國掌握著綱領，所以，日本的實力也將在未來各式各樣的問題中展現。」

33

這種獨立與緬甸人民的民族願望並不相符，證明了兩位樞密院顧問官的憂慮並非杞人憂天。緬甸各種政治勢力——共產黨、人民革命黨、國軍——聯合起來，不久，「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AFPFL）成立，時間剛好在「獨立」後一年的一九四四年八月。而後，翌（一九四五）年三月，以曾是「三十志士」之一而與日本軍建立深厚關係的昂山（Aung San；國防大臣）作為統帥的國軍發動抗日起義，共產黨和農民游擊隊也起而響應。緬甸中樞勢力可以說是拒絕了日本給予的「獨立」而蜂起抗日的事實，證明了日本戰時理論的破綻。再者，關於這點，針對給予緬甸之獨立與日本佔領之關係高度評價的見解，根本敬指出，英國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已答應將來階段性的自治領化，幾乎確定了大戰之後朝向主權回復的路程，他並警戒輕易地將「解放戰爭」史觀應用在緬甸。<sup>34</sup>

---

<sup>33</sup> 伊藤隆、康橋真光、片島紀男編，《東條內閣總理大臣機密記錄》（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頁512。

<sup>34</sup> 根本敬，「ビルマ（ミャンマー）」，吉川利治編著，《近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東南アジア》（東京書籍，1992年），頁266。

雖然被承諾將給予緬甸和菲律賓式的「獨立」（一九四四年九月小磯內閣之決定），但因日本戰敗而未能實現的是印度尼西亞。然而，在日本軍政當局聲明允予獨立時的發言中，清楚地顯示出日本方面的獨立觀。例如，在爪哇軍政監部企劃課之核心的齋藤鎮男論述說：一、以大東亞建設為先而完成獨立，此即「超越獨立正所以完成獨立」之故。二、「人民開化程度」較低的印度尼西亞民族若要達成獨立，必要加以訓練，「其成功與否端賴指導者日本人之努力如何」，且日本人「除了以大愛來引導此一民族外，別無它途」。<sup>35</sup>當然對於東南亞諸民族的這種愚民觀，不須提到上述的東條發言，在戰爭期間—這個觀念成胚於十九世紀末，尚且持續到一世紀後的今日—是日本人以「大東亞共榮圈」之規模所抱持的認識方法。日本人這種對於亞洲近鄰之優越感的底流中，毋庸說，存在著對近代西歐複雜而曲折的情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可以說，帶有戰爭時期之特色的概念「近代之超越」，也曾給予南方佔領地的菁英（elite）官僚很大的影響。

作為檢證「解放戰爭」史觀之際的第四個觀點，即是敗戰後的日本對於東南亞之獨立如何因應的問題。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掌握權力且保持無損傷之軍事力量的地域有兩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其中，印尼以前述的「小磯聲明」為契機，各式各樣邁向獨立的運動急速地高揚起來。然而，由於日本戰敗，根據「小磯聲明」延伸的獨立成為不可能。歷來，印尼方面對此事的理解中，主要的見解是：日本不履行約定，反在戰敗後服從聯合國「維持現狀」的命令，轉而壓抑獨立運動。不過，最近印尼的歷史研究者中有人也表達了如下的評價：日本戰敗兩天後切斷日本軍的「約束」而發表獨立宣言，結果，有效地消解了以舊宗主國荷蘭為首的來自於聯合國方面的「獨立是日本製造」的告發，此事洵為「blessing in disguise」。<sup>36</sup>

總之，就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日本而言，盟軍命令具有絕對的意義，在爪哇的十六軍也服從於盟軍東南亞司令部蒙特巴頓（Louis Mountbatten）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在聯合軍進駐之前「維持現狀」，亦即十六軍註定要扮演抑壓勢如燎原之運動的角色。

一旦接受勝利者的邏輯，戰地日本軍最須警戒的事有兩端，日本方面的武器和彈藥公然地流向印尼方面；以及由日本人中出現支持獨立運動的人。這種事態

---

<sup>35</sup> 齋藤鎮男，東印度獨立指導の指標，〈新ジャワ〉（1944年，11月），頁21-23。

<sup>36</sup> ストボ スタント，日本軍政とインドネシア獨立，〈社會科學討究〉，第四卷、第二號（1994年），頁55-56。

若是發生，不但帶給最優先課題——「整齊迅速地復員」（八月廿五日敕諭）不良的影響，而且被認為蘊藏有「累及國體」的危險性。因此，軍事當局以「逃亡者視同為對天皇的叛逆者」<sup>37</sup>這種嚴罰主義來面對問題，雖然如此，事實上，以爪哇和蘇門答臘為中心，在印尼各地，將近一千名日本人（不論是軍人、軍屬或民間人士）直接、間接地投入獨立戰爭。

雖然他們背叛祖國日本的動機極其多樣，其中在「大東亞戰爭」的理念中追尋自己的認同（identity），並且為理念與現實間的乖離感到煩悶，結果，將國家已放棄的理念放在個人的層次來追求的人也絕非少數。留給戰友如下的「離隊之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後來投入北蘇門答臘獨立戰鬥的宮山滋夫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勇敢地違背大命（天皇的命令），即將展開獨自的行動。別再說，戰敗的殘兵弱卒對天下一無所用。與其為求生存而當英美的走狗，不如殉於自己的微衷，化成撲火的飛蟲。天道存於正義。世界史的趨勢，捨正義之外又為何物？此乃我敢於採取大逆不遜之行動的原因。願能諒解，戰友諸兄。」<sup>38</sup>

對於那些參與廣義的殖民地解放戰爭的日本人而言，戰後的日本——不論接受聯軍方面命令的日本軍，或者主權回復之後的日本政府——一直為他們蓋上「現地逃亡兵」的烙印。這個標籤到「大東亞戰爭」開戰五十週年的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終於正式消除，不過，此間近半個世紀，對於許多將戰前和戰中的價值觀內化的多數「日系印尼人」而言，它卻帶來不少精神上的疼痛。關於殘留〔印尼〕之原日本人的戰後歷史，他們成立所謂「福祉友之會」的團體，尤其在這十年裡，《月報》詳盡地報導其會員的動靜，終於在日本也廣為人知，並且在這幾年，他們之中有些人也陸續成為日本政府敘勳的對象。

在這情勢當中，一九九五年八月，六十九名生存者全體因「印尼獨立戰爭以來之五十年間，在印尼有助於日、印兩國親善友好之功績」<sup>39</sup>，由日本國大使予以表揚。從現代日本人的意識來看，這件事可說是毫無意義的插曲，然而對於步入老年期的原「現地逃亡脫走兵」他們而言，想必帶來言詞難以形容的感慨。住在亞齊（Aceh）的白川正雄寫道：「現在我們終於既是堂堂正正的優秀的原日本軍人，也是善良的印尼國民，不僅印尼，連日本也承認這種情況。此事對於殘留

---

<sup>37</sup> 南「スマトラ」ノ狀況 昭和十八年三月 二二年十一月（防衛廳戰史部所藏）。

<sup>38</sup> 參考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岩波書店，1995年），頁298。

<sup>39</sup> 福祉友の會，《月報》，160號（1995年8月），頁21。

〔印尼〕的日系印尼人而言，重新感到至高無上的榮耀。」<sup>40</sup>（底線原文所加）這是他們的心情的反映。

第五個問題是，東南亞解放與「大東亞戰爭」的關係，是否如上述部份的論者所主張的為「殺身成仁」，或是「善因善果」的命題。若以印尼為例來說，組成並訓練Peta（爪哇鄉土防衛義勇軍）三萬八千名、制定印尼語以及培訓並錄用印尼之官吏，這些常被視作軍政的積極性遺產，而且被強調為在印尼獨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可是，對我們日本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有二：第一，承認並尊重印尼（東南亞諸民族）的自主性。就拿印尼語之普及這件事來看，如果把以一九二八年第二屆印尼青年會議的「青年之誓」為象徵的民族運動之前奏撇開一邊的話，那麼，一定會陷入自以為是的「日本中心主義」的看法。第二，再確認如前面已強調過的，「大東亞戰爭」期間日本佔領的本質是，以東南亞整個地域作為「物質與人力資源的供給源」，而實際上置於日本的支配之下。所謂從歐美殖民地統治中解放〔東南亞〕的表面原則、佔領期間的各種政策—這些政策的結果雖然也有變成東南亞方面之利益的情況—始終都只是達成本來目的的手段而已。同時，不能不論及將日本由上而下所賜予的機會轉變成自己民族〔獨立〕之資產的被統治者方面的政治和社會的能力吧。

## 結語（代結論）

最後附帶一提的是，對如下的命題，如何去掌握的問題：「如果」日本在戰爭初期沒有打破歐美的殖民地體制，東南亞的獨立就不可能實現，或是恐怕要費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實現？的確，殖民地體制的崩壞對東南亞解放而言是必要的條件，但並不必然是充分條件。和這點相關的是，與上述的「如果」一起，再一個「If」，亦即「如果」日本不投降，歷史將如何演變？問這樣的問題並非毫無意

---

<sup>40</sup> 同上，頁 14。對於半世紀前一度拋棄「祖國」的「日系印尼人」而言，敘勳的意義極為重大。1996 年春的敘勳〔典禮中〕獲頒勳五等瑞寶章的伊丹秀夫在如下的感想中，以毫不掩飾的筆調寫出敘勳一事：「到了皇宮春秋之房，與外務省、通產省與農林水產省等有關的受勳者，共約二百五十名，一起恭候著天皇，由侍從長為先導，天皇陛下駕臨。排在隊列前列的我，感到拜謁的榮幸。忽然間想起久遠的過去，沐浴在兩項光榮中而流下淚來。陛下御賜之言辭，惟感激至極。對我而言，這項光榮將成為一生難忘的回憶吧！」福祉友の會，《月報》，第 171 號（1996 年 7 月），頁 9。

義吧。我們可以充分地構想這樣的場景（scenario），日本雖然會承認上述傀儡性的「獨立」，而實質的日本殖民地支配持續著，對此統治反感所導致的抗日運動日趨激烈化。如此來考慮，不只沒有日本前期戰爭的勝利，如果也沒有日本的敗戰——其原因是否由於兩顆原子彈、或是蘇聯的對日宣戰、或是中國的長期對日抗戰，或是東南亞佔領地高揚的抗日民族主義（nationalism）所致，都先擱在一邊——東南亞的解放是否就化為烏有，或是相當遲才能實現呢？這是很可以預想的吧。

## 區域研究為一爭議性學科\*

Benjamin I. Schwartz 著

林淑慧摘譯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助理

區域研究是二次大戰間出現的一門既實用而又曖昧不明的學門，它企圖讓我們對未知的世界有簡明的了解。之後也成了現代學術研究的新趨勢，而其濃厚的政治、軍事色彩，頗受學界非議。區域研究與政治、經濟及其他利益的關係究竟為何？而其實用取向是好還是壞？討論這些問題，將牽涉更廣泛的不同學科與研究理論。

有人以「非西方」文化或社會研究來形容這門學科。而「文化」、「社會」則是來自人類學及社會學的概念，因此他們對區域研究也有其先入為主的觀念。區域研究的確對文化、社會沒有特別的理論，且對人類歷史經驗中的文化、社會也沒有特別的想法。區域研究在字面上來看就是人類聚集的某個地區，或多或少相異於其他地區，彼此間有不同的生活範圍及互動關係；所以區域研究是個跨學科的集體經驗，其中蘊含著經濟、社會、政治、宗教、及其他人生面向的互動。做此研究的人應能凌駕其學科訓練之上，做整合性的全面了解。在整合過程中是非常艱辛。就像做印度、中國、日本等地區域研究，就必須超越原有學科的藩籬。然而區域研究作為一學科的口號也令人質疑，比如說硬把現代印度經濟與中

---

\* 原文出自 Benjamin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s》，1996年由 Harvard University 出版。

世紀印度拼湊起來又有何意義？此外，我們將東亞視為一區域研究主體，乃將此地視為一個共同體，但事實上中國，日本，韓國，越南各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又西方文明也是一樣，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文化，這類問題的提出，決不是排除事實，而是探索更豐富的理論蘊含。

許多社會科學人士攻訐區域研究為一種企業(enterprise)，如 Said 認為它是知識的帝國主義，而世界體系論者則視其自世界體系中背離。而如果您同意它是以人類經驗為取向的定義，並想引用「學科」來描繪這個取向，這並不意味著誇大它的位置，也不在貶低目前既存的人文學科，更無意挑戰目前美國學界的學術劃分。然需要謹記在心的是西方思想史的新趨勢，以及由觀念(ideas)形成學科(disciples)勝於學科衍生觀念的過程。所以我們可以說人類知識的主導觀念是當時代智識討論的產物。當然，我無意顛覆現在大學科系的安排，也不認為區域研究者不需要基本學科的基礎，但想強調的是它是跨學科的研究，且沒有一個人可以精通所有學科，所以研究者自然會尋找其有利的立足點從事研究。在此，我鼓勵區域研究建立其學術地位，如在學院中成立研究中心，研究計劃等。

目前的問題不在於區域研究者能否採用其他學科，而在於這些學科是否能應付他們的要求。近年來美國學術界有個不好的現象是在每個學門裡建立單純的理論、詞彙及研究方法，如經濟學有其無上的典範(supreme paradigm)；政治學也有其純粹的理論，比較政治學家則自不同地區擷取其所需的資料，並認為這些資料可以獨立於當地歷史文化之外。在這整個發展中，只有一般史學處於不同的狀態，它同區域研究一樣也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史家常借用其他學科理論架構做研究，對其他學科的專業者而言，史家就像收集資料，而在明確的學科區分下，無法做出終結的解釋。與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間相對因果關係的爭論也不會平息。

現在面對一個問題，什麼是理論學家，什麼是事實收集者？什麼是事實，什麼是理論？熟悉當代科學哲學的人都明白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Karl Popper 就曾說過“所有的觀察者都是理論的建構者。”而 Said（不是一個科學哲學家）在書中舉出十九及二十世紀的東方主義部分不實，因為這是東方主義者所製造出來的基本假設。就個人而言，我相信有單純的事實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如“昨天下雨”，“在房裡的椅子”，即是事實的陳述。所以我想大膽假設：因一件事實而抹殺一個理論是很少有的情況。而“事實”、“事件”、“觀察”等也都只是人類經驗的片斷。如將法國大革命視為“事件”，而中國考試制度及印度的種姓系統視為“事實”，乃是經由理論及普遍化後的分類。

區域研究者若欣然接受自己為處理事實者的形容，那是雙方都犯了錯誤。當然，他們依憑著其歷史文化經驗來處理當地大小事件，另一方面也可以說這是整理大量資料後所得的理論形式，他們寫的書或辭典正反應了他們的思考模式。比較理論學家與既有的學科則找尋事實以符合他們的理論模式。他們發現沒有單純的事實，有的只是理論與事實的混合體。理論常反映著環繞在此領域中的爭議。所以區域研究者應該注意到其他學科提供的理論，當然也不必要把這視為金科玉律，完全用它們來處理區域事實；相反地，應從實際田野研究中找出合邏輯也合乎一般準則的模式。區域研究者也將發現學科理論家將學術領域明顯區隔後所衍生的理論問題。由於他們的實證研究，所以有資格加入不同學科之間的論爭。

如果區域研究者不可避免地成為理論家，那麼我們又如何批評其他學科為純理論的捍衛者？而“純理論”一詞所指稱的是康德的演繹法，乃基於嚴謹的邏輯或數學推論。然而事實上，學科理論多半來自經驗的歸納。如果“事實”真如 Popper 假設的是“理論的建構者”，那麼這些理論是所觀察到經驗的特別部分，有些理論是特定地區的經驗。所以讓人感到興趣的是美國學界經濟理論有多少是根據美國經濟經驗而來。或許可以說，美國的工業成就代表了經濟發展的模式；同時能以數學公式呈現的經濟法則，便具有普遍科學效力。我沒有立場對此做任何評論，只是想提醒一點：地區的發展理論，乃是基於對特定地區之觀察。1950年代西方發展理論學家假設蘇聯代表一種經濟發展的普遍階段，而這一模式也將是所有經濟發展模式。但事實上有許多非經濟因素影響了經濟發展，這就是我們很難摒除特定經驗而只做單純地理論問題。

另一個非常普遍的觀念是區域研究不能做比較分析。因為比較通常是在有一般普遍性的範疇之中，而區域研究視每個區域都是獨特、單一的，而反對其社會是可以比較的觀念，如同文化人類學或語言決定論的觀點。但我認為並非如此，在同一個範疇中仍可以做比較工作，如中國政治在不同時空中有不同的政治經驗，並可與其他系統經驗做比較。

西方的區域研究者嘗試著了解其他地區的社會，並與身處之社會比較。如做“王權”(kingship)之比較，他們必須了解本地對王權的定義，以及研究對象對王權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注意時代變遷，完全熟悉不同理論的詮釋，所以處理的不只是事實，而且是在嚴苛的先決條件下做誠實的比較。遺憾的是過去區域研究者沒做更多的比較溝通，其他學科的比較理論家應該歡迎區域研究者的加入，經過他們的詳審細察而得以反覆驗證他們的理論及模式。傳統上認為 Max Weber 是位社會學家，然而事實上他是一個跨學科的理論家，相信他也深深了解要做好比

較研究，則必須有深厚之區域研究基礎，而他的宗教社會學著作，無論其侷限或缺點，便是基於廣泛的區域研究。

就我個人而言，美國的人文學科仍對區域研究者有嚴重的偏見。我認為若以一個純粹行為模式論點從事非西方研究時，將出現自身的文化包袱並將阻礙對當地的了解。我所說行為模式取向指的是如同自然科學家追求真確性。一個物理學家將研究的“粒子”視為一般法則的一例，而不必為這些“夸克”及“中子”的意識支配及主觀意向所困擾，可以做其研究的主宰。而行為科學家也試圖同自然科學家一樣，去除人類個體異乎平常的主觀意識。在笛卡爾自我世界的真理便是排除其他人所聲稱的真理，而堅持自己相信的真理。他們用自己所屬的社會情況來解釋其他社會，並反駁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敵人。如 Freudian 可以將 Skinnerian 的行為解釋為嬰兒期受挫；而 Skinnerian 也可以用其反抗癖(negative condition)來解釋 Freudian 的行為；社會學家當然也可以用社會階層來解釋這兩者的行為，這些主張及反訴都無法避免不同學派的不斷論證。所以當處理不同的社會時，學者也會將自己的行為模式及觀念加諸其上，而忘卻了這些社會的居民有其自覺的、有意義的生活。強勢文化主宰的行為研究，關注的是知識史及人類自覺的生活。區域研究者當然也做行為研究，而且主張真正研究異地社會，應多了解當地人的內心世界。

攻擊區域研究者，除了既有學科外，也來自其他人士，如 Edward Said 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即以不同面向攻擊。他將“智識學科”(disciplines defined intellectually)與“基準、帝國、地域”(defined canonically, imperially, and geographically)為主的東方主義做了對照後，清楚地表示他無法在智識學科中得到驗證。他認為東方主義與區域研究都是在西方主宰世界後興起的，充滿著帝國擴張的優越感，同時也是為政治或其他利益服務的。相較於其他人文學科及至於自然科學，這可能是真的，但事實也可能不是如此而已。在其東方主義研究中所發現的優越感，事實上是來自語言學、民族學、及達爾文的生物學。而在他的論述中，也不全然否定它們，因為除了被經濟、政治利益所牽絆外，超越了歷史條件而建立了實際知識系統。另一層面，Said 也暗示東方主義及區域研究即 Foucault 所謂的主宰性的全體論述(dominating total discourse)；或 Marxian 所謂的意識型態；在其背後有一套知識社會學運作。不管他們意圖如何，也不管他們獲致什麼了解，或在政治社會利益中反應出的客觀事物。在某層面而言，實在沒有客觀有效及實證知識可言。所有知識都是宰制的模式，即便是應用知識也都只是為獲得了解的工具。在此我想簡單地說：

如果我們援用 Foucault 論述觀念，在語言世界裏，當它運作時即控制了每件事物，認為所有的意念及論述都只是反應歷史及社會利益，那麼實在沒有理由只挑出東方主義與區域研究有此特性。Foucault 並沒有明確區分 Said 所指稱的智識學科與其他學科有何不同，其實他們全都是其宰制論述的一部分。此外，Said 又認為東方主義及區域研究為意識型態下的壞信仰，東方主義者視東方為不同於西方的異國文化系統。如 Renan 指出印歐語系與閃米語系為完全不同的語言系統；達爾文種族主義更加重這個信念；Renan 及其他學者假設真正人性是在現代西方世界才被真正了解。關於這點，我想 Said 是對的，他主張東方主義者的多樣性即是談非西方世界的去人性化(dehumanization)。而現代區域研究者又是如何看待文化差異呢？許多文化人類學、語言相對論學者讓我們不再相信西方的優越性，這些理念未必成為區域研究的主流。區域研究者並不將其研究對象視為一個完整的客體，因為在同一區域中 - 如日本，印度，中國，巴厘等，每個國家都是非常不同的，如政治秩序與宗教間的差異性，在印度就遠過於中國，而這種歧異也將繼續存在。

Said 並發現智識學科的優越性，它們用普遍理念來處理智識，而其同質性過於異質性。然而承認歧異，不必然否定人類共同性。以個人生活層面而言，我們不會認為每個人在個性、人格、生活史及外表不同與人類有共同的人性為不可並存。因為這些不同是人性的特徵，而且不同的人會對人類共同的關懷有不同的回應。在個人層面是如此，而當彙集大量的集體生活經驗，如政治、宗教、社會生活等又是如何。我們可以說“不同”是“普遍”人類的特性，所以它們可以共存而且了解。拉丁諺語：「人沒什麼不同」( nihil me alienum puto)，我認為這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像自己，而是透過想像，我希望能了解不同的人類經驗。有時主張普遍性本身含著對一般性的否定，因為在認同普遍人性趨勢中，伴隨著是一特定的歷史和文化形象。如 Rodinson 所寫《伊斯蘭教與資本主義》，在本書中，他認為 Weber 主張東方沒有貿易商業及經濟的理性。以 Said 的看法，它反駁了 Weber 否定伊斯蘭世界可以產生資本主義體系的理論。我認為這是對 Weber 的資本為一有組織的系統這一觀念的誤解。另外，Weber 否定伊斯蘭世界有資本主義是否也意謂他否定這個世界的人性；又 Rodinson 主張它有資本主義存在後，是否即證明這個世界有人性。認為社會成長、演進、發展都依著一個理想的模式，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這個想法深深地影響了西方世界，也影響到東方論者及區域研究者。十九世紀以來，西方人相信他們是最優秀的，而認為這種成長過程適用於所有社會，這一成長模式為西方人的信仰，而西方人的優越感並不

單單源於生物及文化的絕對論，而是 Said 所說的來自 Hegel, Spencer, Comte, Bukle, Marx, Maine 等，西方學者所塑造西方優於非西方及過去的思想。有人認為這一思想模式較文化、語言或生物的本質論更具普遍性。它將非西方世界歸於「封建」、「落後社會」或「傳統社會」等，乃為西方社會所經歷的過去。對現代的非西方世界也都以「成長緩慢」或「停止成長」等來說明其沒有持續成長的情形。Said 將失敗的原因歸諸於無法改變的文化或地理因素。如馬克思所說的亞洲生產模式；另有人認為成長停滯為較少人性的智慧多於文化差異。不也有人將它視為演化的某個階段，肯定其他民族的人性尊嚴，確定書寫其社會歷史的可能性。區域研究的史家必需讓自己從以西方為主的思考模式中釋放出來，在寫作其他地區歷史時，避免那些曾為主要論述的老套範疇，真正地尋找當地文化的新視野；科技、經濟、軍事系統及政治組織等，在每個世代裏都佔有不同的角色、不再歧視其他民族，就像尊重每個人有其不同特質。全球性思想家及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儘管其政治取向非常不同，但都主張研究當代世界應當讓他們獨立作業，現今世界已成一個互相依賴的系統，不該再以單一社會做個別因果研究。

總而這之，我認為在一般及已建制學科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已經沒有多少空間可以自大或暗自慶幸地獨自經營。當然我並不是說區域研究可以對既有的缺點提供完全的診治；我也承認區域研究和所有的真理追求者一樣，有太多人的情緒、利益、假設及功利主義的目標在其中。而他們試圖將整個人類的經驗帶入我們共同的關懷；同時他們對其他社會、文化、歷史經驗有著深刻的瞭解。區域研究者積極加入比較研究中，並極力批評受限於文化包袱的比較理論。身為一位區域研究者，當為此一事業做全力的辯護。

## 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座談會紀要

###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

時間：86年4月10日、11日

地點：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辦公室(資訊所舊館108室)

主席：蕭新煌

主講人：陳志明 洪玉華 麥留芳

出席人員：張存武 龔宜君 徐正光 朱宏源 蔣斌 楊文山 章英華 臧振華

蔡宗憲 隋皓昀 莊英章 朱榮貴 葉其忠 邱澎生 陳國棟 林淑慧

李志遠 羅惠馨

### 主席致詞

本次座談會的主要目的是執行去年九月分支計劃主持人會議的議決，研擬和規劃本計劃有關人研究的重點主題；以建立本計劃在此一領域研究的基礎。邀請當地學有專精的學者到本計劃，借著面對面的座談，共商本計劃今後研究的方向，便是此一具體作法。座談會是一系列的主題座談的開始，以後也希望能擴及其他領域，諸如東南亞伊斯蘭教、東南亞華人企業等。

將東南亞華人研究是將華人視為當地社群之一而不再片面視為「海外」華人，這將有別於過去華僑的研究旨趣。而以何種方式與華人學者和華社合作，善用較好的研究策略，以達到學術研究的目的，為本次座談之主題。主要策略運用可考慮以下幾點：

(1) 研究地點和對象集中；

(2) 界定主題重點：a 已有很多人研究，但可做更上一層樓的探討；

b 沒有人做過；則可新闢領域；

c 目前院裡同仁最有興趣研究的主題，亦可形成一個研究

計劃。

(3) 界定接觸點：可與那些單位接觸和那些學者合作？

(4) 帶領年輕學者（學生）進入此一研究領域。

## 主講人報告

### 陳志明教授：

海外華人研究在 50、60 年代政治課題為主，西方學者像 William Skinner 之輩，主要議題是談華人如何同化於當地社會，適應問題及文化變遷為討論重點。70、80 年代則側重於整合而非同化，於是華人的認同為何即成討論重點。在冷戰後，全球化的趨勢下，90 年代華裔的跨國際經濟網絡成為重點。

以馬來西亞而言，目前有幾個值得研究的主题，如：

- 一、華裔研究，如沙勞越福州人的商業網絡，其與儒家思想的關係為何？
- 二、華人社會變遷，如永春人在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台灣等地，在不同的政治及經濟發展情況下，其社會組織變遷又為何？
- 三、華人語言使用及變遷，即華語與當地語言混合使用後的新型態。這需要懂馬來語、閩南語（方言）及語言訓練等。
- 四、家庭親屬研究
- 五、宗教：傳統地方神在各華人社區的發展，及與當地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教的關係等。

若要再縮小範圍，則沙巴是一個重點，過去研究較少，且以客語為主，這是較少見的華人社群。其他如社團研究也是可行的。

綜觀世界各國東南亞研究的方向，都有將主力放在幾個重點的做法。如美國康乃爾大學東南亞研究計劃的重點在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其次；馬來西亞最少。其他大學亦如是，只有 Ohio 大學馬來西亞研究較強。澳洲國立大學的重點也是放在印尼。Univ. of Bielefeld（德國），也是歐洲最大社會學系，其研究計劃重點放在東南亞的零售商，以此研究成為國際學界所重視。中研院目前即有的研究成果及條件而言，可以著重在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研究，原因是馬國華人社會、政治、教育各方面都很特別，而且其他學術機構也沒有太多研究；菲律賓則是本院已累積相當多的第一手資料；兩者都有語言上的便利，只要會英語及閩南語，應該就沒多大問題。從人物口述紀錄(biographical approach)入手。而留台同學總會是一個重要的資源，需妥善運用。

## 洪玉華教授：

菲律賓華人研究，以「華裔青年聯合會」(KAISA)而言，主張菲華融合，認同國家，成為菲國公民，並讓當地人相信華人的成功就是菲國的成功。主要工作有（1）社會服務，為菲華爭取權利，如綁架案橫行時，發動示威，籲請政府重視此事；又提供免費藥品給貧民等，贏得當地人的認同。（2）研究出版工作，目前正在籌建華人博物館，同時也已出版許多華人研究作品；如最近因應菲律賓反西革命一百週年，而出版一本專書《華人與菲律賓革命》，在著手研究之前，大都認為華人對革命只是財務支援，但經一年多收集的資料中發現，華人在革命陣營裏有提供敵情報導，也有為革命人士製作軍服，提供槍枝，或直接投入戰場；而黎剎與孫中山，梁啟超的關係也很密切。這說明在菲國歷史發展上，菲華並非袖手旁觀。

又如從事逾期遊客之研究，提供給移民局做決策之參考等，不僅處理華人問題，也是處理菲律賓問題。而出版物也多以華語、英語、菲語（Tagalog）同時發行。

在政治方面，加強菲華在政治上應扮演的角色，以及分析菲政府的華人政策。

經濟問題也是重要一環，有人認為華人的富有是建立在菲人的貧困上，華人愈富，則菲人愈窮，但事實不然，菲華的成功應也視為菲國的成功。過去有人提出菲華資產占菲國 60%，但事實若真如此，也就不是這樣的「無力」；有資料根據的是銀行業資產占 22%，所以需要更多的基礎資料蒐集，研究才有說服力，並接近事實。

地方史的研究也很重要，鄉下華人與菲人關係好，不像在馬尼拉區常為政客所利用，如「米荒」，菲政府指為華人米商的操縱，而不承認是農業技術未改進，且人口增加後所產生的問題等。

宗教上，「兄弟」觀念是有助於融合的，而宗教的變型如華人拜基督，燒香，燒紙錢，擲筊等，將基督信仰華人化，而且看到華人的成功，有些菲人也來到華人的基督廟裏，以華人方式求神旨意，這是值得注意。

在歷史考古方面，貿易瓷的出土，需要學者加以鑑定年代，並做深入研究。華人報業、文學及婦女研究也方興未艾。

## 麥留芳教授：

過去我主要研究的題目是新馬方言群和祕密社會等。最近對東南亞的社經發展有關問題也相當有興趣，如馬來回教世界與中國文化圈的關係；因為東南亞國家發展裡，回教徒與華人參與有著重要的位置，不同族群有著不同思想，商業金

錢觀也非常不同。此殖民地宗主國留下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行政制度及處事方法都有深遠的影響。在學術研究方面，西方學者與當地留學歸國的學者研究角度及關心問題也大有不同，對華人研究亦如是。如 William Skinner 所寫的是他所希望的而不是真正發生的。在他書中討論 Baba, Mestizo, 及印尼的 Peranakan, 三種次文化，其中前兩者已經消失，但第三種還存在，那是為什麼？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華人研究方面，貿易網絡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沙學漢正在做這樣的研究。潘林主持一個計劃，前兩年在收集華人移民之器具，衣服等，崔貴強也在收集資料，大陸的廈門大學也有人做華人研究。

在方言群認同方面，小地方或低度開發區則仍管用，至於星馬高度商業發展地區則是一去不回。可是也許在談生意時不管用，但在社會思想層面是否還保有原籍的生活方式，如教導孩子的方式，生病祕方等，則值得探討。

認同一直都是重要問題，尤其是一九五〇年代新型國家建立的過程中成為討論重點，馬哈迪要建立馬來亞國族國家，亦遭到學者的批評。而華人的認同也因時不同，就馬來西亞而言，在十九世紀時，馬來人，英國人，華人各行其事，互不往來。建國之後，馬來人對華人的歧視也是寫在憲法裡，如計程車的執照，90%馬來人，但華人可以用錢得到出讓權。基本上在社會階層裡，馬來人與華人在高層與低層相處的都很好，而中產階級則強調歧異，藉此提昇自己的名聲，以取得政治資本。對此，進一步的實際研究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東南亞是個廣闊且多元的地區，研究焦點可大可小，如小到泰國某一個村落，或大到國家；或某一事件，某一政策等。而一研究機構要被肯定，必須有其研究特色，於是需要選擇研究策略，這其中有以商業為導向，或以學術為導向。若以商業為導向，則馬來西亞及菲律賓是重點，其領導層及基礎建設超過印支半島，泰國，印尼，或可追隨及至超過新加坡。若以學術為導向，必需考慮有效利用有限資源，學者研究興趣及語言能力等，此外，留台生也是很重要的網絡。

在收資料方面，新加坡是重要的地方，如日韓要研究越南及印尼的，首站就是到新加坡蒐集資料，除了官方檔案外，尤其是出版品，當地有的，新加坡都有，而新加坡有的，可能當地卻沒有。

目前個人有興趣的題目是 Family cycle and life chains among Chinese, 它無政治敏感性，比較容易進行，只要收集華人的出生、結婚生子、教育到死亡等儀式的觀察，加上人口資料，只要樣本具有代表性，就可以成為一有意義的研究題材。

## 綜合討論與建議：

隱形帝國：真如歐美學者所言，東南亞華人聯合起來對付美日等強國？當地商業發達最主要是繁榮當地，而非為了祖國（台灣或中國大陸），這是破除西方人「黃禍」的假想。

客家研究：新加坡廣昭會館有豐富的客家人資料，再比較台灣、中國大陸及美西等地，可以作此一族群的文化等變遷研究。

留台生研究：東南亞各國抽樣調查從早期到現今一百名留台生作口述訪問，可作為日後研究之基礎資料。由此為基礎，再深入做商業，宗教等研究，有系統整合，得到顯著的成果，或可為本計劃獨到之處。

都市研究：東南亞各主要都市如新加坡、吉隆坡、馬尼拉...的發展研究。

東南亞國協之研究：地緣與台灣相近，也是未來發展的重心，不可忽視。

金三角的研究：如沙巴、印尼、菲律賓的跨國經濟網絡；在地理、語言方面，蘇祿海可為一政治社會之單位，不過政治敏感度亦強。。

越南研究：台灣與本地的經貿發展愈來愈密切，應加注意。

國際轉運（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及外勞帶回的「台灣經驗」為何，正面及反面均可加以探討。

華人民間文化與商業傳統，民間文化，宗教及商業關係，華人的傳統思想為何，儒家的重要性，如是否在教育方面引用「孔子」為例等。

華人婦女研究、報業、文學等也很少人研究。

## 結論

一、在研究主題方面似可先集中在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

二、在合作、聯絡的地點方面，

( 1 ) 菲律賓華裔青年總會已具有相當規模，可做為當地聯絡站，基於互惠原則，以訂合約方式建立制度化合作關係，並希望能進一步有具體雙方合作計劃。

( 2 ) 馬來西亞華社資料中心可為聯絡站；其他如宗鄉總會，中華總商會，留台同學會等亦可進行接觸。

( 3 ) a 新加坡南洋研究所資料非常齊全；

b 南洋學會可為聯絡參考對象，雖然會員不多，但可由他們的介紹，認識相關的人士。

三、至於研究主題，可參考前面的討論，經計劃各分支主持人商議之後，再做進一步擬定未來研究之重點之依據。

## 女性身體的貿易： 臺灣 / 印尼新娘貿易的階級與族群關係分析

夏曉鵬

美國弗羅里達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 現象

近年來，隨著GATT對農業經濟日益逼近的威脅，以及勞力密集工業的大量外移，娶妻心切的臺灣農村青年數以千計地遠離了家園。在豪華的桃園國際機場，雄偉的波音客機和壯觀的候機室立即就撩亂了他們的謙遜眼神；在他們抑鬱的生活裡，這樣的遭遇畢竟不尋常。同時間，在南太平洋彼端，中介者及媒人穿梭在印尼雅加達的窮街陋巷，勸說年輕的小姐們參加相親。在相親的場合裡，男人的眼神急切搜索，女人靦腆害羞，這時中介者則熱心地穿針引線。數天之後，成雙成對的男女舉行訂婚禮。訂了婚的男人回到臺灣往往須等上一年，才能盼到他的印尼新娘。這種國際婚姻的締結過程冗長而繁複，動輒耗掉一般農民家庭的大半積蓄。訂婚成功的男人付給中介者及媒人總共約新臺幣三十至四十五萬元，其中新娘家庭收到的聘金只佔十分之一。然而，這筆聘金對於生活費用低廉的印尼一般大眾而言，並非小數目（約等於二年薪資）。

在過去的六年中，每年有超過兩千名的印尼女子離開鄉里，前往她們想望的寶島臺灣。為減緩印尼新娘進口，駐印尼臺北經貿代表處壓低了審核速度，如此，等候簽證面談的印尼女子就更加焦慮了。當地的中介者也逐漸不耐煩了，被牽往香港的「紅線」於是便多了起來，而台灣男子也逐漸轉往越南、高棉等地尋找結婚對象。

## 研究主題

臺灣與印尼之間的國際婚姻必須被理解為全球女性身體貿易中的一個環節，而非一個單一的獨特現象。在美國，來自亞洲、東歐及俄羅斯的進口新娘被羅列在廣告目錄上，等候郵購(Lai 1992; Glodava and Onizuka 1994)；而在日本、澳大利亞及前西德，菲律賓新娘的進口引發了各方爭論(del Rosario 1994; Sato 1989; Aguilar 1987; Cooke 1986)。在婚姻市場上，女性身體之被視為性商品而橫遭剝削由來已久。出口自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邊陲國家的新娘，她們的命運更是如此。

本研究為作者的博士論文，此論文在巨觀層次上討論了「外籍新娘」現象的結構因素，在微觀上，參與國際聯姻的男女，及台灣的媒體和官方是如何以不同角度來理解此現象，更是我探索的焦點。然而，由於篇幅限制，本文重心將摘要分析臺灣與印尼之間的新娘貿易形成的結構性脈絡。但作者希望讀者認識到人並不純粹是結構因素的玩偶，和所有的人一樣，外籍新娘和台灣新郎恆掙扎著在階級、族群與性別等重重壓迫下尋找生路，而國際婚姻正是這種生命意志的體現。

## 文獻回顧

女性身體的全球性貿易進行已有數十年之久，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及歐洲的士兵從第三世界國家帶走了為數不少的女性。然而，如此重大而廣泛的議題，相關的研究卻是少見。大部份探討國際婚姻的研究並不討論商品婚姻與非商品婚姻的異同。它們或是全然忽略諸如郵購新娘之類的新娘貿易議題(Brewer 1982; Rhee 1988; Rho 1989; Rousselle 1993)，要不然便是與其他型態的國際婚姻混淆(Donato 1988)。

郵購新娘與台灣外籍新娘現象最為相關，其研究主要集中於結構性趨力，各家研究的共識是：已開發國家和低度開發國家間的不平等是郵購新娘現象的主因。例如，在“Wome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hilippines”中，Aguilar (1987) 論述了妓女與郵購新娘之間的平行對應關係，兩者均是美國殖民主義下的產物。一方面，菲律賓的對美經濟依賴導致了失業與通貨膨脹，普遍存在的飢餓逼使眾多的菲律賓女性淪為娼妓或郵購新娘。另一方面，在美國文化的殖民下，遠渡重洋嫁給高個子、白皮膚的白種男人，竟也成為浪漫的綺麗夢想。結構性論述誠然提供我們較寬廣的視野，然而，那些男女的心聲全然被忽略

了。此類結構主義分析潛在的假設是，人是社會力量操縱下的木偶，他們的所作所為僅僅由結構性因素所決定。

此外，雖然大多數研究對郵購新娘採取同情態度，詳盡描述她們的悲慘命運，但它們往往將這些婦女建構成“特異的他者”(exotic others)。例如，在“Mail-Order Brides: Women for Sale”一書中，作者強烈批判西方人對亞洲婦女的刻板印象(屈從，討男人歡喜的尤物)，但他們卻陷入西方的刻板印象而不自知。作者認為亞洲婦女以傳統為依歸，她們既不願意放棄不幸的婚姻，也不願質疑失責的丈夫是否值得她們的尊敬和愛。作者同時強調亞洲文化使得婦女服從權威並尋求婚姻關係的和諧。這樣的論述背後隱涵著亞洲婦女是亞洲文化的受害者，她們唯有放棄傳統文化並接受西方個人主義才能獲得解放。作者更以表列方式，展現“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對立價值體系。藉由將“亞洲”和“西方”文化兩相對照，並強調亞洲婦女如何在亞洲文化下受到壓迫，亞洲文化被建構成“次等的他者”(inferior other)，因而需要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的救贖。

“性別”是這些研究的主要焦點。但研究者往往將國際婚姻的當事人建構成邊緣的社會異類：他們是“傳統”性別歧視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下的殘餘(例如，Sato, 1989; Glodava and Onizuka)。異國婚姻的男性更被理解為父權的極致表現(例del Rosario, 1994)。性別歧視當然是重要的議題。然而，學者往往將焦點放置在這些娶外國新娘者是如何為父權的代理人，而忽略了這些男性往往是他們所處社會中被邊緣化的一群。這些學者因此強化了社會中的階級歧視：只有那些沒受過高等教育的農民和藍領工人才是如此父權，不知“現代”婚姻為何物。

## 研究焦點

「印尼新娘」現象的發生，正值台灣和印尼兩國間的經貿往來日漸熱絡。大多數的印尼新娘為來自印尼貧苦農、漁和礦村的客裔華人，而台灣新郎則是來自台灣鄉村的客家人。以下將分別討論上述這些現象所反映的國際婚姻背後的結構脈絡。

### 一、國際階級分化與國際聯姻

一如台灣駐印尼經貿代表處官員所說，「在政府宣布南向政策之前，台灣人就已南向來娶老婆了。」李登輝於1994年公開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在此之前，台資就已流向鄰近所謂的“較落後”國家。台灣資金外流始於1984，但直至1987

年，隨政府解除各種外匯限制，資金外流才更顯著。自1990年開始，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的東協四國已趕上美國，成為台灣投資者的新寵(宋 1993)。

隨著資本全球化，台灣逐漸被納入世界體系的一環，不僅是主要世界的出口貿易大國，同時也開始扮演世界資本輸出國的角色(宋 1993)。台灣經濟發展自1980中期開始遇到瓶頸。過去經濟發展所依恃的勞力密集，及高消耗、高污染的工業隨工資上漲及環保意識提高，而成為“夕陽工業”。而東南亞地區的低廉勞工與對外資的需求正提供台灣各逐漸被淘汰工業的“第二春”(江、楊 1994)。

東協四國更解除各種投資限制以鼓勵外資。以印尼為例，一九九四年，印尼政府所核可的外資累積總額中，臺灣由第三位攀升至第二位，僅次於日本。為籌措第六個經濟發展計劃(REPELITA VI)所需為數約達三千零五十億美元之龐大資金，印尼政府對於資本的調控作了一些解除措施，所謂New Package of Deregulation，以吸引更多的外資(駐 1994a)。在國際分工體系之中，臺灣與印尼之間形成一種階層化的經濟關係：臺灣居於“半核心”(semi-core)的地位，而印尼則處於“邊陲”(periphery)的位置。

1986至1991年間，台灣在東協四國的投資主要以泰國和馬來西亞為主，菲律賓也吸引了相當的投資。但在1991年後，由於菲律賓的政治和社會不穩定，台商投資大幅滑落。台商於印尼投資始於1988年，尤其在1990年底中印雙方簽署投資保證協定(Investment Guarantee Agreement)，台商投資由1989年的6.18億美元迅速提高到1990年的10.57億美元(宋 1993)。

台灣男子娶東南亞新娘的趨向與上述台資外流東協各國的趨向同步。根據婚姻仲介和各報紙消息，泰國和菲律賓新娘在1980中期最為普遍。台灣駐印尼代表處資料顯示，自1991年開始，印尼新娘開始顯著增加。相對地，來自馬來西亞的新娘數目不高，這與馬國經濟較好有關。如一印尼華人所言，「馬來西亞是東南亞國家生活最富裕的國家，甚至有些印尼婦女嫁到馬來西亞。」最近隨著越南和高棉開放，越南和高棉新娘數目已逐漸趕上印尼新娘。這種台灣外資流動和台灣男子赴東南亞娶妻的同步現象，可以一婚姻仲介公司的發展史作為例證。這家仲介公司原是一台灣中小企業赴高棉投資，再由與當地華裔所建立的人際網絡開始發展婚姻仲介。許多仲介公司則是以旅遊業開始，繼而從事婚姻仲介。

除了國際經濟的脈絡，台灣和印尼內部的結構也構成了印尼新娘現象的形成背景。以下將分別就台灣和印尼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族群關係作討論。

## 二、台灣：社會經濟發展

台灣土改成功後的經濟發展一直是犧牲農業以造就工業，許多學者已做過深入研究(如蕭新煌 1981；陳玉璽 1992)，在此不再贅述。1980年代以後，台灣政府逐步開放國內農產品市產以作為加入GATT和WTO的交換條件，更是對已凋零的台灣農業部門雪上加霜。這種農業和工業部門高度不平等的發展策略正是Michael Lipton(1976)所指出的“都市／工業偏見”(urban-industrial bias)。

都市／工業偏見發展政策的結果是一般農民愈來愈依靠非農業收入，而大多數農家子弟也由於農村生活不易，而往都市發展。即使年輕人願意留鄉，他們的父母也會極力將他們推出，因為他們看不到農村的希望。在如此的工業化、都市化和國際資本自由化發展脈絡下，留鄉青年的弱勢不僅表現在經濟上，更表現在身份象徵上。他們身上帶著「沒有前途的人」的污名，因為鄉民們普遍認為他們在都市混不出名堂才回到鄉下。沒有女性願意嫁給他們；他們在心理上承受著苦楚。甚至留在農村的未婚女性也不願“下”嫁；農民的生活清苦她們自然是清楚的。因而印尼新娘為他們帶來了新希望。

## 三、台灣：族群關係

一般而言，台灣新郎和印尼新娘多數是客家裔，這反映了兩地客家人的社會處境。以台灣而言，由於清朝移民政策數度明令禁止廣東籍移民台灣，使得客家人在漢人移民人口上居於絕對的劣勢。早期來台的客家人大多是以單身偷渡方式，成為閩南人的佃戶。早期移民對客家和閩南間關係的影響有兩個特色(徐1996)：(一)客家人口明顯少於閩南。根據日本於1901年所做的調查，台灣人口有80%以上是閩南，只有13.37%是客家。(二)由於客家人比閩南人較晚移民，閩南人一般佔據適於商業和農業發展的平原地區，而客家人只有向丘陵地區發展，同時需面對平原地區的閩南人和被漢人趕往山區的原住民。孤立的生存環境形成了客家特殊的族群性格。

台灣在經歷了國民黨白色統治後，在1980年代反對勢力開始壯大，尤其在解嚴後，本土化運動興起，漸成為新的政治論述主流。這股新的台灣國族主義主張閩南語為“台灣話”，為所有認同台灣者所必須認同的語言，造成新的族群緊張關係。客家人作為台灣的弱勢族群，充份地感受到族群消失的危機。

自1980年代，客家人被標籤為“隱形人”，說明了當代台灣客家人的認同危機。國民黨過去的國語政策和現今的“台灣人”意識都造成了客家人的母語消失的危機。客家認同的隱形化有下列特色(徐 1996)。(一)如前所述，客家人在台灣始終是漢人中的少數。根據最新的估計，台灣人口中有73.3%是閩南，13%為外省，12%為客家，而原住民只有1.7%(黃 1993)。此外，客家人聚落多呈點狀分佈。除了在屏東六堆地區和苗栗山區形成較大的聚落，較能保存方言的原貌外，其他地區客家鄉鎮都逐漸形成方言島，為閩南勢力所吞蝕。(二)如Hobsbawm(1983)所言，族群是透過建立和歷史的連續而建構出來的。客家人便經由代代相傳的客家先民移民史建構出不同於閩南的客家認同(Constable 1994)。客家子弟常被提醒祖先自原鄉向外開拓的艱辛，勤儉、苦作和實際等特質，便在建構族群歷史的同時，也被建構成客家人的特色。在客家人處於弱勢的情況下，強調務實的族群特質便鼓勵了客家人隱藏族群認同，以避免遭受偏見和歧視。(三)台灣自1945年以後的發展一般而言是外省人佔政治優勢，而閩南人擁有有利的經濟力。相對的，客家人在政經上都處於弱勢。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中，許多客家人離開破敗的農業部門，成為公務員或閩南人所有的公司、工廠(林和林 1993)。不論是在公部門或私人企業，客家人都是弱勢族群，他們的語言和生活方式都必須屈服於主流之下(徐 1996)。都市化的另一結果是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而族群間通婚往往是弱勢族群同化於主流文化的重要機制(徐、蕭 1994)。

綜而言之，客家在台灣政經發展過程中，受到經濟和社會的雙重邊緣化。如前所述，工業化和都市化使得農村男子被貼上“沒出息”的標籤，而農村的客家人除了務農的弱勢外，他們還遭受了族群的歧視。多重的社會邊緣位置構成了農村客家男性在婚姻上的挫敗條件，許多人因此走向東南亞國家。

#### 四、印尼：社會經濟發展

印尼共計有17,508個大小島嶼，擁有全世界第四大的人口。印尼的發展主要集中在爪哇島，爪哇只佔全國面積的6.5%，人口卻高達全國的60%。印尼為荷蘭佔有340年的殖民地，二次大戰期間為日本所佔據。印尼於戰後獨立，1965年民選的共產黨政府遭到軍方叛變，之後印尼便籠罩於白色恐怖之中。許多中國人在此政變中被害，因為他們被認為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自此印尼華裔與政治疏離，而全心朝經濟活動發展。

印尼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石油、金礦、和肥沃的土質。然而，長期受到殖民，這些資源造成了印尼的低度發展，而非帶給人民財富(Knight 1982; Aas 1980)。印尼目前外債已高於七十億美元，主要經濟活動為原料出口，因此受到世界經濟波動的高度影響。例如，印尼曾高度依賴石油外銷，在1980年代初期，石油產品出口佔了總出口的82%。1985年國際油價下滑，嚴重地影響印尼經濟。印尼政府遂開始獎勵外銷導向工業，鼓勵非石油產品的出口。(駐 1994b)

自1983年開始，印尼政府提供許多誘因以吸引外資(Wang 1990)，而於1988年開始大量外資流入。1988年為44億美金，1991年則增為87億美金，其中日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為主要投資國。印尼政府於1969年開始第一個五年經濟發展計劃，到了1990年已實施了第五個五年計劃，”經濟起飛”指日可待(駐1994b; 駐印尼經濟部官員分析)。

## 五、印尼：族群關係

荷蘭殖民者將印尼人民分為三階層：歐洲人，亞洲移民(主要為華裔)，和原住民(駐 1994b)。這種典型的”分化而征服”(divide and conquer)的殖民統治政策種下了印尼原住民和亞裔(尤其是華裔)間長久的矛盾種子。荷蘭殖民政府給予華裔在經濟活動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印尼獨立後，政治權力移轉至印尼原住民身上，而華裔仍掌握了經濟優勢。除了國營事業外，印尼大多數的工業和商業是在華裔控制之下。據估計華人掌握了印尼所有經濟活動的70%以上(駐 1994b)。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僅有少數華人掌控了印尼的經濟，其中又以閩南裔為主。近年，來自台灣的資本家對印尼工人的剝削讓過去華裔與原住民間的緊張關係更為激化，台商工廠遭罷工的比例為所有外資的第二位，僅次於南韓。「排華」風潮時有所聞，富有的華人早已做好移民第一世界國家的萬全準備，而貧苦華人只有另尋出路，「國際婚姻」為其中之一。

與台灣類似，印尼華裔主要是閩南和客家人，而客家人同樣也是華裔中的少數。作為弱勢中的弱勢，印尼的客家人有著許多弱勢族群所共有的不安全感(顏 1996)。客家在東南亞的移民比閩南人晚，但他們在礦區落腳的模式卻樹立了華人移民東南亞地區的典型之一。早期東南亞的客家移民是以開礦為主，所開採的礦物主要是金和錫。客家人於1776年開始在婆羅洲的坤甸從事錫礦開採，之後陸續發展到邦加、勿里洞等地。相對於客家人以採礦為主的移民，閩南人在東南亞

的移民形態以都市港口和郊區農業為主。客家人也落腳在鄉村地區種植稻米和蔬菜。他們很少耕種現金作物，主因是客家人沒有掌握貿易港口，這些港口大多為閩南人所控制。務農的客家人主要將稻米和蔬果賣給礦區的華人。(顏 1996)

客家人以礦為生，但在金礦挖採殆盡，和國際錫礦價格下滑的情況下，生計受到嚴重衝擊。以西加里丹曼(過去的婆羅洲)為例，三百三十萬人口中有55.9%生活於貧窮線之下(邱 1995)。山口洋有近七成人口為華裔，其中九成是以打漁和農作為主的客家人，而閩南人則多從商，掌握了經濟(Napitupulu and Kaliaiatu 1995)。再者，如同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印尼的工業化劇烈地衝擊著農業，大規模的農民離鄉離土湧進工廠或城市中的貧民區。印尼新娘大多來自客家人早期採礦和務農的坤甸、山口洋、邦加和勿里洞等地，經濟窮困迫使她們來到雅加達尋找工作機會，棲身於窮街陋巷。台灣與印尼間日益頻繁的經貿往來，也帶來了各種「台印聯姻」的相親場合，成為她們脫離貧窮的契機。

值得一提的是，郵購新娘的貿易牽涉不同的種族，然臺印聯姻卻可稱得上是同族通婚，原因在於臺灣男子只中意華裔的印尼女子。華裔以外的印尼人受到了歧視；臺灣男子及印尼華裔女子均不願與印尼當地人通婚。如同大多數台灣人，他們有著「大漢人意識」視印尼當地人為“番人”，除非走投無路，不然他們不可能與其通婚。

## 結論

「外籍新娘」在各媒體等通俗論述裡被建構成社會問題。新娘和新郎們被鄙為一群沒有知識的社會問題製造者，他們的婚姻更被唾為「買賣婚姻」。誠然，他們的婚姻看似一種貿易行為，他們或許也確實不具有高等學歷。但是當我們再深入去探討這「買賣婚姻」背後的形成結構脈絡，便會發現他們並非社會問題的始作俑者。事實上，他們是各種階級與族群關係不平等下，一群被不斷邊緣化的受害者。「國際婚姻」為兩國的男女提供了出路。對印尼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外籍新娘」而言，嫁給較富裕的臺灣男子，對自己及家庭都不失為一條希望之路。異國聯姻保證了她們的工作機會，也給她們的家庭帶來金錢上的支助。另一方面，前往印尼和其他地區娶妻的臺灣男子大多數出身農民家庭。臺灣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業衰退使得他們在經濟與社會位置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外籍新娘」解決了他們的婚姻需求。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在同樣的階級與族群結構下，我們鮮少聽聞台灣婦女嫁給東南亞男性。相對地，我們所見到的是，台灣女子嫁給西方男

子，「洋女婿」權益問題便曾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切。”性別”在這些現象裡昭然若揭：在婚姻關係裡，女性往往必須比男性擁有較低的社會位置。所以，台灣婦女”上嫁”給第一世界的男性，而鮮少”下嫁”給第三世界的男性。雖未就”性別”議題作更深入的討論，作者認仍為”性別”是關鍵問題。但本文所欲強調的是，討論性別問題時，應關注不同階級和族群的婦女有不同的生命歷程與集體記憶，唯有充份討論不同的經驗，「姐妹情誼」才有建立的基礎。

## 參考書目

江丙坤、楊世緘

1994 我國當前南向政策之檢討。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報告。

宋鎮照

1993 中華民國與東協四國之經濟位賴發展關係：臺灣經濟第203期。

林忠正、林鶴玲

1993 「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張茂桂編：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出版社。

邱福松

1995 台灣速成新郎南向與印尼新娘成婚之現況及因應。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徐正光

1996 客家人在台灣的發展及其當前面對的問題。發表於第三屆客家學國際研討會。新加坡，1996年11月9-12日。

徐正光、蕭新煌

1995 客家族群的「語言問題」 台北地區的調查分析。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0期。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社。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1994a 經貿商情月報 印尼地區(八十三年六月份)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1994b 華僑與印尼。

蕭新煌

1981 「台灣地區農業政策的檢討和展望 事實與解釋」。我國主會的變遷與發展，頁491-526。台北：東大書局。

陳玉璽

1992 台灣的依附發展。台北：人間出版社。

顏清煌

1996 東南亞歷史上的客家人。發表於第三屆客家學國際研討會。新加坡，1996年11月9-12日。

Aas, S.

1980. "The Relevance of Chayanov's macro theory of Java." In E. Hobsbawm, et. al., Peasants in History. Calcutt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guilar, Delia M.  
1987. "Women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hilippines." *Alternatives*.XII: 511-526.
- Brewer, Brooke Lilla.  
1982. *Interracial Marriage: American Men Who Marry Korean Women*. Dissertation, Syracuse University.
- Cooke, Fadzilah M.  
1986. "Australian-Filipino Marriages in the 1980s: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Research Paper No. 37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Asian Relations, the 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Griffith University.
- Costable, Nicole.  
1994.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kka identity." In Chen, Chuang and Huang (eds.) *Ethnicity in Taiwan: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del Rosario, Virginia O.  
1994. *Lifting the Smoke Screen: Dynamics of Mail-Order Bride Migr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s*.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Hague. Dissertation
- Donato, Katharine Mary.  
1988. *The Feminization of Immigration: Variability in the Sex Composition of U.S. Immigrants*.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 Glodava, Mila and Richard Onizuka.  
1994. *Mail-Order Brides: Women for Sale*. Fort Collins, Colorado: Alaken, Inc.
- Hobsbawm, Eric.  
1983. "Introduction." In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night, G. R.  
1982. "Capitalism and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Java." In H. Alavi, et. al. (eds.). *Capitalism and Colonial Production*. London: Croom Helm.
- Lai, Tracy.  
1992. "Asian American Women: Not for Sale." in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 Anthology*. Margaret L. Andersen and Patricia Hill Collins (eds.)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Lipton, Michael.  
 1976.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apitupulu, Sarluhut and Toeti Kakiailat, U.  
 1995. "From Singkawang looking for love." *Gatra Magazine*. Vol. 30. (in Indonesian)
- Rhee, Siyon Yoo.  
 1988. *Korean and Vietnamese Outmarriage: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Rho, Jung Ja.  
 1989. *Multipl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Korean-American Marriages and Correlations with Three Dimensions of Family Life Satisfaction*. Dissertation,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 Rousselle, Ann.  
 1993.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Inter-marriage o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the Identity and Attachment Behavior of Children*.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 Sato, Takao (ed.).  
 1989. *The Farming Villages and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Tokyo: Nihon Hyoronsha. (in Japanese)
- Wang, Mu-Hen.  
 1990. "The new trends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Indonesia." *Southeast Asia* (4).

## 記「東南亞文化衝突及整合」 國際學術研討會

宋光宇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四日至五日，在馬來西亞的首都吉隆坡，召開「東南亞文化衝突及整合」國際學術研討會，由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聯合會、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協會和中華民國的佛光大學等三個單位聯合舉辦。有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菲律賓、香港和台灣等地的二十多位學者參加。中國大陸原本有四位學者接受邀請，由於某些不為人知的理由，而全部沒有出席。會議的主旨是希望透過這次研討會，能夠促進東南亞區域的文化交流，各民族之間相互吸取對方的文化精髓，以締造更有活力的新文化價值觀。

會議的地點是吉隆坡的陳氏書院。這是一間具有百年歷史的老書院，不論原籍何處，只要是陳氏子弟就可以入學讀書。現在已是吉隆坡的古蹟名勝。

儘管近十年來，東南亞國家透過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這種政治組織，來推動區域整合，以增加東南亞各國有一個共同的整體認同感，但是各國的文化政策仍是處於矛盾狀態，一方面要求各國文化的有其特殊之處，另一方面則或多或少的壓抑各國境內華裔族群的文化。於是華裔族群的文化傳承和認同問題，就變得相當複雜而且敏感。

會議的主題演講是由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擔任。龔校長指出：東南亞地區近年來由於經濟的發展，逐漸形成一個集體意識，在歐洲共同體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等跨國性區域組織的示範下，遂有人提倡籌組「太平洋盆地」「太平洋共同體」

「太平洋自由貿易聯盟」等組織。可是由於東南亞和東亞的民族複雜、文化互異，一時之間很難組成。他並且指出，有人企圖用「大中華經濟圈」、「儒家文化圈」等概念來涵蓋東亞和東南亞，也是犯了「文化帝國主義」的毛病，讓區域內的其他民族感到不愉快。他強調目前在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的衝突，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未嘗不是「整合」的前奏。只有透過衝突，才有真正的瞭解，整合才有可能。

第一場研討會的主題是華人的文化認同。由來自香港樹仁學院的謝劍教授和汶萊大學公共政策與行政系的高級講師饒尚東兩位發表論文。謝劍的題目是「東南亞華人雙重認同的再思考」。文中以印尼排華的藉口為例，來說明東南亞華人的艱難處境。他指出，在各國獨立之前，是一種「三明治」式的社會結構，歐洲人在最上層，當地土著在最下層，中間是華人。有人戲稱這種形式為「英國人抓牛，中國人擠奶」，把歐洲人對所屬殖民地的剝削，轉移到華人身上。當歐洲人撤走之後，華人就成了替罪羔羊。

謝劍在口頭報告時，則以Sterling Seagrave在1995年出版的一本新書《Lords of the Rim: The Invisible Empire of the Oversea Chinese》為例，說明目前國際上塵囂一時的「中國威脅論」有多麼可怕。這本書的主要論點有三：第一，在東南亞各國，華人在經濟上佔絕對優勢，五千萬海外華人，控制兩萬億美元的流動資產。第二，日本和西方人要想進入東南亞市場，首先就得通過華人這一關，不付出代價，根本無路可走。華人早已在東南亞區域形成一個無遠弗屆的財經網絡。何況戰後西方人撤走之後，資財往往落入華人之手。第三、大陸改革開放正得其時，散處各地的華人都全力投入，為僑鄉帶來蓬勃的發展。Seagrave指出，華人的基本工作倫理有二：一、執著於追求個人的財富，以光耀門楣和鄉里；二、把財富儲存海外當成是一種榮耀。Seagrave在結論中指出，為了對付日益增強的中國威脅，必需要利用日本的強大，乃至於好戰的右派，來制衡中國；外界應該利用時機，來鼓勵大陸的地方主義，形成分裂的社會。謝劍不能接受這種論調。認為該書最大的錯誤，就是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看成是一個組織堅強的整體，事實上是一盤散沙，六十多年來國共兩黨的慘烈鬥爭，禍延海外，也摧毀了華人社區的和諧與團結。他在會議中指出，「中國陰謀論」是很可怕的，一旦失控，就會引起另一場排華風潮。

饒尚東的文章題目是「東南亞華人的文化認同問題」，文中指出，東南亞各國對華人的政策，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同化政策，以印尼、泰國和菲律

賓為代表；第二類是包容政策，以馬來西亞和汶萊為代表；第三類是多元政策，以新加坡為代表。這種差別主要是因華人在各國人口結構中的比例不同所致。印、泰、菲三國的華人所佔的比例低，就只有被同化。大馬和新加坡華人所佔的比例高，就有實力與其他民族分庭抗禮，傳承和發展中華文化的空間也就比較大。不管如何，東南亞華人有一個共同的趨勢，就是認同於當地，由先前的「落葉歸根」轉變成為「落地生根」。

第二場研討會的主題是華文教育。由出身馬來西亞，現在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鄭良樹教授發表〈華文教育 - 超越認同的困擾〉，把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最初情況做了清楚的說明。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前半葉，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根本就是中國國內教育的延伸。中國的教育部和閩粵兩省陸續派人前來視察。所用的教科書也是跟中國國內一樣，以反抗帝國主義入侵的「愛國主義」為主軸。英國殖民政府對這種現象採取不承認，也不干涉的態度，不給任何財務補助，放任華校自由發展。二次大戰之後，這種情勢方始有所改變。馬來亞政府開始強調本土意識，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熱愛本邦、效忠本邦的學生」，於是開始收編華校，改成國民型學校，經費由政府補助，教材改由馬來亞政府供給。不接受收編者，就變成獨立中小學，經費自行籌措，可是在教材內容上也開始擺脫中國的影響，以馬來西亞為主。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林水椽教授則發表〈馬來西亞成立前華文教育的發展與教育政策的衝突〉。他在這篇文章指出，在馬來西亞，有跡可循的華文學校已有一百多年，直到本世紀二〇年代，方始接受馬來亞政府的約束。從1920年的學校註冊法令開始，到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為止，這四十多年間馬來亞政府所頒布的教育法令，都是限制華文教育的發展，甚至是刻意的打壓，致使華文教育危機四伏。

為了華文教育的發展，許多熱愛華教的人士挺身而出。馬來西亞成立之前，有林連玉、沈慕羽、嚴元章和陸庭諭等人，大聲急呼，奮鬥不懈。他們除了要跟政府周旋，努力爭取華教權利之外，有時還得跟反對推展華文教育的人士，如梁宇皋等人對抗。他們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林連玉被褫奪公民權和吊銷教書證，沈慕羽三次坐牢，嚴元章曾經一度被禁止進入馬來亞。

直到最近幾年，台灣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投資國，中國大陸的市場也日益壯大，加上香港，儼然成為世界上是一個相當有份量的經濟圈，馬來西亞當政者方才對華文教育另眼相看。林水椽指出，「在國際的新形式下，馬來西亞的語文和教育政策已漸趨靈活，如果能夠從此不再出現與華教相衝突的政策，國人又開放

胸懷，吸收華人文化，並受鼓勵學習華語，那麼華文教育才能順利發展，華人文化也會和各民族文化自由融合，形成豐富而有特色的馬來西亞文化。」

在這一場，中間夾雜了一篇台灣佛光大學的許仟教授的「種族主義下民族文化的衝突：試論德國極右主義」。看上去，與這一場的主題不相干，可是如果把華文教育的困境看成是民族文化的衝突，就可以拉得上關係。所謂極右主義，是指唯國家民族至上，把個人的價值溶於國家之內的一種主義。這種主義極端發展，就會產生一連串的排外暴力事件。德國納粹黨徒在二次大戰時集體屠殺猶太人，就是這種主義在作祟。德國統一之後，內部的問題接踵而來，導致右翼極端主義再度復活。許仟認為德國政府只有趕快設法解決國內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化解社會上的不安和不滿的因素，這種極右主義才會逐漸消沉下去。許仟是留德的博士，對這種極右主義有深刻的認識。他用這篇文章來參加有關東南亞華人文化認同問題的研討會，其用意就在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不過，聽在與會的幾位馬來西亞新聞工作人員的耳中，就完全不是這種意思。他們認為這篇文章有暗喻、隱射之嫌，馬來西亞政府會很敏感的。私下表示，將來出書時，這篇文章一定要慎重處理。

第三場研討會一共有三篇論文，各吹各的調，沒有共同的主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何啟良教授發表「政治孤航和文化典範：沈慕羽論」一文，談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鬥士沈慕羽。文中的主角沈慕羽，現年八十四歲，一生都為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奮鬥。是平民小學和晨鐘夜校的校長，也曾擔任全國華社教師職工總會（簡稱「教總」）的主席長達二十八年。1994年方才卸下這個重責大任。一生為了維護華文教育，曾經三次坐牢。作者認為對沈慕羽的評價可以說是「華教尚未平等，同志仍需努力。」

佛光大學的蔡瑞霖發表「文化交流的主體性之解消——從世界主義觀點到後殖民觀點」一文。主要在探討東南亞是否成為「世界史」的邊陲、西方世界主義中的東方觀點、華人傳統的世界觀和「華夏夷狄之別」、如何解消這些傳統的框架，進而建立東南亞各國脫離殖民主義後的新文化。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所長林若雱教授發表「國際新現實主義與互賴理論下的台灣與東南亞關係」一文。林若雱指出「進入廿一世紀，不論是政府或是人民都必需要有拋棄傳統思維包袱，以全新的理念與行動來迎接跨世紀來臨的心理準備。」在這種思維下，台灣和東南亞各國的關係可能可以進一步的發展。「對東協各國而言，多年來與台灣發展良好的實質關係，甚至未來進一步達官方層級，並非絕不可能，首要之務在中共放棄民族主義立場和僵硬的主權觀。」「東

協各國也體認，若缺乏台灣參與，則東協區域安全的集體對話則不夠完整。」「對台灣而言，如何使東協在中共與台灣之間求得平衡點，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

「台灣爭取國際生存空間，對東南亞的關係，無論正式的第一軌道外交，非正式的第二軌道外交，都應卯足全力，爭取參與。」「簡言之，台灣與東南亞的關係，目前的情形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絕不可以一日懈怠，因為『做了，不知結果如何；不做，明天就將後悔』，得失之間，不言可喻。」

第四場研討會的主題是東南亞的宗教，主要是由宋光宇和鄭志明兩人擔綱，外加來自菲律賓的吳文煥談菲律賓華人的文化。

鄭志明是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宗教研究所的所長，所發表的論文題目是「東南亞各民族間宗教交談的可行性」。這是一篇假設性的文章，假設東南亞各地的民族複雜，文化多元，各民族之間會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發生衝突，唯有加強彼此的對話和溝通，才可以避免衝突的發生。作者強調：近年來東南亞各民族之間開始意識到宗教之間相互合作的重要性，若干宗教領袖積極的提倡相互容忍。以天主教最具有代表性。在東南亞舉辦了多次會議，邀請各宗教領袖與學者，倡導亞洲各宗教彼此交談。作者認為這種高層次的學術會議，忽略了探討各民族信仰的精神系統和教義體系，偏向各種制度化宗教的外在形式和教義體系，導致交談的主題似乎偏重某些形而上的理論層面，未能落實到各民族現實文化傳統上。於是作者提出幾點建議：

- 1, 各宗教皆應重視任何民族原有的傳統生活；
- 2, 肯定各民族的宗教生活，是多層次的文化組合。宗教交談應該在教義倫理之外，多加注意每一個民族自身源遠流長的精神信仰系統；
- 3, 擺脫「正統」與「異端」等宗教感情的對立，因為這種對立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最大盲點。

這篇文章沒有舉出具體的實例來說明東南亞宗教方面的直接衝突，只是空泛的指出東南亞各國的宗教衝突情形嚴重，讓不知情的讀者無法判斷是真是假。而且各民族的宗教很少成為一個系統，也缺乏具體的組織，當然也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該民族的宗教來做什麼事情。如此，則如何進行不同民族之間的宗教對話？作者沒有明示究竟該怎麼辦。

宋光宇則是提出一份實證的田野調查報告，談一貫道這個教派在最近二十年中，如何從台灣傳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他指出，從台灣向海外華人社會傳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移民那個社會，投資做生意，以生意上的收入來支付海外傳教所需的開銷，才能在海外慢慢的生根立足，二十年後才會開花結果。

吳文煥在《試論華菲文化的關係》一文中，列舉菲律賓華人因傳統文化和社會經濟因素，如何看不起菲律賓土著。他指出，華人義山的豪華大墳，讓菲律賓人誤以為所有的華人都是如此豪華享受。華人也不斷的指責菲人懶散、手腳不乾淨、貪污成性等等。這些成見都造成華人與菲人的隔閡與猜忌。吳文煥的文章不長，細讀起來像是華人自我反省的懺悔錄。

第五場研討會的主題是族群關係和文化認同。有來自菲律賓馬尼拉大學的洪玉華教授用英文發表《華菲人民的文化關係》(Cultural Conflict and Intergration in the Philippines)。基本上，跟吳文煥的文章一樣，列舉了幾項華菲之間的衝突項目，諸如：華人老闆的生活要比菲人雇員的生活好很多，以致引起菲人的眼紅；菲人老是把華人看成是外來者；華人大多經商，控制躉售物價，被認為是在剝削菲人；華菲之間少有通婚等情事。不過，由於西班牙人強力的傳教的緣故，菲律賓的華人多半信奉天主教或者基督教，以致在日常生活風俗基督教化，媽祖像被塑得跟聖母瑪利亞像一模一樣，新生兒滿月時不僅有中國傳統的儀式，更有天主教的受洗命名儀式。洪玉華指出，年青一輩之華人已經跟菲人水乳交融，先前的隔閡和偏見也就隨之減低。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的謝愛萍教授在《東南亞華人的認同和種族關係》一文中指出，對東南亞華人文化的研究，在傳統上，大都以「邊緣論」來分析問題，似乎把東南亞華人看成是個延續著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統一的或完全一致的共同體，忽略了各國華人因教育背景的不同，與各時期歷史發展、社會經濟結構及政治體系不同，而具有的複雜性與多樣性。謝愛萍強調，在東南亞各地的華人社會，其文化雖然源自中國傳統文化，然而長時期與當地人民接觸交往，適應了當地社會之後，已經產生了新的、不同於傳統中華文化的模式。

佛光大學亞太研究所的張亞中所長的論文題目是《多元文化整合的困境：以馬來西亞為例》。他指出：多元文化的整合有兩種基本的形式，一種是「自由的多元主義」，就是以一個族群的文化為主，其他的族群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但是在公開的場合，必需要以那一個主要族群的文化和語言為主。另一種是「全體的多元主義」，也就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對待，公開承認各民族的實際地位和文化特徵，在公共事務上，採用多種語言的廣播、教育、文書，以保護各民族的語言與文化。馬來西亞顯然是採用第一種類型，一切是馬來人為主，認定馬來西亞是馬來人的國家，華人和印度人都應該接受馬來人的生活價值，遵從馬來人的文化與語言。在這種情形之下，華人的高等教育就受到嚴重的阻礙。華人能做的，就是只有將自己放在比馬來西亞更大的多元文化世界之中，向外在的多元文化尋求

能量和整合，也就是說，不再以馬來西亞作為訴求的對象，而是幫助整個亞太地區，特別是華人區域的整合。這篇文章是與會台灣的學者真正瞭解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唯一代表作。

第六場研討會的主題是馬華文學。下午第一場，正是昏昏欲睡的時候，但是由於主講者李瑞騰的妙語如珠，會場的氣氛頓時活潑起來。李瑞騰是中央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論文題目是「新加坡五月詩社的發展歷程」。這篇論文以半報導半評論的方式，介紹新加坡華人詩社的發展歷程。李瑞騰指出，在六十年代，新加坡的年輕詩人的現代詩運動深受台灣的影響，從運動的方式到詩的表現，都可以看到共通之處。在七十年代前葉，台灣爆發了一場反現代詩的運動，演變成後期的鄉土文學論戰。在新加坡，原先對壘的「現代」和「寫實」兩個陣營，卻互相包容，和平共存。其中的「現代」陣營，經由五月出版社，總結了六十年代的創作經驗，然後發展成為詩社的形態。以「文叢」的方式繼續其詩集的出版事業，以「詩刊」為媒介，向世人宣告他們的「詩情」和「詩想」。結合音樂與美術，進行以詩為中心的多元發展。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使新加坡的詩風益加豐美。

作者在報告這篇文章時，講得極為生動，讓沈悶的會場頓時充滿歡笑。不過，看完文章，聽過報告，似乎仍然不清楚什麼才是新加坡文學，乃至於馬華文學的基本特徵。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楊松年教授發表「中國文學與馬華文學的衝突與整合：以戰前馬華新文學為例」。這篇文章所要探討的主題是「中國文學在影響馬華文學時所運作的方式是不是就和在中國所進行的一樣？還是不一樣？中國文學思潮傳至馬來亞，馬來亞是不是依樣照搬？在衝突與整合的過程中，馬華文學又是怎樣處理與中國文學之間的矛盾與調和？」

楊松年首先說明了中國本土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後，新舊文學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那個時候的台灣正由日本殖民統治，當新文學引進台灣之後，也是一樣，出現新舊兩派文學「兩個陣營，壁壘分明，互相攻擊。」但是在馬來亞，這種衝突並不存在。新文學在舊文學作家的倡導下，得以發展。在「愛國」的大前提之下，接納白話文，而當時的許多舊派文學作品就在抨擊各種封建陋習。

那個時候，馬來亞所面對的問題，並不是新舊文學之間的差異，而是馬來亞社會的保守，思想陳舊。對於當時的新舊文學作家來說，他們的重大挑戰就在於如何改變社會風氣，糾正保守的思想，於是新舊兩派文學作家可以攜手合作，共同抨擊這些不良的社會風氣和思想。

楊松年也試著指出，馬華文學的特色，在於「應有南洋的意識」，結合南洋的實際狀況，呈現南洋特有的色彩。因此，在馬華文學的發展歷程上，就曾經有過一批作家反對全盤搬取上海、北京、香港所流行的文學式樣。在二次大戰時，馬華文學蓬勃發展，基本上是把它當成是一種社會運動在做。有三個主旨：配合祖國抗戰、配合馬華的救亡運動和啟蒙運動。因此，馬來亞的華人社會就很看不起那些從中國大陸南來「避難」的文人，郁達夫在抗戰時到馬來亞，也就遭到「不受歡迎」的待遇。

這一場研討會另外安排了大陸學者劉登翰的論「過番歌」。由於未能前來參加會議，此文就由大會派人代為宣讀。在此就不介紹。

第七場研討會，也就是最後一場研討會，主要的論點是文化的衝突和整合。由台灣佛光大學的李利國教授從新聞分析的角度來解讀「新馬重新合併」議題裡的整合訊息與衝突。一九九六年六月間，新加坡的李光耀忽然提出「新馬重新合併」的概念。他所傳達的訊息可以歸納成二點：1、新加坡有意願重新加入馬來西亞聯邦；2、影響新加坡要不要「極力」爭取成為馬來西亞聯邦一份子的因素，在於馬來西亞的體制價值目標與政治成果能否符合新加坡的期望；3、新加坡所追求的是實質「融合」的最終狀態，也就是社會同化、價值分享的未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的回應卻是「如果他想重新加入，他有權開條件，我們也同樣有權開出我們的條件。」。馬哈迪總理的答覆可以解讀成：1，政治整合這個話題的討論實有賴於諸多條件的配合；2，既然要追求整合，就不應該是誰影響誰，或者是誰的意志加在誰的身上，而是培養共同的社會與政治價值觀念，否則彼此羅列各種條件，豈不適得其反？在結語中，李利國指出，新馬兩國重新合併的日子，縱然雙方都有意願，也仍然是遙遠的，不過，如果雙方都意識到，在「一套新的政治系統之下，該架構和新功能的發展與運作，．．．．．不論是從地理版圖，或政治、經濟的層面上來看，都較原來的架構所能產生的功能來得更大，並更能增強彼此間的歸屬感及利害與共的情義。」那麼，從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統合經驗而言，未來新馬重新合併絕不是一個不可實現的夢。

星洲日報總主筆羅正文則提出「文化衝突與整合的現代意義」一文，對於廿一世紀的東南亞社會有一番新的期許。東南亞是一個傳統文化色彩比較濃厚的區域，絕大多數人都沉溺在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等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政治管理系統也是按照血緣關係和繼承關係等自然原則組成。它的具體操作也是依照日常生活經驗為原則。若是想要有進一步的改變，那唯有把以家族為中心的局面改變

成以個人為中心的局面。不過作者似乎不熟悉歐美的「個人主義」，文中只提出以個人為中心的想法，而沒有任何稍為深入的說明，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兩天的會議，有以下幾點特色。第一、與會的學者和旁聽的學生一直保持相當高的出席率，聽講的情緒高，這是在台灣開研討會不容易見到的現象。第二、討論熱烈，但是都能保持一定的風度，沒有台灣常見的「窮追猛打」的惡習，學生比較不敢向論文發表人提問題。第三，台灣的學者對於東南亞的認識相當有限，以致有些看上去文不對題的文章出現。第四、學者討論華人社會文化的態度跟當地政府的同化政策的強弱有關。像來自採取強力同化政策的菲律賓的兩位學者，他們的文章幾乎可說是一種自省式的懺悔錄，數說自己的不是。馬來西亞由於是華人目前還可以跟馬來人的勢力相抗衡，所談的主題就圍繞華社如何在不公平的待遇下堅持華文教育。臺灣由於置身事外，也就出現一些天馬行空，不著邊際的論文。

台灣對東南亞的研究剛剛起步，而且無可避免的會以台灣的觀點來看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各種現象。其實，台灣跟東南亞的華人社會同樣都是十九世紀閩、粵海外移民的一部份，其社會的基本結構，如家族組織、同鄉會館和寺廟、商業掛帥等，大體上都相同。可是一百年後，兩地的發展已經呈現不同的風貌，是什麼原因有以致之？這個問題可以是未來台灣發展對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時，不可忽略的主題之一。

## 看「戰後東南亞歷史發展」\*

張存武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

東南亞現在像歐聯、中國大陸一樣受到世人的重視。這次受重視不是因為它滿足了歐洲人的殖民慾，或歐洲人失掉了它，成了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一部分，也非由於冷戰大氣候下骨牌論情勢使然，而是由於它的成員大致經濟發展有成，而且結合成了一個國際集團 - 東南亞國協，與西方關係較為密切，在西太平洋是日本與中共之外的另一區域力量。就若干年前對亞洲四小龍一樣，各方面對東南亞的發展紛紛提出觀察解釋。中國大陸的對外研究雖然也是在政經改革開放後方得積極，由於其學術研究重實用，尚綜合解釋，且常納入國家五年經建計畫，所以頗有可觀者。近讀雲南大學出版社 1995 年所刊賀聖達、王文良、何平共著之戰後從東南亞歷史發展，頗有收穫。由於台海兩岸學術交流尚不暢通，且該書近五百頁，閱讀也需要些時間，即有意思學者也不一定都看過，所以此處主要就其代前言、導言、結語加以介紹。

著者們說，東南亞包括十國，人口近五億，陸地面積四百五十餘萬平方公里，其政治、經濟、民族、文化、宗教方面的多樣、多元性，世界上沒有一個地區能與之相比。對這樣的地區，只有深入、全面、系統的研究其歷史與現狀，才能真正瞭解。直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水平大致相同，至九〇年代初，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差異已非常大。探討此歷史發展，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

---

\* 《戰後東南亞歷史發展》一書由賀聖達、王文良、何平共著，1995年由雲南大學出版社出版。

世界國家有借鑒、教訓的意義。用二次大戰後的東南亞的歷史發展證明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無關聯性，是著作該書的更重要目的。他們的任務是勾勒出各國及全區政經發展的線索、軌跡和基本面貌。

在時間縱向及空間橫向的交叉處理下，該書共分三篇，每篇第一章為區域綜論，接著是國別探討。第一篇、一至九章論述東南亞各國由於長期受西方殖民統治後，及與西方的聯繫，獨立後均先後試行西方議會民主制度，至六〇年代初，除菲律賓外均告失敗。原因是西方議會民主在東南亞由於缺乏歷史、文化、經濟和群眾基礎，不能發揮其在西方的那種功能，無力解決東南亞國家獨立後面臨的政經等困難。從歷史文化上看，東南亞諸國在西方入侵前是些大小不等的封建專制國，文化上受儒、佛、回影響，山區偏僻甚至是部落階段。直到二十世紀初，各殖民國方設立議會，然無民眾響應支持，共有菲律賓因美制政策及原始部族缺乏君權觀念而有較廣泛響應。在經濟上，六〇年代諸國均屬農國，城市人少，教育水準低，以私人工商業為基礎的中產階級尚未形成，故無西方多黨議會制發育的土壤，而西方議會制的引入乃自上而下，未經多數人民，而且因民族複雜，美蘇兩集團的鬥爭，各種政治勢力以民主旗號活動的同時，未提供有效的社會穩定機制和約束機制，故各種矛盾充分頻露發展，黨派鬥爭愈演愈烈，導致經濟惡化，未能贏得人民的支持，而軍隊、強人掌權後用傳統政府形式，不用外來的政府形式，一黨統治和專政成了可能的選擇。

第二篇、十至十七章論述六〇年代中期至八〇年代初東南亞各國在不同發展道路上發展，集權型統治和經濟發展。本期中東盟成立；泰國實際上一直是軍人操權，印尼是蘇哈托與軍隊、專業集團控制，菲律賓為馬可士執政二十年，新加坡為李光耀時代，馬來西亞在民族政黨巫統手中，議會政治正常。緬甸及印支三國走共產主義路線。但這一時期除菲國外，東盟各國經濟有較高的增長。其原因，除實行市場機制、對外開放等經濟發展策略外，著者以為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中出現了一個致力經濟發展或現代化的強力集團，採用集權（極權）型治國方式，消除影響本國發展的負面政治因素，倚重為其服務的智識階層，特別是專家，推行各項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宏觀環境。在整個社會上加強了秩序紀律。至於緬甸統治集團未能使經濟發展，乃因其價值取向不是現代化，是民族主義自立更生，閉關鎖國，脫離實際大搞國有化，不重視知識份子和工商業者，以及六〇年代後國內始終戰亂。不過，著者也同時指集權型發展的沈重代價：殺害、壓迫、貪污、家族政治、貧富差距擴大，國營經濟虧損，管理制度僵化，成了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總而言之，是利多於弊，國家綜合經濟力增

加，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了。

第三篇、第十八至二十八章論述八〇年代初至九〇年代初的東南亞。這是調整變革時期，重點在政體的變革與民主的擴大，但各國情況不同，主要動源於國內，在穩定基礎上漸進改革，而社會經濟進展更大。八〇年代中，菲國因經濟停滯混亂，人民推翻馬可土政權，但政局並未穩定，經濟也未有起色。泰國中產階層力量對抗軍人，但未真正勝利。新加坡政體有所改變，馬來西亞削弱各州蘇丹特權而仍由巫統操控，印尼強人猶在而反對勢力漸強。這四國經濟成長依舊高。緬甸及印支三國共謀經濟發展，政治上仍一黨專政，而緬甸經濟無起色。

第二十九章是本書的結語，總結戰後東南亞經濟發展的經驗。首先指出關乎東南亞經濟發展成敗得失的八項基本或長期發揮作用的因素：文化背景、政治民主、社會制度、穩定、經濟體制、發展戰略、經濟政策和對外開放。接著論述各因素功能的優先順序。著者們認為，文化因素並非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也非起單獨作用的因素。因為有儒教文化的新加坡與佛教文化的泰國，回教馬來西亞及印尼經濟均有高成長率，而有儒教影響的越南，佛教影響的緬、寮則經濟停滯。各國均有華人，共有行市場和私有經濟的國家，華人經濟才能發揮。故文化的作用受制於經濟、政治條件及國際環境。六〇年代初各國行西方議會政府時經濟發展不快，而在集權型政治時期則快速，顯示民主因素作用主要表現在民主參與應與經濟發展的原則一致，脫離本國的實踐而行西方式民主，並不利於經濟發展，只有逐步改革，擴大民主，才有利於經濟發展。菲律賓行資本主義而經發不袂，越南行社會主義制經發有時滯，有時快，足以證明社會制度總體上有容納現代經濟的發展，關鍵在如何調整改革，使本國的社會制度更能發揮活力。穩定，工農並重，控制物價、匯率等經濟政策，及對外開放均有利於經發。最後的結論是，在發展中國家，以有力的領袖人物為中心的領導集團領導方式是經濟發展的保證。

本書對戰後五十年間東南亞十國的歷史發展作了縝密的探討，史料充實，作了充分的理論分析。手此一冊，對這半世紀東南亞的歷史發展可得到一清晰瞭解。這是本力作，值得一讀的書。在觀點上，這是目前中共改革開放限度內的發揮。強調領導人、領導集團的作用，是事實寫照，也可以說迎合現實。用詞方面有的淡化、和化了，有的仍有改革開放前的韻調。分析有點過細，以致重複。此外，如以本書論旨論述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必定得出較客觀平實的結論，代替至目前為止仍不夠學術性的描述論斷。

## 《平衡的東南亞研究：來自美國的反省》 新書介紹

龔宜君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  
一般博士後學者

1990年七月三十四名美國研究東南亞的學者聚集在 Wingspread，史無前例地檢討美國四十年來所做的東南亞研究，會議中的重要議題於1992年時由 Charles Hirschman, Charles F. Keyes 以及 Karl Hutterer 編成《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Balance: Reflections from America》一書，以作為未來美國東南亞研究的反省基礎。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反省與檢討，或者可以作為現今台灣東南亞研究的參考，以下便介紹本書的大要。

本書共收錄了七篇文章，並由著名的政治學者與東南亞研究專家 James Scott 作序，而由 Karl Hutterer 作跋。其中 John Wolff 的“Dimensions of the Teaching of Southeast Asians Languages”，Robert Bickner 的“Problems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Instruction: The Case of Thai”以及 Richard Lambert 的“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Instruction”這三篇文章討論的是有關東南亞國家語言訓練的問題。而 Benedict Anderson 的“The Changing Ecology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0-1990”，Charles Hirschman 的“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Frank E. Reynolds 的“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merican: Reflection on the Humanities”，和 Charles Keyes 的“A Conference at Wingspread and Rethinking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的四篇文章，則主要是整體的反省並檢討美國四十年來的東南亞研究，以下即整理出他們所指出的

「不平衡」( imbalance ) 及未來的走向。

雖然，在四十年前東南亞研究在美國即成為一門學術領域，但本書的作者們都認為由於缺乏「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 的研究傳統（儘管東方主義可能造成西方中心主義的扭曲），使得美國的東南亞研究是追隨著美國的政治風向進行研究。1950 年代美國新興霸權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的擴張之國家安全理由而進行對東南亞的研究；在 1970 年代則是因為美國介入印支半島及越南，而展開另一波美國學者對東南亞的研究；1970 年代中期以後美國退出印支半島，美國的東南亞研究也幾乎停滯了十五年之久；而這樣的研究取向造成了美國東南亞研究的不平衡現象。

首先，在政治風向的引導下使得美國的東南亞研究呈現出「單面向」( one-side ) 的不平衡。許多的研究是政策取向，且培育出的大都是政治科學的專家而缺乏人文學科的研究人員。此外，美國東南亞研究的受政經風向之影響也表現在研究經費的取得上，例如在 1970 年代時主要的研究經費的來源是聯邦政府，因此，大多數的研究必須投其所好（有政策實用性之研究），也造成研究方向的偏失。

1970 年代中期美國退出印支半島，再加上 1980 年代美國經濟的不景氣所造成之研究經費不足的情形，更加地使東南亞研究邊陲化。東南亞研究只侷限在少數研究者理解的層面，在學院中也只有研究生從事相關之東南亞的研究（很大部份是東南亞裔的學生或有東南亞居住經驗者），無法將之擴展到大學部的領域，這也是東南亞研究無法產生教育上影響的重要原因。

對於美國東南亞研究上述的不平衡現象，本書的作者們提出了相關的建議，包括有：

- (一) 在解構政治機會影響東南亞研究的狀況下，美國的東南亞研究學者必須尋找一個新的智識基礎，一來作為能動員公部門和私部門資源的誘因，二來則作為引導研究者趨向這個領域的依據。Karl Hutterer 建議應該尋找出東南亞文明的本質，尋找出如中國、南亞、中東等區域研究中所吸引研究者之「大文明」( great civilization )；他認為東南亞研究的重要驅動力，應該是東南亞本身所具有的大文明，而不再是美國自身的政治利益。
- (二) 在學術全球化的進展中，應該積極地尋求與東南亞本地之學者進行合作、交換與對話，以能更貼切地理解東南亞。
- (三) 應該積極地訓練東南亞語言人才，並進行大量翻譯東南亞之研究。語言人才的訓練不應只重口語的技巧，更要理解當地人文、社會背景，以作為學

術國際化的基礎。

雖然本書作者們對東南亞研究的建議是針對美國情形有感而發，事實上也適用於台灣今天的東南亞研究。學術的生根與學術國際化是不可逆的趨勢，東南亞研究也應作如是觀。中央研究院東南亞研究計劃下的各項與東南亞學者的跨國研究計劃以及馬來語教學的實施，也都是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對於他人對東南亞研究之反省之認識，或許可以避免我們重蹈覆轍。

## 日本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Waseda University

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是直屬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之研究機構，設立於一九四〇年九月，至今已有超過五十六年以上的歷史，為目前早稻田大學中歷史最悠久的專門學術研究機構（本所不招收學生）。遠自太平洋戰爭以前至今，在這段悠久的歷程中，本所曾執行過許多人文社會科學方面重要的研究調查工作，本所設立時名稱為興南經濟研究所，一九五五年改組為大隈紀念社會科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創立人為前日本總理大隈重信爵），改組後揭櫫「日本之社會科學性研究」與「世界重要地區之地域研究」兩大研究目的的發展目標。本所在早稻田大學除扮演研究機構角色外，也設立各種公開講座提供校內外學生教育學習與研究者交流的機會。

### 研究活動：

#### （1）研究部會

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七年度共有研究部會二十九種，和東南亞研究直接相關者包括：東南亞地域研究部會、IPR 及其時代研究部門、亞洲近代化研究部會、亞洲認識研究部會、「地域之國際化」研究部會、菲律賓研究部會等。

#### （2）各種講座

包括一般性通年例行之「社研講座」與對校內外發表研究部會之研究成果的「公開講座」。

一九九五年度「社研講座」計有三十九個講座開講，和東南亞研究相關者主要包括「東南亞研究」（其中之東南亞近現代史研究、印尼現代史研究、環太平洋地域演習三講座）與「東亞研究」（其中之亞太地域經濟研究講座）、「綜合研究」（其中之在東南亞之國民形成與國際環境、變動期之亞太 - 歷史與展望等兩講座）等。

「公開講座」至一九九五年止共召開二十七次、一九九五年共通論題中之「現代東南亞之國際環境與地域像」中的各講座與自由論題中之部份講座和東南亞研究相關。

### 出版品：

機關誌：『社會科學討究』，每年定期出版三期，內容為學術論文集之形式，目前最新號為第四十二卷第一號（總號一二二號）。

研究通訊：『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所報』，兩年一期，內容為所務報告，目前最新號為三十三號。

專書：『研究系列』，包括研究叢書與翻譯叢書等，目前已出版三十四種。

### 附註：

本所預定於一九九七年籌備擴大改組為「亞洲太平洋研究中心」，併設大學院「亞洲太平洋地域（比較文化）研究科（暫定）」，將開始招收碩士班研究生。

（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外國人研究員陳俐甫提供）

## 日本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 概論

東南亞研究中心是一個附屬於京都大學的多面向研究機構。成立於 1965 年，目的在進行對當代東南亞的系統性及整合性的區域研究。中心內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學者對區域內各種不同的問題進行合作研究。

本中心提供機會予來自東南亞和日本之大學與研究機構的訪問學人，使其得以和中心的研究員一同進行區域研究。而大部分的研究員同時也在農業和人文與環境研究之研究所任教。

資料學系蒐集此區域內之書籍和其他資料文件，近年來並試圖獲取以區域內當地語言寫成之基本參考書目。

本中心的出版包括一份季刊、兩份 monograph series 和一個研究報告。「東南亞研究」於 1963 年創刊，出版相關領域的研究論文，其稿源來自京都大學內外的學者，並且部份翻譯成日文與英文。

## 歷史

本中心之歷史可溯自其正式成為京都大學之分支機構之前。1958 年春，一群在 Kyoto 的學者聚集商議有關舉辦對東南亞文化與社會之非正式討論會的可能性。此舉引發了每月一次的討論會，並逐漸吸引大學的老師及研究生前來參加。最後，熱情的參與者了解到值得將此聚會組織成為一個更制度化的論壇以提供給該領域的學者。

因此，籌備委員會在 1961 年組成，旨在組織一個東南亞研究的系統性課程，包括在大部分的區域研究課程中被大部分西方大學與研究機構所忽略的自然科學。

甫組織成的中心不遺餘力地在開展其第一個五年計劃，特別強調泰國與馬來西亞。參與其中的是一群親赴這兩個國家執行各種不同的田野工作的研究人員，而其田野工作的範圍從人類學家的社區研究、以至對熱帶雨林、水稻土壤及農業技術的調查。為了方便活動之進行，於 1963 年 10 月在曼谷成立一間聯絡辦公室，一直由中心代表負責。至於基金，則基本上來自於私人資源，包括一筆從福特基金會來的款項和中心支持者所提供的基金。

中心的研究課程在初始階段的結果具前瞻性，使得日本教育部決定正式以經費支持，用以鼓勵其起步的區域研究計劃。1984 年 4 月前，本中心已有九個研究部門涵蓋了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而至 1989 年 4 月，本中心為了能增進東南亞區域研究的互動與整合，更進行了一次主要的擴充，並重組成為十四個研究部門。

## 現況

截至 1994 年 12 月，該中心下有生態研究、社會文化研究、整合之過程、發展研究及人類環境等五個分支研究計劃，三個訪問學人之部門、內有六位來自海外之訪問學人及兩位來自日本大學與研究機構之學人，一個資料館、內設有一

間出版辦公室、一間圖書館及電腦室，行政部並設有兩個海外聯絡室，其一設於曼谷、另一則在雅加達。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助理李志遠譯)

## 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 \*

### 成立背景

1983年3月27日，全國華團領導機構在檳城華人大會堂召開華人文化大會上，議決於文化備忘錄工作委員會完成任務，並予以解散之後，繼而籌組全國文化工作委員會，以推動文化工作，使民族文化覺醒運動能延續下去，成為一項長期性的運動。

全國華團領導機構於1984年8月12日的一項聯席會議上，議決正式成立「全國華團文化工作委員會」，並列設立華社資料研究中心為重點工作。在十五華團的努力之下華社資料中心在1985年元月宣告成立，並於同年9月15日正式開幕。

在全國十五華團及其後堂聯、董總、教總三大機構的安排之下，華社資料研究中心先後由雪蘭莪中華大會堂及全國董總負責託管。1993年7月29日，本中心獲得公司註冊官的批准，以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的名稱，註冊成為非營利有限公司。

### 宗旨與角色

1. 收集及整理資料，供研究用途，同時開放給國內外人士使用；
2. 從事大馬華人歷史、社會、經濟、教育等人文課題之研究，推展學術活動；
3. 傳播資訊、激發輿論、更新思想、促進國家、社會及個人的健全發展；

---

\* 馬來西亞華社資料研究中心，於近期更名為華社研究中心。

4.提供專業化的諮詢服務。

## 資料收藏

中心所藏的資料包括剪報、圖書、期刊、視聽資料等。根據 1995 年 6 月的統計：

- 1.剪報：中心的剪報資料是國內最齊全的其中一個資料中心，有為數 4,550 檔目。這些資料來自國內外的 20 種中、英、國文報紙。中心備有《剪報資料分類編目》，方便查閱。
- 2.圖書：中心的藏書達 10,000 冊，主要是有關東南亞研究、馬來西亞研究、華人研究以及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的中、英、國文書籍。這些藏書根據杜威圖書分類、中國圖書分類及 ACCR 編目規則加以分類。
- 3.期刊：中心自成立以來，通過訂閱及徵求、獲贈所收集到的國內外各類期刊合計達 400 種，包括已絕版的期刊，這之中較齊全和完整的有 70 種，其中華文期刊占 50 種。
- 4.其他：除了以上三類之外，中心也收藏了官方、商業機構、民間機構、政黨以及國際組織的出版品。錄音帶、錄影帶、照片及海報也是中心收集的項目。

(馬來西亞華社資料中心提供)

# 中國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

## 簡史

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已有十餘年歷史。1979 年 2 月，該院印度支那研究所成立，處級建制，楊萬秀擔任副所長。該所在組建初期，可謂白手起家。在資料建設方面，除訂購新的中外文專業報刊以外，還組織人員去外省圖書館與東南亞所複印了一大批過去出版的有關印支的論著，從而逐漸填補了該所資料的空白；在人員培訓方面，提倡在職自我進修，刻苦鑽研，努力吸收國內外已取得

的有關科研成果，並思考其不足之處；在辦所方向方面，充分發揮廣西自古以來與越南關係密切的地域勢，加強印支現狀研究，重視印支歷史以及中越、中柬、中老關係史研究，提倡把現狀與歷史研究有機結合起來。經過幾年的努力，該所初見成效：擁有一批熟悉印支現狀與歷史、精通越語的科研骨幹；資料室積累的印支資料已初具規模；開始溝通與國內學術界的關係；創建了廣西印度支那研究會所（1979年12月成立掛靠該所）；推出了一批科研成果，包括編印了我國第一本《中越關係大事記》、《中柬關係大事記》，受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的委託，編印了《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第二屆年會論文專集》，創辦了內部刊物《印支研究》（1980年試刊，1981年正式出版季刊），參加了全國對印支問題（如二征問題）的討論，引起了國內學術界和有關部門的重視等等。1981年，楊萬秀調離，郭明接任副所長。

1984年，是該所歷史上重要的一年。這一年配齊了所有領導班子，郭明任所長，黃錚、趙和曼任副所長；從這一年開始，該所人員撰寫的科研成果數量增多，質量也有較大的提高，特別是撰寫的專著自1985年起由國家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達13本之多（至1990年止），平均每年出版兩本。撰寫的論文有的在國家一級學術刊物或中央其他報刊登載，許多在省級報刊發表，從而使該所在國內學術界的地位逐漸提高；從這一年開始，該所已有能力主辦全國性的大型學術研討會。1986年，該所刊物《印支研究》改名為《印度支那》（季刊），並在全國公開發行。同年7月，黃錚調離，補周中堅任副所長。1987年7月，郭明調離，由趙和曼主持全所工作。

1988年5月，廣西社會科學院成立國際研究室，重點研究亞太地區經濟，該室掛靠印度支那研究所。為了適應廣西對外開放的需要，經上級批准，廣西社會科學院印度支那研究所於1989年5月改名為東南亞研究所。該所公開刊物《印度支那》也相應於1990年改名為《東南亞縱橫》（季刊），該刊已成為我國東南亞研究領域中的一塊重要園地。除此以外，該所受廣西政府部門的委託出版《東南亞經貿信息》周刊。現任所長為趙和曼，副所長為古小松、梁源靈、羅桂友。

## 隊伍和組織結構

廣西社會科學院東南亞研究所現有科研人員共21人，其中高級職稱研究人員10人，中級職稱研究人員8人，初級職稱研究人3人。原設有越南研究室、柬老研究室、綜合研究室、華僑與華人研究室、編輯室資料室，擬改設為印支研究室、

東盟研究室、國際關係研究室、華僑華人研究室、編輯室、資料室。

## 主要學科

歷史學（東南亞史，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

國際經濟（東南亞經濟）

國際政治（東南亞政治與法律）

華僑與華人（東南亞華僑與華人、廣西籍華人的歷史與現狀）

民族學（東南亞民族，壯族與泰族、老族等民族的歷史關係）

## 圖書資料情況

有關東南亞的圖書資料，大部分放在廣西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其中中文圖書約 6000 冊，外文圖書約 3000 冊，外文報刊 50 種；東南亞所資料室的圖書，中文約 3000 冊，外文圖書約 1500 冊，外文報刊 10 多種。該所資料室藏書的一大特色，是越南資料、越文書刊較多。

（廣西社科院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古小松提供）

##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亞太研究」研究院乃澳洲國立大學於 1947 年成立時即先行設立之四個研究所之一。至 1960 年，此四個研究所變成「進深研究」研究所，而後成為千百拉 (Canberra) 大學學院，並以此成為大學的「一般研究」研究所。到了 1890 年，「一般研究」研究所，更名為 The Faculties。它目前設有醫學、物理科學與工程、社會科學、太平洋與亞洲研究、化學、生物科學、地球科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等研究所，且完全專注於進行研究和在職訓練，多半屬於博士及博士後的

層級。

而該學院的成立基礎，本質上是日漸認知到澳洲需要了解太平洋島群和東南亞及東亞的近北的問題。亞洲和太平洋區域對澳洲及該學院中，欲尋求提供澳洲社區裡(政府、傳播媒體、學術單位及有興趣者)對此區域之社會與環境之了解而言，是個明顯重要的區域。為達此目的，需要培養一些建立在明確的證據、恰當的時間深度與分析的互動原則。且在澳洲大陸進行物理、地理、考古及人類學的工作，並且澳洲與亞洲和太平洋島群的關係在大部分的領域裡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該學院的學術人員數目約達 120 人，且藉由研究助理、技術與行政人員來被支持。學術人員含終身聘任及暫時聘任，並且一般經由廣告招聘。非期約之職位一般約 3-5 年，雖然有些只有 2-3 年。大部分的澳洲博士班學生是以澳洲國立大學和公共財的獎學金入學，且該獎學金通常維持 3-4 年。而外國學生則需自費，儘管當中亦有部份被給予獎學金以負擔其開銷。對學術人員與學生來說，田野工作和一些實地經驗是相當受重視的。而博士學位的取得乃根據論文，同時對大部分的學生而言並沒有正式的課程。然而卻有很多的討論會，並且課程是為那些需要在特別領域內（例如：語言和統計學）接受訓練的學生安排的。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助理李志遠譯)

## 法國普羅旺斯東南亞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IRSEA)

普羅旺斯東南亞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 IRSEA) 是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和普羅旺斯大學 (University of Provence) 之下的一個研究單位。它自 1993 年 5 月 3 日創立以來，已成為歐洲地區研究東南亞區域最重要的機構之一。IRSEA 有三個主要任務為：研究、教學及出版文獻。

## 組織及目標

IRSEA 有 46 位成員，其中包括 CNRS 的專任研究員、大學教授、副教授、博士班及博士後研究生、研究助理和圖書館員，另外還有定期從歐洲及亞洲國家來訪的客座研究員。

IRSEA 的地區性研究計劃由學者組成研究小組，專門從事人類學、社會學及歷史學領域的東南亞比較研究，同時定期從事語言學、考古學、地理學、政治學、法律、比較文學及心理學方面的研究。

## 圖書館

IRSEA 的圖書館是法國最大的東南亞研究圖書館之一，它有超過一萬冊的藏書及專門的期刊，館藏範圍涵蓋人類學及其他有關東南亞文化方面的資料，特別是有關泰國、緬甸和印尼的文化資料，還有菲律賓、越南、高棉、寮國、馬來西亞、西藏、印度、及中國的大量圖書及文獻。其館藏目錄可在 Internet 上查詢，網址為 <http://dodge.grenet.fr-Segase>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圖書館員羅惠馨譯)

# 北歐亞洲研究所

The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IAS)

北歐亞洲研究所 (The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NIAS) 成立於 1967 年，是一跨國性的獨立研究機構，由丹麥、芬蘭、挪威、瑞典的政府始創。其目的為鼓勵並支持北歐國家從事亞洲研究，並扮演北歐及非北歐學者，尤其是亞洲學者及研究團體間的溝通管道。NIAS 從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研究現代亞洲地區的社會及文化，且有一跨學科目標想要平衡一般大學過分專門化及零碎化的研究傾向。NIAS 為一非營利組織，由丹麥、芬蘭、冰島、挪威和瑞典五國政府透過北歐部長級會議聯合給予經費。

## 組織及目標

NIAS 之下有北歐五國 20 所大學為其分支機構，其主要任務為鼓勵及加強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的北歐學者對亞洲文化及社會的研究興趣，特別是藉著創新研究計劃、舉辦學術會議和研討會、邀請客座研究人員及演講者、給予獎學金、提供有關亞洲的文獻及資訊，來促進各研究機構及研究員間之接觸、合作與協調，並對北歐地區及其以外之學者、學生、學術機構及其他組織提供援助及服務。因此設置有專為北歐亞洲研究學會提供支援及協調的組織，中國研究為 NACS，日本及韓國研究為 NAJAKS，東南亞研究為 NASEAS，印度研究為 NASA，中東研究為 NSMES。

NIAS 的董事會是該研究所的決策中心，由參與國家之國立研究會議和研究暨教育部長指派、輪調北歐不同地區的資深學者所組成。北歐國家共有的價值觀，如追求自由、公正、平等、人權、政治民主、公眾參與及全球合作，這些價值觀都反映在 NIAS 所舉辦的活動。

## 圖書館

NIAS 的主要實體資產是其收藏亞洲資料的圖書館，特別著重於收藏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主題。其館藏大約有 23,000 冊的藏書、約 700 種的現期期刊、通訊，並收藏剪報、抽印本、微縮片及微縮膠捲等類型之資料。所有藏書均已登錄在皇家圖書館的線上目錄，可供外界檢索。該館採購以西方語言資料為優先考慮，因為皇家圖書館東方組擁有大量以亞洲語言寫成的藏書，可補 NIAS 藏書的不足，再加上哥本哈根大學亞洲研究學系圖書館和 Carsten Niebuhr 近東研究所圖書館，就構成了北歐國家最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資源。NIAS 原則是參考型圖書館，但在特別情況下，如其他公共圖書館查無此資料時，圖書可被借閱，但期刊不外借，提供計費影印服務。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圖書館員羅號惠馨譯)

# 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辦公室報導

## 一、現有期刊、書籍介紹：

本計劃圖書室目前共購有中文圖書約 110 冊，西文圖書約 600 冊，並定期收錄東南亞區域相關研究之期刊 10 種，陸續增購中。

### 1. Art Asia Pacific Quarterly 季刊

此刊為一藝術性期刊，主要介紹亞太地區之藝術創作，藝文展覽訊息，藝術家介紹...等藝文界動態。

### 2.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每年 7 月、11 月、3 月出刊

本刊為學術性刊物，主要探討影響東南亞國協（東協）整體之經濟問題；包括東協國家與其主要貿易對象，如美國、日本、歐洲經濟共同體、東亞、澳洲等國之聯繫，及其與整個世界政經之介面與關係。其內容形式有專論、文獻、評論及東協國家與亞太地區之其他相關資訊。

### 3. New Asia-Pacific Review 季刊

自 1996 年 9 月起，The Asia-Pacific Magazine 與 New Asia Review 合併為 New Asia-Pacific Review。主要提供亞太地區獨家且完整之研究資訊、事件發生的背景及該地區之文化差異，以加深讀者

對亞太地區之了解。

### 4.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季刊，每年 6 月、9 月、12 月、3 月出刊

此刊為一專門性的國際戰略事務季刊，以探討東南亞地區及與其有地緣戰略關係之亞太地區之政治、國際關係、相互安全等問題為宗旨。

### 5.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半年刊，每年 3 月、9 月出刊

為一具國際性之期刊，由新加坡大學出版社代國立新加坡大學歷史系出版，由人類學及社會科學之專門學者執筆，論述有關菲律賓、印尼、汶萊、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泰國、高棉、寮國、越南等東南亞各國事務。

### 6. SOJOURN :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半年刊，每年 4 月、10 月出刊

為一跨學科探討東南亞社會問題的期刊，主要探討有關族群、宗教、都市化、移民及東南亞社會發展等問題，收錄有兼具理論與實務之專論、研究筆記、書評、評論、研討會公告等。此刊物是由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SEAS）的區域社會及文化研究計劃（RSCS）所出版。

7.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每年 3 月、7 月、11 月出刊  
此刊為專門出版東南亞近來創新研究之學術性期刊，內容依據東南亞區域之各方面相關學科研究，包括考古學、藝術史、經濟、地理、歷史、語文及文學、法律、音樂、政治學、社會人類學、宗教研究等學科之原始研究或田野調查所出版之專論。從 Volume 5 (1997) 起改為每年 3 月、7 月、11 月出刊。
8.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每年 5 月、10 月出刊  
為一跨學科之學術性刊物，由 Times Academic Press 代國立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出版。主要提供一論壇發表有關東南亞區域之社會問題，包含人類學、經濟、地理、歷史、語言及文學、政治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之研究。
9.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半年刊，每年 3 月、9 月出刊  
此刊由本計劃（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所出版，提供國內外東南亞研究概況，並介紹國內外研究東南亞區域之研究機構、人物及出版品等。
10. 東南亞季刊 季刊，每年 1 月、4 月、7 月、10 月出刊  
為一學術性刊物，以探討東南亞區域之政治、經濟、社會、民族等問題為宗旨。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出版。

## 二、馬來語教學介紹：

本計劃於 1996 年十二月起，聘請蘇俊翔先生為本計劃之研究人員與研究助理教授馬來語，蘇先生為通過馬來西亞教授馬來語教學資格鑒定合格之馬來語教師。目前有本院多位研究人員及助理參與此項教學計劃，歡迎院內有興趣於東南亞研究及馬來語之研究人員及助理參加上課。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一中午十二點至兩點。

## 三、演講及午餐座談會

1. 主講人：Prof. Verner Worm  
Prof. Sam Steffensen  
(The Asia Research Unit,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講題：Business Strategies and Operations in China and Japan.
2. 主講人：Prof. Terry Mcgee  
(Directo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講題：Globalism and the New Geography of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3. 主講人：曾瑞玲（歐美所研究員）  
講題：Impac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Southeast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  
主講人：林欽明（歐美所研究員）  
講題：The Southeast Asian Services Sector in Globalization of

World Trade.

主講人：陳彥煌（歐美所研究員）

講題：International Factor  
Movements：Implications to  
the  
ASEAN-4 Economics

主講人：張晉芬（歐美所研究員）

講題：Interrelation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between Core and  
ASEAN-4 Economies and the  
Impacts on Labor Markets  
Outcomes.

4. 主講人：Prof. John Lie  
(Chai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講題：Issue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

5. 主講人：Prof. Rom  
Crocombe(Doctor of the  
National Australia  
University)

講題：A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An Overview.

#### 四、邀請海外華人學者研擬 共同研究計畫

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陳志明先生，菲律賓亞典耀大學講師洪玉華女士及淡江大學教授麥留芳先生與本計劃共同擬具東南亞華人研究之合作計畫。

#### 五、出版

「東南亞研究論文系列」(PROSE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已經出版以下五篇論文：

No.1 曾瑞玲 (Rueyling Tze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1980s:  
The Implications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o.2 張晉芬 (Chin-Fen Chang)  
Exports, Growth and Dependenc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SEAN-5.

No.3 蕭新煌  
亞太轉型、區域成長圈與永續發展

No.4 林欽明 (Chin-Ming L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ervice Industries in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No.5 龔宜君、張景旭  
發展中的東南亞中產階級：馬來西  
亞、印尼、泰國與菲律賓之中產階  
級形成